



\*0007732\*

# 中共党史资料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

# 17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 中共党史资料

第十七辑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北京·一九八六年



封面题字：舒 同  
封面设计：马少展

**中共党史资料**  
第十七辑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8印张 160000字  
1986年3月第1版 1986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58,000册

书号11310·24 定价1.45元

**内部发行**

# 目 录

## 文 献

- 支持华北抗战中的八路军……………任弼时 ( 1 )

## 回 忆 录

- 大革命时期的湖南(节录)……………李维汉 ( 10 )  
    北伐战争时期…………… ( 10 )  
    大革命的失败…………… ( 45 )  
红五军团的初创时期……………肖劲光 ( 61 )  
回忆我党在杨虎城部三十八军的工作……………蒙定军 ( 84 )  
内蒙工作的回忆……………刘 春 ( 111 )  
我的回忆……………李伯钊 ( 167 )  
李昌同志关于“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问题给  
    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的一封信…………… ( 188 )  
彭涛同志谈“一二·九”运动…………… ( 191 )  
回忆东北解放战争期间东北局驻北朝鲜办事处…………… ( 197 )

## 资 料 综 述

- 三五九旅南下支队南征北返和中原突围纪略 ……黄 铭 ( 211 )

## 专题资料

黄麻起义 .....	(220)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福建党的组织机构、 领导人员变动情况及其主要活动 .....	(241)

# 支持华北抗战中的八路军\*

任 弼 时

## (一)

同志们！八路军在去年由陕西向山西最前线出动，到现在已经半年了。今天我准备将八路军抗战情形简要的向大家报告一下。在我开始报告以前，我代表八路军全体将士向县长会议致敬礼！对边区政府与人民动员慰劳前线将士及优待抗日军人家属表示热忱感谢！

八路军是在支持华北抗战的伟大任务下到达山西的，他是要协同华北所有抗战军队，求得给日寇进攻以迎头痛击，使华北抗战能够持久。我们当时所采取的作战方针，就是以运动战与游击战配合友军，求得给进攻之敌以有力的打击。

当我们到山西时，正是敌人以最大力量来进攻山西，企图迅速占领太原的时候。我们认为保卫山西，成为支持

---

\* 本文是任弼时同志一九三八年二月十五日在陕甘宁边区县长会议上所作的报告，原载1938年2月20日、25日和3月1日《新中华报》。本刊此次刊登，只改了个别明显错字。

华北抗战的最基本任务，因为山西是高原山地，在华北有它更大的战略意义。日本要完全武装占领华北，非夺取山西不可；要使华北抗战持久，也就要努力来保卫山西，依托山西，可以随时向敌人举行反攻，北向平绥〔线〕，东出平汉线，使日本所占领的平汉、平绥线终不能巩固。因之我们到山西后，把保卫山西当作我们最基本的战斗任务。

八路军在这样的任务与作战方针下，开始参加战斗，首先就用运动战在平型关给敌人以严重打击。平型关战斗的胜利，是卢沟桥事变后，在全国抗战来说，是全国抗战中的第一个大胜利，消灭与打败了敌人一个旅团，给友军及全国人民以莫大的兴奋。当我们到达前线时，还有人怀疑，以为八路军武器颇差，过去虽然英勇善战，打起日本，不见得如何厉害，但是平型关胜利证明，不仅过去英勇，而在抗日战争中同样英勇善战，成为民族解放自卫战争一支强大的力量。这一胜利同时又大大地提高了抗战军队胜利的信心，使华北抗战军队的情绪，大大为之一变，这可以由各种战斗中的英勇行为看得出来。

其次，在平型关战斗中，我们得到了许多对日作战的经验教训。日军是有组织有训练、武器齐备的军队，绝对不能轻视的。但它还有不少弱点，这即是日本步兵如没有重兵器参加战斗，〔战〕斗力是不见得怎样强的。日军轻我观念很浓厚，因之警戒非常疏忽，不善于山地战，再加上军队情绪不好，反战空气普遍。这些弱点，便于我采取运动战，以突然袭击的手段去战胜它。

平型关战斗胜利后，敌人虽仍占领了雁门关，继续南

进，可是遇着了各军顽强的抵抗。忻口战役，在地形并不很好的条件下，坚持了一个月的残酷战斗，这一方面由于增加了生力军，如卫立煌将军所率部队赶到，再加上抗战部队胜利信心增高，从正面英勇坚决的抗战阻止了敌人前进；另一方面，八路军把主力使用到敌人的侧后，经常破坏敌之交通，截断敌后方联络，阻止敌兵的增援与粮食弹药汽油的补充，使忻口以北之敌，经过四五天血战后，逐渐地失却了强烈的战斗力，大炮因为缺乏炮弹不能多用，坦克车没有汽油不能行动，给养非常困难，而靠飞机来运输粮食与弹药。在这情形下，敌人已没有力量由正面来突破我们的阵地。如果当时再继续半个月的斗争，在忻口以北的五万日军，有可能全部被我消灭。忻口战役教训了我们什么？说明我们抗战，仅依靠正面防堵，是不能持久的。忻口之〔战〕所以能持久，正是由于正面防堵与在敌人侧后的积极行动互相配合所达到的。

忻口〔抗战之我军〕最后终于撤退了。这是由于平汉线方面失去了石家庄，敌人把主力沿正太路进犯娘子关，把进攻方向改到晋东，企图进逼太原，来解晋北之围。由于晋东战事吃紧，八路军主力一部复向东转移，向娘子关进发，求得配合东面抗战军队给东方进攻之敌以打击。可是主力还未到达预定地点时，娘子关已被突破。娘子关容易突破，一方面是由于敌人力量相当强大，另一方面由于在敌侧后活动的力量太小，后来我们虽然在广阳经过几天战斗，敌人终于攻占了太原，于是忻口抗战之我军亦不得不放弃原有阵地向后撤退。



这是太原失守前的经过情况。

太原失守后，我们提出的基本任务，是在敌人远近后方交通命脉上以高度的积极行动，破坏敌人交通，在运动战、游击战中，给敌人以打击，配合各个抗战部队，阻止敌人南进，来保卫晋南领土之完整。这一战斗任务执行过程中，加紧在敌人所占领的区域内去创造长期抗战的根据地。

依据这一任务，八路军主力留在敌人侧后面（如冀察晋、晋西北及正太路旁与以南），配合当地的民众武装——游击队、义勇军，采取高度的积极行动，达到牵制敌人不能南进的任务。由于我们的活动，经常袭击敌人后方交通，逼着敌人不得不用很大力量来进行围剿，企图消灭八路军及地方部队。敌人曾经用了二万以上的兵力，分八路进攻冀察晋边区。当时我们利用了优越的地势，相当发动了民众力量，武装了不少的民众，采取灵活的游击战术，与敌人进行艰苦的斗争。敌人的围剿，终于失败，它遭受了巨大的打击。这一围剿失败之后，敌人又转移兵力对付晋西北的我军和地方部队，同时以各路进犯，企图把我们部队与游击队驱逐离开同蒲沿线，以保证其后方安全，但敌人同样受着重大打击，仍然退回同蒲线各据点内去了。这次失败后，敌又以六路进攻正太路以南的区域，结果也是受一个迎头痛击，敌人肃清后方工作，是完全失败了。

我们在太原失守后的许多战斗中，敌人的损伤至少要比我们大若干倍。所有地方武装在不断的战斗中也锻炼了自己，成为有力的部队。在这里我们要答复那些对八路军

有意或无意的造谣诬蔑，他们说：“八路军在敌人侧后方游而不击保存实力。”我想这些诬蔑，只有拿具体的事实去揭破它。八路军到山西后，参加大小战斗在几百次以上。八路军对民族与国家是绝对忠诚的，早在“八一”之后，我们即提出只有抗战才有出路，难道在抗战时我们还不负责与出力吗？我此刻没有时间将八路军到山西后作战次数和胜利作一个全盘统计来揭破那种诬蔑，让我在这里举出一个实际例子来告诉那些诬蔑的人们吧。自一月二十一〔日〕至二月五日的半个月当中，我们统计经过大小战斗有三十七次之多，有的一天之内有七八个地方与敌人进行战斗的（一月二十二日），在这一天内，多处战斗结果，我军伤亡亦复不少，某旅一个最好的团长陈景秀同志与一个营长牺牲了，×××师在这天之内亦牺牲了一个营长，但给敌人的打击也不小。在这半个月中，敌人损失据统计伤亡有八百八十人至九百人上下，〔我〕缴获步枪一百五十支，大炮二门，俘敌二十余人。今天在山西境内的敌人总数不过五六万人，半个月要消耗他八九百，平均敌人每月要伤亡两千人，这对敌人的损失是如何重大呵。这一半月战斗汇报，我想是足够揭破那些有意或无意造谣的分子的胡说。

正由于我们积极行动，增加了敌人南进的困难，使敌人不得不暂时停滞南进，使得晋南大块土地直到今天依然还保持在我们中华民国的手里，使山西抗战部队得着空裕时间来补充与整理，使敌人在将来继续进攻时，必须费很大的代价。

太原失守后，我军抗战情形大略如此。

最近日寇又开始向我国作第二期的大举侵略战，企图占领我国中部、南部许多地方。目前敌之作战企图是攻取武汉，因之它首先须要占领津浦全线与徐州，然后以主力沿陇海路西进，再由平汉线向南，协同长江方面部队来夺取武汉。山西之敌，近来尚无积极南进表示，且有将平汉线上及山西部队抽调一部增加津浦线，来完成它向武汉前进的计划。

在这一情况下，山西各抗战部队须采取更积极、更坚决的行动，打击山西敌人，使山西敌人不敢向山东移动，这样来配合津浦线的抗战。因之山西各军正以反攻姿势，求得更大的打击敌人，保卫晋南，并恢复被敌占领的某些区域，这是目前最基本的任务。在确定这一任务下，八路军在九日，于平汉线上取得了平型关战斗后第一个大胜利，连占三个县城（望都、定县、新县），该地敌人大部被消灭。我们相信，在山西战线上今后会有更多的捷报传来的。

## (二)

这次抗战是长期的持久的斗争，所以必须发动民众，武装起广大民众配合正规军作战，才能使抗战持久，一直到最后胜利。所以我们把动员武装民众建立在敌人后方的根据地，作为我们抗战过程中的基本任务。现在我准备特别把晋察冀边区情形说一说。

在说到动员民众之前必须首先说明敌人除了军事进攻外，对占领区域的处置情形。敌人对占领和进攻的区域，

是采取一种最残酷最野蛮的行为，用烧杀淫掠抢等办法来镇压群众的抗日斗争。敌所到之处，大部村落被烧，有些城镇一半或三分之二以上，甚至于全部被毁灭的。对于未逃跑的居民，施以残暴的屠杀，有的地方被杀得一点不留。对妇女更施以极大的侮辱，奸淫是普遍的现象，被奸而死的为数亦复不少，大批青年妇女运往后方设立随娼所，以供日军兽欲。象这样的例子，真是不胜叙述。敌人的残暴行为，是千古以来所未闻的。

其次敌人在占领区域内，利用当地绅士及汉奸，来建立维持会的伪组织，作为临时政权，开始对人民的剥削压迫：

一、建立了维持会的地方，宣布过去捐税照旧，必要时还要增加。

二、中国人财产限定日期去登记，过时即宣布没收。

三、不准人民有武装，压迫人民报告我们消息特别是八路军的。

此外进行政治上的欺骗与分化，他们说：“南京被皇军占领，中国已无政府”，压迫人民来拥护北平伪临时政府。又如说：“日军此来，是因共产党扰乱东亚和平，日军要消灭中国赤化势力与政府”，挑拨抗战团结。他们说：“除国共两党以外，其余不是他的敌人，要消灭八路军，驱逐中央军，保证晋军安全”等……，这是敌人欺骗的内容。

山西人民在敌人这种残暴行为与压迫下，抗战情绪与民族仇恨是很高的。他们自动起来组织自己，武装自己，去打日本。比如晋冀边某地当日军来时，男子化装女子，

着红绿衣服，伪装逃跑引诱敌人向着埋伏有游击队地方跑，突然出以袭击而将其全部消灭。又如某地农民伪装与日军很好，给他们以酒肉吃，将其灌醉而杀之。所以我们说山西、河北、察哈尔等地人民抗战情绪是异常激昂的，对作战工作——运输、侦探、报告消息表现十分热烈。

我们民众运动的基本方针：（一）保持统一战线的巩固与扩大。（二）抓住武装民众迫切的一环，联系到初步改善人民生活及组织民众的工作。

在这一方针下，我们曾组织了大批的民众武装。在冀察晋边区，除八路军以外，地方上已经有了相当大而且坚强的武装力量。晋西北、正太路以南同样如此。这些武装力量，在开始，战斗力并不强，经过我们的帮助，率领他们与正规军在一块儿行动，担任战时的后方活动与清扫战场工作，使他们逐渐地变为有战斗力的部队，他们已成为正规军的重要助手。由于他们地形熟悉，与当地民众关系密切，能清楚地了解敌情，经常给敌人以不断的打击，这说明游击队是在不断的斗争中强大起来了。不仅如此，在冀察晋边区游击队已建立了统一的指挥机关——军区，来统一游击队的行动，他们将成为保卫冀察晋持久斗争的坚强力量。

在被敌占领地区，原来政府负责人跑了，政府被敌摧毁，收复之后进行建立中华民国的政府，各恢复之县政权，由省政府委派县长或由当地提出请省府加委吸收当地有名之士参加政府工作，来保证政府能够领导民众进行反日的持久斗争。在县、区长之下，设立县、区政务委员会，有

各救国团体派代表参加，成为议事机关，县、区长兼政务委员会主席，村长由人民选举，使政权机关与人民关系更加密切起来。最近在冀察晋边区成立边区委会，已经阎百川先生与中央批准，管理行政及战时动员工作，所以冀察晋边广大地区今天仍然是中华民国完整的一部分，而且成为华北抗战有力的根据地了。这个地区包括四十余县土地，有将近千万的人口，没有忍受亡国奴的痛苦，与敌人进行顽强的斗争。这一区域除了建立起大批游击队、义勇军外，他们普遍地动员了人民参加自卫队，且表现了伟大的作用。自卫队开始做到了严密警戒，侦探敌情，报告消息等初步工作，到处放有农民哨，没有通行证是很难通过的，使敌人侦探无法打入该地区，这表现人民组织的伟大力量。

冀察晋边区的政府，还开始改善人民生活、简单的经济建设、优待抗日军人家属等工作。地租、利息、捐税等有些减少，开始建立人民的合作社，建立对外贸易关系，来调剂人民日常必需品，以改善其生活。

象冀察晋边这样的区域人民已经动员和武装起来，它将成为不可摧破能够继续持久斗争的坚强堡垒。敌人在将来必然要继续的围剿，派更多的部队来进攻。我们相信，在具有那样有利的地形，加上具有游击运动战争活跃的强大武装及广大人民力量下，一定能战胜日寇的进攻，并且将在战胜敌人进攻中更加巩固与扩大起来。他们在敌人后方活动，将更增加敌人的困难，必然能够配合全国抗战军队在其他地域取得更大的胜利。

# 大革命时期的湖南(节录)

李 维 汉

**编者按：**李维汉同志生前嘱我们转告读者，对他的回忆录“敬请提出建议”。意见请寄本刊编辑部。

## 北 伐 战 争 时 期

一九二六年六月，国民革命军自广东、广西入湘，会同唐生智军进行北伐。北伐军在湖南节节胜利。以国共合作为中心、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统一战线不断扩大。民主势力特别是农民运动得到迅猛发展，出现了两重政权。湖南处于大革命的高潮中，到处热气腾腾。与此同时，在革命阵营内，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民主势力与没有经过民主改造的唐生智控制的武装力量和政权机构间的矛盾也逐渐发展。随着全国形势的变化，它成为影响湖南革命发展的主要矛盾。革命在发展，潜伏着严重危机。这个时期，根据两大势力各自力量的发展和变化，又可分为两个阶段：一九二六年下半年，是双方以联合为主和各自力量迅速发展的阶段；一九二七年上半年，是双方矛盾日益激化直至

分裂的阶段。

### (一) 北伐军进占长沙

一九二六年七月五日，唐生智率部自衡阳出发，会同国民革命军第四、七军进攻赵恒惕军，八日克湘乡，九日克醴陵，十日克湘潭，十一日占领长沙。北伐军每到一地，都得到工人、农民和学生广泛的支援。各地学联组织宣传队随军宣传。醴陵的工人、学生组织的平民救国团和农民武装队三百余人直接参战，配合第四军攻克醴陵。平江、岳阳、临湘等县农民组织了冲锋队、暗探队、疑兵队、运输队、宣传慰问队、向导队支前参战，出力甚大。北伐军攻占长沙后，省工团联合会组织了三千余人的工人运输队，分批随军出发。八月下旬，北伐军乘胜向湖北推进。

### (二) 中共中央四届三中(扩大)全会和湘区“六大”

一九二六年七月上旬，党的四届三中(扩大)全会在上海召开。我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由陈独秀主持，他代表中央作政治报告。周恩来在会上报告了中山舰事件的经过，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有关这个事件的详细情况。这次会议召开于国民革命军北伐进军至湖南，革命迅猛发展的关键时期，对于党的工作有重大的影响。会议决议对于一些问题的分析，有正确的方面，也存在比较严重的缺点。

会议分析了革命阵营的几种势力，并结合社会阶级关系分析了国民党内的各种派别，指出：工农群众是革命的



基本力量，共产党是他们的代表；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在客观上“有倾向革命之可能”，“想利用工农群众势力，反抗帝国主义与军阀，以得到他们的要求。”但“一旦得到些小胜利，稍稍能够安慰其阶级的要求，便立刻发挥其妥协根性，离开民众，背叛革命而与敌人合作。”会议明确提出要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任务，要“努力拉住小资产阶级，使之接近工农群众，而不完全为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所统治，以与资产阶级争此革命运动的领导地位”（见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中央政治报告》）。会议提醒全党在与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时，既要防止“左”的偏向，又要防止右的偏向。

会议再次强调农民问题的重要性，指出“我们的党要想领导中国民族解放运动顺利的进行，就在取得这项农民的势力，取得农民运动的指导权”。（见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农民运动议决案》），并根据农民运动发展情况，提出当时全国农民急切的几项政治和经济的要求，即减租减息和集会结社自由等。对地主，主张区别对待，中立不积极作恶的大地主，只攻击极反动的大地主。对于农村中的其他群众，如小商人、手工业者、知识分子，要取联合策略。对地主土豪劣绅用以压榨平民的民团，要逐步加以改造，把权力转到农民手中。

对于军事工作，会议主张我们党“应该参加武装斗争的工作，助长进步的军事势力，摧毁反动的军阀势力，并渐次发展工农群众的武装势力”，要从政治上加强对工农武装骨干的训练（见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

《军事运动议决案》》。

会议对上述问题的分析，特别是对资产阶级（实际指中等资产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分析，以及根据当时客观条件，分阶段、分步骤消灭封建剥削制度的策略思想，现在看来基本上是正确的。

但是，这次会议存在着严重的缺点：（1）关于革命任务，强调反帝，不强调反封建，没有提出消灭封建土地制度的任务。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一项基本内容，尽管实现这一任务需要分阶段进行，特别在战争成为当时一切任务的中心的时候，更应如此。但是会议没有理直气壮地强调指明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战略任务，没有明确指出对于地主阶级中暂时可以联合或中立的部分暂取联合或中立的策略，正是为着实现这一根本任务。（2）关于革命前途，存在很大的不彻底性。会议认为“中国民族运动的前途……是由工农阶级领导小资产阶级，推动资产阶级，以革命手段达到民族资本主义之建设”（见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政治报告》）。（3）把中等商人划为小资产阶级，实际上，它应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4）把中小商人作为小资产阶级划作国民党左派的政治和组织基础，主张将他们交给国民党左派去领导，以造成共产党领导工农，国民党左派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局面。这样做，实质是同国民党左派分割领导权。（5）对当时已成为我党与资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主要对手蒋介石缺乏认识，特别是在“三二〇”事件之后，蒋介石实际已经代表豪绅买办阶级，却仍把他看作国民党内的中间派，

称之为“武装的中派”或“新右派”。主张联合左派并中派，有时还需要扶助中派，向反动的右派（指老右派）进攻。没有认识蒋介石已经是较之西山会议派更为危险的同盟者，因而在实践中，仍将北伐军事权系于蒋之一身，害怕同他分裂，不作可能分裂的准备。（6）对于军事工作，只提出在敌军中，即在北洋军阀的军队中组织我们党的兵士支部，对由南方地方军阀掌握实权的国民革命军和国民军，只提出派人去做政治工作，不敢争取获得统一战线内部的军权。对于农民武装，规定“不可有常备的组织”，“不要超出自卫的范围”（见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农民运动议决案》），小心翼翼地惟恐引起误会和冲突。联系到会议通过的对于时局主张中所重申的国民会议是解决中国政治问题的道路的主张，如说“现在本党对于时局的主张，仍旧主张国民会议是解决中国政治问题的道路”，说“只有参加国民会议运动之各阶级的民众，首先在各地地方集中工人、农民、学生、商人、手工业者等各团体的力量于各地方的国民会议促成会，一面进行自动的发表政纲的国民会议之实现，一面各自在当地立刻起来做地方政治的直接奋斗，由反抗苛税苛捐，力争民权自由，一直到推翻当地的军阀政权，建立地方的人民政府；如此方能汇合全国民众的力量，由发表政纲的国民会议，进行到接受全国政权的国民会议，由此会议建立全国的人民政府，解除人民自己的痛苦”等（见一九二六年七月《中共中央第五次对于时局的主张》）。说明会议对于我党掌握武装的重要性的认识仍然是很差的。会议的上述缺点反映的是

右的倾向，它不能不对即将兴起的军事斗争和群众斗争的高潮发生不利的影晌。

开会期间，从报上看到北伐军进占长沙的消息，我未等会议结束，也没有参加各项决议的讨论，在会议通过了中央对于时局的主张后，即赶回长沙。临走时，我向陈独秀请示工作，陈说了两点：一、大力支援唐生智军北伐；二、可以组织工农自卫武装，共产党不独立搞军队。八月六日和十八日，区委根据党的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央对于时局主张的精神和北伐军进入湖南后的新形势，两次发表对时局宣言，宣布政见，强调湖南革命政府应该维护民众利益，革命军必须和民众结合，号召民众起来结成工农商学各界的联盟，召集乡民、县民、省民会议，发布政纲，伸张民权，为召集全国的国民会议，接收政权作准备。宣言还提出停止预征钱粮，废止陋规苛税，没收逆产，铲除贪官污吏，限制高利贷，制定工人最低工资、农民最高租额，保护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等民主政纲。

十月一日至十三日，区委召开第六次党代表大会。此时，全区已有党员三千七百十四人，党的地委十五个，通讯处九个，特别支部三十二个，五十六个县都有了党的组织。大会讨论了加强党的独立主张的宣传、商民要求、省民会议运动、党的发展等问题，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和大会宣言。会议认为湖南已经结束“军政时期”，进入“训政时期”。当时政治斗争的形势，一面是反动的封建残余势力，一面是革命的民众势力。民众势力战胜封建残余势力，湖南就将走上升的民主政治的轨道，实现革命的民众政权。

关键在于以唐生智为首的省政府的意向和民众自身势力的发展。因此，会议要求唐生智政府站在革命民众一边，扶植人民团体的发展，促进人民设立自治政府，将地方政权交还人民。会议特别强调发展民众势力的重要，认为这是实现民众政权的保障。会议议定了一个包括有言论、集会、结社、出版、罢工、抗租自由，工农武装自卫，制定劳工、农民保护法，大产业公有，乡村政权交乡民会议，八小时工作制，规定最高租额、最低工资等共五十五条工人和农民的最低限度的政治经济要求，作为发动工农群众为自身利益奋斗的目标。

区委八月的两次宣言和区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文件，基本上反映了北伐军占领湖南后区委对湖南政局的主张和政策。它在实行联合战线，注意团结同盟者，贯彻民主政纲，以及发展工农基本民主势力，建立工农自卫武装，建立城乡民众政权等方面的主张，都是正确的。它提出了当时建立统一战线的民主政权这一迫切问题。但是区委同党中央一样，对于建立城乡民众政权的途径，认识上存在着片面性，即片面地重视民众运动，而忽视对武装的争取和掌握。而无后者做支柱，民众政权就不可能建立，即使建立起来也不可能维持。后来长沙市民代表会议以及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后建立的市民代表会议的流产就是证明。

### （三） 统一战线的扩大及其内部斗争

湖南的国民党组织在一九二六年初打倒赵恒惕的高潮中即已公开活动。北伐军占领湖南后，它成为我党推动革

命的一面公开旗帜。区委下设“民校运动委员会”（民校是当时党内对国民党的代称）管理国民党工作，书记夏曦。在国民党内设我党党团，书记周以栗。我党的政治主张一方面通过工、农、青、妇群众团体贯彻，另一方面主要通过国民党省党部推动省政府去实施。后者由于国民党是执政党，因而更为有力。

我参加四届三中全会从上海回长沙后，唐生智要求同我会见，经过夏曦的联络，我们见了面，夏曦也在座。我们向唐表示，希望他实行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支持工农运动，对于北伐，我们当尽力发动群众支援。唐对于我们的要求，满口应允，并主动表示工农运动的经费可由省政府补助，要求我们对省政府的工作给以帮助。还提出请我们派几个共产党员到下面去当县长。对于他补助工农运动经费，我们表示欢迎；对于他要求我们支持省政府的工作，也表示无问题；但对于他要求我们派党员当县长的事，我们婉言谢绝了，因为党中央没有规定，我们自己也认为县长素来是直接压迫人民而为人民所痛恨的官吏，我们不能去干。当时，我和区委的同志还没有利用机会改造旧政权的认识。

谈话间，唐生智将他的智囊省政府的建设厅长邓寿荃介绍给我，说在他随军北伐期间，由邓负责同我们联系。邓后来也向我表示，希望我们派几个党员去当厘金局长，帮助他整顿一下腐败混乱的税收工作，我托辞很难找到适当人选，谢绝了。这次同唐生智见面谈话，实际上是一次同湖南的国民党实力派达成协议的政治协商。一九二六年

底至一九二七年初，唐生智本人及其核心领导人物邓寿荃、邓介松、张翼鹏是执行了协议的。其主要表现是：1. 驻在各县市的留守部队（主要是何键所部）对工农群众运动采取不干涉的中立态度，大大便利了工农群众运动和民主运动的开展；2. 谈话后不久召开的国民党湖南省第二次全省代表大会通过的宣言和决议，基本上反映了我党的政治主张；3. 一九二七年二月，唐生智因处理常德兵变事从前线回湘，区委通过他与国民党省党部、省政府以及各群众组织协商制定了一个《湖南省行政大纲》，计分民政、财政、建设、教育、军事、司法、土地、农工等共一百一十二项，规定筹备县区乡自治，废除团防，废除苛税杂捐，统一财政、税收，实行减租，保障工人利益等要求。实际上，这是国共合作下湖南省政府的一个施政纲领；4. 以邓寿荃为首的省政府建设厅支持工会和农协的工作，月拨经费二千和三千元给工会和农协，并另拨湖田溢田项下二万元给省农协，在各县办农民训练班。

对国民党的工作，区委贯彻了中央关于壮大左派，与之结成密切联盟，争取中派，反对右派的方针。争取唐生智就是一项重要的争取中派的工作。区委还同李荣植、雷铸寰等左派谈话，鼓励他们大胆领导国民党工作，欢迎左派到群众中去，造就他们自己的下级干部，整顿县党部，还表示共产党并不想代替左派、包办国民党的工作，打消了他们对我们的疑虑。左派逐渐活跃起来。

国民党省“二大”以后，共产党员在省党部的执监委员和候补执监委员中约占三分之一，有夏曦、凌炳（他是后

来加入共产党的)、周以栗、王基永、易礼容、谢觉哉、黄颐、刘春仁、戴述人、何叔衡、熊亨瀚等。省党部的工人、农民、青年、妇女部长分别由凌炳、易礼容、周以栗、黄颐担任，商人部的秘书是姜梦周。省党部执监委员中，李荣植、吴鸿骞、雷铸寰、董维键、谢骧穉、李燮治、鲁子源、易克嶷等左派国民党员占优势，廖维藩和谢晓峰比较右，仇鳌则以中派自居，实则中间偏右（马日事变时成为反共的反动派），后来成为右派的刘岳峙，开始表现也尚好。凡是我們组织和发展起来的各县、市的国民党部，负责人大都是党员和非党的左派分子，主要是知识分子，能站在工农运动方面。后来，根据中央七月和十二月会议关于不要包办国民党工作，要努力加强我党独立主张的宣传，扩大我党的社会影响，加强我党在工农群众中的工作基础及“湖南、湖北两省国民党省党部农民部长均应改用国民党左派分子”（见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中央特别会议《关于湘鄂赣三省农运议决案》）的决定，区委认为工、农、青、妇团体都掌握在我们手里，国民党省党部有关职务可以让给左派。是年底，省党部农民部长即由刘岳峙接任，当时我们对刘岳峙的真实面目是认识不清的。一九二七年初，工农运动猛烈发展，湖南国民党开始新的分化，刘岳峙结合其他右派分子组织了一个新的右派组织——“左社”。他还以省党部农民部的名义拟定了一个以致力于“农产物之增加，农业之改良进步”，反对农村阶级斗争的农运计划。他们赞成蒋介石迁都南昌的主张，要求改组湖南省党部，散布农民运动“糟得很”的言论。他们与蒋介石勾结的阴谋被国民党



长沙市党部的左派党员揭穿，省、市党部将刘岳峙等开除出国民党，省政府通告缉拿“左社”分子，并查封其活动基地三湘、纯德、晨光等学校。这是湖南国民党内部左右派的一次重要分化。这次斗争对于湖南总的政局并无大的影响，说明湖南国民党右派势力在左派势力占优势的情况下不能起多大作用。严重的问题是在唐生智部队中国国民党特别党部内的有权有枪的右派头子，这些人后来在马日事变中与特别党部以外的右派头子结合起来，控制了湖南的局势。

#### （四）继续深入的反帝斗争

在北伐军胜利进军，直系军阀节节败退的形势下，帝国主义、特别是支持直系军阀之英帝国主义，以“反赤化”为名，派军舰来华，向中国人民示威。一九二六年七月初，英、美、日帝国主义派军舰停泊长沙城外之湘江中。七月十日，英、意帝国主义又增派军舰来长沙。帝国主义的挑衅激起湖南人民的愤慨。七月下旬，“青沪惨案湖南雪耻会”改为“雪耻会”，恢复活动。九月七日，长沙各界举行了“九七”国耻纪念游行示威，宣言“我们欲求民族独立与富强，唯有联合世界上的平等待我之民族及一切被压迫民众，努力向帝国主义进攻”。九月二十五日，“湖南农、工、商、学大联合”成立，有二百三十多个团体，三万余人参加大会。大会提出：“反对英帝国主义帮助军阀吴佩孚、孙传芳”，“反对英帝国主义进攻革命军”，“反对英帝国主义勾结陈炯明扰乱后防”，“反对英舰擅自行驶内河，撤退

驻华英舰”，“继续扩大对英经济绝交”，“为万县惨案死难同胞复仇”，“取消中英间一切不平等条约”等口号。当日长沙各界还举行了反英示威游行，抗议九月五日英舰炮击万县的暴行。游行队伍派代表向驻长沙英领事署送了通牒。此后，全省各地都开展了反英运动。长沙群众焚毁各店英烟。衡阳雪耻会没收并拍卖英美烟草公司存货，封闭英商行栈。长沙雪耻会禁止英商亚细亚煤油公司经理处营业。郴州、永兴群众拍卖亚细亚煤油。宝庆群众焚毁油栈。常德雪耻会击毁英商洋行，封闭英货经理处。湘潭、安乡也都发生焚毁英油和其他英货的事件。湖南省政府支持群众的反英行动，拒绝了英领事的抗议。一九二七年二月九日，英水兵又在长沙水陆洲及湘江北岸登陆，打伤工人纠察队员。当日，湖南各界举行反英示威大会，组织了湖南人民对英罢工委员会，扩大对英经济绝交，长沙的洋务工人宣布罢工。英商在湘营业几乎完全停顿。

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三日，英水兵在长沙水陆洲打伤菜农，二十四日，发生英、美军舰炮击南京的惨案，湖南的反帝斗争由此更进一步扩大。四月，长沙各界群众联合行动，收回基督教青年会，改为湖南人民俱乐部。四月六日，组织了湖南人民收回海关委员会，收回长沙和岳州海关。

湖南人民的反帝热情是极其可贵的，它反映了长期遭受帝国主义压迫的中华民族的革命精神。在反帝斗争中，以工人、学生为骨干，注意联合女界、教职、商会等各阶层群众，并争取到国民党省党部和省政府的支持，因而能够形成

波澜壮阔的浪潮。但在这个运动中，注意策略不够，例如焚烧英油，使群众用油遇到困难，还影响到武汉市面煤油的供应，使经售英货的中小商人受到损失，引起他们的不满。

### (五) 工人运动的新高潮

北伐军克复湖南后，有了一个比较好的政治环境，工农群众运动迅速发展，形成高潮。受赵恒惕和叶开鑫摧残的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水口山工人俱乐部和新化锡矿山矿工会先后恢复。一九二六年八月，湖南省工团联合会改为省总工会，提出统一全省工人运动的口号，实际取得全省工会领袖的地位。至十一月，长沙、岳阳、浏阳、衡山、宜章、醴陵等十八个县市也建立了总工会，产业工会除安源、水口山、锡矿山外，还有炭塘子锰矿、第一纱厂、粤汉路、株萍路、汽车路、海员等。各县成立工会筹备处的有永兴、新田、常宁、澧县、安仁、石门、零陵、新化、攸县、湘潭、平江等二十六处。省总工会所属的工会组织有近六百个。工会会员由八月的十一万发展到三十二万余人。各工会参加政治运动二百三十五次，进行经济斗争一百零八次，许多都取得了胜利。省总工会举办了工人运动讲习所，培训工运干部。

湖南工人过去受帝国主义、军阀和资本家的压迫剥削，痛苦非常。北伐军入湘后，他们在政治上得到省政府的相当支持，长期被压抑的革命热情迸发出来，积极参加各种反帝反军阀的政治运动，要求政府惩办工贼，打击破坏工运的反动分子，要求改良待遇，增加工资。长沙工人开展

了驱逐破坏工运的劳工会原领导人王光辉和请政府惩办粤汉路工贼梁汉英的斗争。新化工人拘办了破坏工会的县署污吏贺召霖。桂阳工人在政府派兵协助下镇压了捣毁工会、县党部，惨杀工人的劣绅李容巨。一九二七年一月，湖南工人声援汉口工人、市民收回英租界，举行对英总罢工，联合各界组织湖南人民对英罢工委员会，扩大对英经济绝交的运动。

这个期间工人的经济斗争有长沙的人力车、靴鞋、湘雅、甲工工厂、铅印活版、贫民工厂、染织、织袜、石印、烟作、码头工会，平江的纸业工会，茶陵总工会，宝庆的印书、泥木工会，常德的泥木、烟业工会的加薪运动，邮务工人为改良待遇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这些斗争有的经总工会和省政府建设厅或省党部的调停，得到不同程度的胜利。湖南邮政大权掌握在美帝国主义手中，因而邮务工人的斗争涉及反帝问题。湖南邮务总工会为改良待遇，向邮务管理局提出十二项条件，要求增加工资，减少工时，遭到拒绝。省政府建设厅长邓寿荃、省总工会委员长郭亮、省党部农民部长易礼容出面调解，邀集双方代表谈判，邮务长以自己无权承认条件为由，全部拒绝。邮务工人乃将会议厅包围，高呼“打倒帝国主义”、“驱逐邮务长、收回自办”的口号，经十三个小时的斗争，邮务长才勉强签字。最后议定工人加资数额，部分由邮局承担，部分由国民政府交通部筹拨。

为检阅湖南工运力量，总结经验，制定今后方针，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一日至二十八日，在长沙同时召开全省第

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和全省农民代表大会。开幕那一天，还举行了湖南民众公葬黄爱、庞人铨、黄静源、汪先宗四烈士的仪式。区委为两个大会的召开和四烈士公葬分别发表了宣言，号召湖南的工农群众努力实现中共湖南区第六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工人农民的最低要求，并将它分别函送两个大会。两个大会经过讨论均予接受，并作出了相应的决议。

区委虽然在领导工运中注意了工人利益和国民革命的关系，但是群众发动以后，难免出现一些“左”的偏向，主要是在加薪运动中，工人店员提出一些过高的要求；不经政府即拘捕厂主、店主；对外商企业有盲目排外情绪。

区委对工运中存在的这些问题，于一九二七年初曾连续发出通告，指出“工人的经济要求，不能超过现在商人（包括厂主、店主等）的经济能力所能担负的范围”，“须知不顾客观的情势而一意孤行，则商人必被逼而反动，工人更有失业之虞，痛苦将更不堪，所以不问已得未得，今后遇必要时，可以退让的还要退让一点才行。”提出工人应对商民运动加以辅助，说“这正是巩固统一战线，领导国民革命的工人阶级的分内之责”（见一九二七年二月六日中共湖南区委关于《乡村工人运动的原则》的通告）。区委指示的这些精神现在看来是正确的。因为它涉及民主革命统一战线问题，涉及工人阶级的长远和根本利益，而且当时北伐战争正在进行，工人斗争也要服从战争的需要。

## （六）青年、妇女运动的发展

这个时期，青年运动也有很大发展。据一九二六年十

月统计，全区青年团员共有二千二百九十一人，建立了长沙、衡山等九个团的地委和衡山、水口山、锡矿山等地数十个团的特支。团区委书记肖述凡是一位很称职的同志，不幸于十月病故，后由蔡增准代理。委员除蔡外，还有李铁梁、史训川、田波扬。区委下设学委（书记田波扬）、妇委（书记沈凤音）、青农委（书记蒋晔）、经济斗争委员会（书记蔡增准）、宣委（书记史训川）、儿童运动委员会（书记蔡增准）。出版物有《湖南青年》。青年团在动员各界青年，特别是学生，支援北伐战争，参加各项政治运动的活动中，作出了很大成绩。

一九二六年八月一日，团区委发出“湖南青年目前应有的要求”，分别提出青工、青农、学生、青年店员、青年士兵的民主要求。九月五日，在长沙举行纪念国际青年日大会，通过了包括拥护国民政府；速开国民会议；召集省民会议，铲除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建立廉洁政府；要求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自由；统一青年运动；青年与童工同工同酬；青工每日工作八小时；改良学徒制，缩短从师年限，禁止为私人服役；发展农村教育；政府不得削减教育经费，停办学校；学生会得派代表参加校务会议，有表决权等内容的二十二项提案。随后，省学联于十月七日至十八日召开全省学生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组织问题、学生本身利益运动、文化运动、时局问题、拥护国民政府、巩固革命战线等议决案，要求教育厅采纳实行。一九二六年下半年，大约有三十多个县成立了学联组织，其中衡阳、常德、岳州、醴陵、湘潭等地方的学联组织比较健全，能

够领导当地学生在政治运动中发挥作用。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浏阳教会学校学生要求取消宗教课。十二月，长沙教会学校成智中学和小学学生要求不读圣经，不做礼拜和祷告。许多教会学校学生纷起响应。十二月十四日，省学联联合省教职员联合会、国民党省党部、长沙市党部等团体召集各公法团代表开会，议决成立湖南反文化侵略大同盟，并决定于十二月二十五日耶稣圣诞日举行宣传运动，开讲演会，演出新剧。夏曦、周以栗、朱剑凡和我都去讲了话。过去，在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斗争中，对于教会学校学生常取排斥态度，使他们站在运动之外。这次，纠正了这种偏差，教会学校学生也以“努力革命”相号召，积极参加社会运动。对于岳阳、益阳、浏阳等县教会学校学生在斗争中提出的一些过高要求，团区委学委曾去信纠正。

团区委的青工、青农工作主要结合在工、农运动中进行，提出青工、青农的特殊要求。在青工工作中又把学徒作为主要的工作对象，并注意青年工作特点，除发动他们参加政治经济斗争外，还注意加强文化娱乐活动，以此团结教育他们。

此外，团区委还开展儿童工作。通过省农协印发《怎样组织农村童子团》的小册子，着手在农村组织童子团。同时制定工会的劳动童子团组织法，作为各工会进行儿童工作的根据。已成立儿童团组织或进行筹备工作的有长沙、湘潭、岳阳、浏阳、耒阳、常德、南县、安源、醴陵等地。城乡童子团约有三万人。

这个时期党区委的妇委工作，因缪伯英调走，曾一度由我兼管。后来中央调熊季光回湘担任妇委书记。国民党省党部的妇女部长先后由我党党员黄颐、廖世劭、魏振立等担任。在长沙有影响的两个妇女组织，一个是省女界联合会，由我党党员罗问哉负责，一个是青年妇女学艺社，由我党党员谭国辅负责，它们在北伐战争中，发动妇女参加慰劳、宣传、救护工作，起了不小的作用。一九二六年下半年，武冈、茶陵、永兴、攸县、湘乡、沅江、岳阳、衡山、澧县、石门、蓝山、祁阳、东安、新宁、宜章、醴陵、新化、宁乡、郴县等县都建立了女界联合会或妇女解放协会。各县的女界联合会都是公团联合会的成员，它们提出妇女的要求，组织妇女参加反帝反军阀反封建道德的斗争。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至一九二七年一月三日，在长沙稻田女师召开湖南全省妇女第一次代表大会，有五十七县一百四十一名代表参加会议。会议发表宣言，提出男女平等，制定劳动妇女保护法，加强劳动妇女教育，禁止虐待妇女，结婚离婚自由，男校开放女禁等妇女的最低要求和口号。许多县向大会报告妇运情况，相互交流经验。这次大会，检阅了湖南妇女运动的力量，规定了全省妇运的计划和策略，提出了加强对劳动妇女的工作，建立各阶级妇女联合战线的任务，在湖南妇运史上有重要意义。

这个时期，区委对于妇女运动，要求将工作重点从女学生转到劳动妇女方面来，并要求将妇女的特殊利益同国民革命和工、农运动结合起来。随着湖南农村革命高潮的



出现，农村妇女积极投入了反封建的斗争。湖南农村劳动妇女在农运高潮中所表现出来的革命性，在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有很生动的描述。

### (七) 迅猛发展的农民运动。

#### 毛泽东回湘考察农运

北伐战争中，随着北伐军进入湖南，湖南农民运动的发展更为迅猛，成为革命发展的一个中心问题。一九二六年八月三十日，国民党省党部通告各县农运特派员，遵照国民党中央执委会颁布的农民协会章程组织新农会。九月十五日，省政府建设厅颁发整顿旧农会的四项办法：1.各县农协符合新章程者，保护提倡，与新章程抵触者，不准成立；2.取消旧农会及依据旧农会章程成立之农协；3.未组织农协各县，由省党部农民部商同省农协派特派员前往组织；4.旧农协房屋财产及经费，均由各级农协承接。这样，由于得到省党部和省政府的支持，农运得以公开进行，迅速发展起来。一九二六年上半年，广州农讲所五期毕业的部分湘籍学员回湘，由省党部农民部派往各县。同年九月，中央又派广州农讲所六期三十名毕业学员返湘，也陆续往各县开展工作。他们的回湘，大大推动了各县农协的成立和农运的发展。到一九二七年一月，由国民党省党部派至各县的农运工作人员有二百零三人，其中共产党员一百八十二人。一九二六年底至一九二七年初，省农协、湘江学校和国民党省党校开办了农运讲习班，招收市、县的学员，培养农运干部。不少的县，如衡阳、衡山、宁乡、岳阳、

宜章、湘乡、常德、醴陵、安化、攸县、新化、临澧、麻阳、浏阳、宝庆也都开办了农运讲习所或训练班，为本县农运培训干部。到十一月，湖南已有五十四个县建立了农协和农协筹备处，农协会员由十月的四十万人猛增到一百一十余万人。湘东南、湘北和湘中各县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政治经济斗争。湖南的农运已经由与北伐军合作进攻军阀的时期进入进攻封建阶级的时期。

在政治上，有些乡村的农协已经取得政权，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有些地方，农协同教联、商协、工会的联席会议，实际起着乡村政权的作用。许多地方，农民建立了挨户团的自卫组织，多数为梭标队，少数县，如平江、浏阳、安化、醴陵、湘潭等，农民从溃军或地主团防手中夺得少数枪枝。一九二七年初，省农协发布《湖南农民自卫军组织大纲》，筹建农民自卫军，设常备队。

在经济上，由于收租期已过，一般都准备着来年减租的斗争，只个别地方，如衡阳，因一九一六年借口水灾和增加教育经费，全县加了租，这次全县农民提出了复租要求，即恢复一九一六年以前的租额，取得了胜利。在这次运动中，衡阳农民加入农协者，约七万人。安化、岳阳、湘阴等县有减息运动。安化由月息七、八分减为四、五分。浏阳、岳阳等县有减押运动。攸县、醴陵、宜章、安乡等县有减税运动。比较普遍的斗争是开展平粵阻禁谷米运动，以解决荒月贫农缺粮、粮价暴涨的问题，有的由农协议决谷价，有的不准或限制谷米出境，有的发展到禁止酿酒熬糖。此外，诸如禁赌、禁烟、禁坐轿、禁演花鼓戏及剪发、

放足、砸佛像和祖宗牌位等改良封建宗教习俗的斗争也在农村展开。这样，在湖南农村形成了一个政治、经济、文化的大革命高潮。

这样一个广泛、深刻的社会变革，必然引起土豪劣绅的反抗。农民与土豪劣绅及其团防武装的冲突时有发生。一九二七年二月，湘阴发生土豪劣绅任德纯、任觉樵、彭伯藩煽动农民六百余人围攻农协，杀死农协会员的事件。三月二十日，省政府派军逮捕凶手。次日，土豪劣绅煽动农民将凶手抢回，军队被迫开枪，打死农民六人。事后土豪组织抬尸游行向省农协“请愿”。省农协曾为此事发表“为湘阴惨案告农友”书，号召农民勿受土豪劣绅挑拨，相互化除成见，联合向反动派进攻。这个事件既说明土豪劣绅对农民的仇视，也反映了农村斗争的复杂，要求我们必须十分注意策略。

为镇压各县土豪劣绅对农运的反扑，南县、沅江、浏阳等二十四县旅长沙人士组织了反劣绅运动大联合，于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向省政府请愿，要求严惩各县劣绅。十二月二十二日又向省党部、省政府第二次请愿。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区委决定通过国民党省党部会同省政府组织湖南省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省党部推定谢觉哉、易礼容、邱维震为委员。我也曾两次找县长商谈，催促长沙县成立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一九二七年一月，省政府公布了湖南省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这些措施都是对蓬勃发展的农民运动的支持，也是力图使这场农村革命有秩序有纪律地进行的一种尝试。一九二七年初，许多县如

长沙、浏阳、祁阳、城步、临湘等也建立了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各地掀起了一个镇压土豪劣绅的运动。一九二七年一月，由庞人健率人将杀害黄爱、庞人铨的主谋李佑文（赵恒惕政府的军务司长）捕送至总工会转卫戍司令部，经省审判土豪劣绅法庭判决，于四月五日处死。四月十一日，省特别法庭判处湘潭著名劣绅、袁世凯称帝时的湖南筹安会会长叶德辉死刑。四月十六日，长沙县枪决劣绅、“保产党”首领朱葆生。对土豪劣绅中的首恶分子和民愤极大者实行严厉镇压是完全必要的，不这样，不能发动广大农民，不足以平民愤。叶德辉是一个极为反动的劣绅，对他的处置，有利于推动外县依法惩治豪绅。由于他在知识界有声望，被处死后，社会上议论颇多，反应强烈。如果当时我们采取依法惩办，但免其一死的策略可能比处死他更为适当。

在这场农村革命的大风暴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左”的偏差，诸如擅自捕人游乡，随意罚款打人，以至就地处决，驱逐出境，强迫剪发，砸佛像和祖宗牌位……等等。这些作法容易失去社会同情。对谷米的平糶阻禁，以及禁止榨糖酿酒，禁止坐轿，禁止穿长衫等等，易使商人、中农和小手工业者产生反感，也使一般农民感觉生活不便。省政府因地主借口谷米无法出卖拒交田赋，军米收购困难，也不满阻禁办法。此外，还冲击了少数北伐军官家属，引起同湖南农村有联系的湘籍军官的不满。这些虽是运动的支流，但不利于巩固和扩大农村联合战线，最大限度地孤立打击敌人。

区委于十月下旬就已觉察到这些问题，十月三十日和十一月十五日，区委给中央的报告在指出土豪劣绅反动势力攻击农运的同时，也指出了这些偏差，认为有使贫农陷于孤立的危险。针对农运中的问题和土豪劣绅的反扑，区委决定的政策是：促使国民党左派加入农运，要在农运中与左派合作，并通过国民党促省政府镇压破坏农运的反动势力；将农运实情公诸社会，打破土豪劣绅的造谣中伤，对国民党内不大反动的右派作必要的让步，以减少农村革命的阻力，使团防局的不作恶者中立，择作恶者进攻；在农民中发展党的组织，加强对农运的领导，矫正左倾幼稚病。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召开的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在总结前一阶段农运经验，揭露各地土豪劣绅压迫、破坏农运罪恶，支持农民革命行动，确定进一步开展农村政治经济斗争的同时，对于平糶阻禁问题作出了政策上的限制，规定在保障当地民食需要的前提下，余谷准予流通，不限价格，并规定煮酒熬糖，非特殊情形不可禁止。当时区委认为农村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从农协角度检查，主要是由于成分不纯，混进不良分子所引起，因而在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关于组织问题议决案中，规定了各地农协必要时可“进行洗会运动，以淘汰不良分子”。会后，省农协专门为此发出布告，规定“乡农协执行委员，须绝对是耕田的农民，专营手工业或体力劳动者亦可，其他分子，尤其是地痞流氓应严加淘汰”。“区农协的执行委员，五分之三需属真实农民充当，专营手工业或体力劳动者亦可，五分之二则属于有职业的知识分子或是在行动上表现为农民谋利

益的人。带有地痞性的人严厉禁止，以免扰乱农民的组织”（见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一日湖南《通俗日报》）。区委于一月十六日发出通告，指出因绝对阻禁所引起的经济政治后果：“（1）从前自耕农、佃农等，都是用谷米兑换油、盐、棉花等杂货，以调济其生活。现在谷米不能出境，谷价低落，各地商店都拒绝不要谷米，都要现钱才有货卖，农民无现钱就不能购买货物，就感觉十分困难，（2）……现在因各地阻禁平粜的结果，谷价日见低落，金融闭塞，自耕农、佃农等小资产阶级的农民，将有脱离农协之趋势。现在湖南的农民运动变成了一个贫农运动，这个运动如果不急谋救济的办法，在农村中要变成‘广东的三月二十日’，在农民中要造成巨大的反C·P的空气，使农民运动发生绝大的危险”。通告规定：“1. 即时督促省政府通令各县、各地团、保，会同农协迅速巡仓，决定留谷数目，余流通。2. 省农协再出布告，要各地农协不要死阻禁，说明谷米应当流通”。通告并说明省政府为此所发通令中和省农协布告中所列办法，都是经区委赞同的。为加强农村中农民和手工业工人、店员的团结，区委在二月六日发出的通告中规定乡村手工业工人不单独组织工会，而加入农民协会，农协设一手工业部，管理乡村手工业工人的工作。农村中商店也不成立商民协会，店员不组织店员联合会。区委所作的这些规定，都是为了纠正前述农运中出现的“左”的偏差，以达巩固和扩大联合战线的目的。但是，在执行时又出现了一些新问题，如简单发布告限制农民运动；对农会以“洗会运动”的形式进行整顿，有的地方在洗会运动中采取捕人、

关人办法，挫伤了农民的革命热情，且给土豪劣绅破坏农协以可乘之机。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毛泽东应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的邀请，自汉口至长沙参加大会。工、农两个大会举行了欢迎会。他在会上讲话，强调工农商学联合战线的重要意义，指出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并根据国民革命的进程，指出“我们现在还不是打倒地主的时候，我们要让他一步。在国民革命中，是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土豪劣绅，减少租额、减少利息，增加雇农工资的时候。”

一月四日，毛泽东由戴晓云陪同下乡视察。下乡前，国民党省党部召开常委会，对这次视察作了安排。原定视察的县，除湘潭、湘乡、衡山、醴陵和长沙外，还有宁乡、新化、宝庆、攸县、武冈、新宁等，后因时间关系，后面的几个县没有去。毛泽东还曾应区委之邀，在区委举办的、由参加农民代表大会的党、团员参加的训练班上作了三次关于农民问题及调查方法的报告。在视察湘潭、湘乡、衡山三地后，区委又请他向区委、党校和团校各作一次报告。视察醴陵、长沙后，又在区委作了一次报告。我记得，有一次报告是在湘江学校楼上作的，作报告时，他手里拿着一个报告大纲。二月五日视察结束，二月十六日，毛泽东向中央写了一个报告大纲。在这个报告大纲中，他提出，党应当（一）以“农运好得很”的事实，纠正政府、国民党、社会各界一致的“农运糟得很”的议论。（二）以“贫农乃革命先锋”的事实，纠正各界一致的“痞子运动”、“惰农运动”的议论。（三）以从来没有有什么联合战线存在的事实，纠正

农协破坏了联合战线的议论。他认为农运应分三个时期：第一、组织时期，第二、革命时期，第三、建设统一战线时期。无论何地，必须经过第二时期，始能渡到第三时期。而目前湖南的政治问题，莫急于完成乡村自治这一点，以改变乡村中无政府为有政府状态，具体的建立农民统一战线。他还提出要立即解决贫农的土地问题和资本问题，在农村中要大力发展党，以应付急剧发展的革命形势。三月五日，在湖南区委机关刊物《战士》上发表了他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全文。毛泽东的这个报告是一篇经典性著作。它指出：1. 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农民革命是挖掉帝国主义、军阀、官僚统治墙脚的基本力量；2. 贫农是农民革命的领导力量；3. 农民武装问题的重要；4. 共产党应当站在前面领导农运。报告热情洋溢地歌颂了农民运动，有力地批驳了对农运的各种攻击，用充分的事实说明革命的农民不但能够推翻豪绅地主的政治统治，而且能够建立自卫武装，掌握政权，对反动势力实行专政；并动员群众对乡村经济文化等公益事业进行力所能及的建设，进行可能的移风易俗的改革。毛泽东的这些思想后来在土地革命战争中，发展成为建立工农联盟、工农红军、革命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成为以后完整形成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和总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的这篇《报告》和给中央的报告大纲，由于其主要锋芒是指向党内和统一战线内一部分人的右倾思想，以及来自阶级敌人对农民运动的攻击和诬蔑的，因而在一些具体策略的分析上，不能不带有当时



形势的具体特点，存在着某些不足。譬如：1. 将那些“踏烂鞋皮的，挟烂伞子的，打闲的，穿绿长褂子的，赌钱打牌四业不居的”游民，即流氓无产阶级当作贫农的一部分，列入革命先锋之中，说他们“最革命”，缺乏一分为二的分析；2. 认为组织时期、革命时期的农村中本来就无统一战线，只有到第三阶段才进入建立联合战线的时期；3. 将“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就不能矫枉”作为带有普遍性的规律提出。

关于第一点，农村中确实有一些游民（或称流氓无产阶级），他们有革命性，在农运兴起的地区，打先锋的常常包括这样一些人，但是对他们需要作一分为二的分析。因为这是一个动摇的阶层，其中一部分易为反动势力所收买，另一部分虽然参加革命，也要在革命中对他们进行改造，防止他们的破坏性。一九二五年底至一九二六年初，毛泽东在一些文章中也曾对游民无产阶级作过分析，说：“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要“劝他们帮助农民协会一边，加入革命的大运动……切不可逼其跑入敌人那一边，做了反革命派的力量”（见毛泽东《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革命的态度》）。说明他已经注意到游民的两面性。但在《报告》中，为了要回击对农运的反动叫嚣，就只强调了他们革命性的一面，忽略了另一面。记得毛泽东在区委作报告后，征求我的意见，我提出了上述看法，他表示接受。后来《报告》收入《毛泽东选集》时，就把“踏烂鞋皮的……”一段话删去了。

关于第二点，当农民发动起来猛烈向封建势力冲击时，

当然不能要求群众的每个行动都符合政策。但是，我们党应当努力引导贫雇农团结大多数，建立最广泛的农村革命统一战线，以打击最主要的敌人。事实上，当时在乡村农协中，普遍有手工业工人、革命知识分子参加，形成三者的联盟，个别还有不带封建剥削的富农参加。我的家乡即有这样一个富农在马日事变后被杀害。毛泽东在《报告》中也谈到有富农参加农协的事。有的哥老会分子也加入了农协。须知在北伐胜利的形势下，一切受军阀、豪绅剥削压迫的各阶层的人们中，会有许多卷进高潮中来的。

关于第三点，“矫枉必须过正”是有条件的，不是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比如，熟铁弯曲可以过正，生铁弯曲，过正就要折断，这是自然现象。在社会生活中也是如此，反“左”如果必须过正，就变成右，反右过正就变成“左”。毛泽东在口头报告时，还讲了“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的话，一时流传甚广，到处写成标语，影响极大。

对于《报告》中的这些缺陷，毛泽东在后来的革命实践中，都加以纠正了。他在抗日时期发表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就没有再把流氓无产阶级当作贫农的一部分，而是专门写了一节“游民”，对之作了具体的分析。到抗日时期，他的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就发展得十分成熟了。

我和区委的同志对《报告》的总精神是完全赞同和接受的。区委还专门开会讨论《报告》中提出的问题，改变了前一阶段认为农运过左和纠正农运过左的观点和作法。一九二七年二月，我们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作了自我批评：“我们在此社会群向农运进攻之包围中，我们亦自认现在农

运的确是太左稚（这是当时对左倾幼稚的简称），于是通告禁止农协罚款、捕人等事，而且限制区乡农协执行委员，皆须现在耕种之农民担任，对于罚款，逮捕之人，皆须扫除，几乎不自觉的站到富农、地主方面而限制贫农。自润之同志自乡间视察归来，我们才感贫农猛烈之打击土豪劣绅实有必要，非如此不足以推翻现在乡村之封建政治”，“故可说此时改变从前站到富农、中小地主方面限制贫农之错误观念矣”。报告又说：“不过现在乡村之小资产阶级——富农、中小地主，已日渐离开我们而有与土豪劣绅结合共同向我们进攻之势，故此时不能不劝告贫农让步”（引自一九二七年二月中共湖南省委《关于湘区一月份农民运动报告》）。这反映了区委已接受了毛泽东《报告》中的观点，但对农村斗争中，中间势力日渐离开我们的现实又未得到科学解释的矛盾心理。区委的这个报告把富农、中小地主划为小资产阶级也是不妥的。同年三月，区委还发表了一个对湖南农民运动的宣言，并于四月组织了一次农运宣传周的活动，根据毛泽东《报告》的精神，驳斥了对农运的“怀疑派”和“稳健派”的所谓“惰农运动”的议论，赞扬农民的革命行动。随后，省农协及一些县的国民党县党部和农协也出布告、发通告，停止洗会运动。但这些布告和通告又赞扬并支持了包含许多“左”的偏向的农民行动，称之为“完全革命的行动”。

一九二六年底和一九二七年初，当革命日益深入的时候，迫切需要党从指导思想上划清正确和“左”右偏向的界限，注意争取中间势力，扩大联合战线，区分革命步骤，

制定具体措施，引导革命走向正轨。区委并未作到这点，而在应该怎样看待农民革命斗争中发生的“左”倾偏向问题的指导思想上摇摆不定，在开始纠正群众运动“左”的偏向时，又有过如洗会运动中出现的右的失误。

中央在一九二六年九月和十二月，曾两次在报告中表扬湖南区委，“对付各种问题的策略”“稳当周到”（见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日《中央局关于最近全国政治情形与党的发展的报告》）。上述情况说明，对这个表扬，区委是当之无愧的。

#### （八） 中共中央十二月特别会议

我在参加了湖南省工人、农民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幕式，并在以后的几次会议上作了关于世界政治经济状况、中国政治经济状况和中国共产党与工农阶级等三次讲演之后，大约在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上旬离湘去汉口参加党中央的特别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陈独秀、瞿秋白、张国焘、毛泽东、任弼时等。会前，湖南区委曾经讨论湖南的农民运动，认为从湖南农运的发展趋势看，应该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会上，我汇报了区委对土地问题的意见。毛泽东赞同湖南区委的主张，但陈独秀和鲍罗廷不赞成马上解决土地问题，认为条件不成熟，说目前主要是要满足农民的减租减息，武装自卫，反抗土豪劣绅，反抗苛捐杂税的迫切要求，并且认为不应以赞成不赞成解决土地问题作为是否左派的标准。会议基本上按照陈独秀和鲍罗廷的主张通过了决议。这次会议还讨论了北伐战争的形势，联合战线和湘鄂赣三省工农运动等问题，通过了《关于国民党左派问

题议决案》、《关于湘鄂赣三省农运议决案》、《关于湘鄂赣三省党务议决案》等文件，强调要努力巩固和发展国民党左派势力，帮助他们取得在国民党和政府中的领导地位和得到城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农民群众的支持。

如果说七月召开党的四届三中全会正值革命高潮开始之际，革命形势如何发展尚属未知，各方矛盾也未充分暴露，那么十二月中央会议时，革命高潮已经形成，北伐战争已经取得巨大胜利，占领了长江中游几省并正在向下游发展，统一战线中的矛盾也暴露得日益明显。这时革命形势已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即深入发展、巩固胜利的阶段，同时也是扩大和巩固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阶段。这个阶段最主要的任务，一是实行土地革命，巩固工、农、小资产阶级的联盟，二是纠正忽视革命两手准备的错误，千方百计创立我党领导的革命军队。如果我们党能够制订指导革命的正确方针，革命发展可能比较顺利。但是十二月特别会议既不吸取“三二〇”事件以来的教训，不提创立党的军队，又完全主观地否定农民土地革命的要求，说明陈独秀投降主义已经开始在党中央占据领导地位。以后每况愈下，终于造成在反革命突然袭击时无力还击的局面。

### （九） 湖南的土地问题

一九二六年底，湖南农民逐步开展了减租减息的斗争，到一九二七年初，在农民革命已经推翻豪绅统治的地方，农民以各种方式提出了土地要求。

当时，湖南农村带普遍性的斗争是阻禁和平果，“有

农民组织的地方十之七、八”都存在此现象。这也反映了农民——主要是贫农要求改变没有土地，常年吃红薯、少见谷米的穷苦状况。有的地方，如过去长沙市郊，因为土地没有丈量，照通常计算只要交一石租的田，却要收四石租。因此，农民要求按实际地亩交租，开始了丈田活动。其他地方也有类似情况。但是，清丈田亩只对有田可耕的佃农有利，许多无田可耕的失业农民仍是毫无办法，所以，失业农民要求“平均佃权”，将田土的耕种权重新分配。

一九二七年初，中央将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问题的议决案发至各地，要各地党组织进行讨论。共产国际七次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议决案，对于迅速发展的中国革命形势作了分析，指出：“在现时革命发展的过程阶段里，土地问题开始紧急起来，成为现在局面的中心问题”，“彻底的土地政策之实行，乃是反帝国主义胜利及革命往前发展的先决条件”，“中国共产党应当承认‘土地国有’为无产阶级的农村政纲之基本要求，但在现时，必须按照中国各地的特殊经济政治情况而分别的应用农村策略”。会议提出了农村革命的具体政纲十一条，除提出减租、废除加在农民身上的各种杂税、武装农民等外，还提出要“没收属于反动军阀的寺院地产，及对国民政府作战的买办、地主、劣绅等之土地”，也就是先实行政治没收的办法。湖南区委在长沙学宫街的区委机关开了三次会讨论共产国际的决议，一致赞同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应准备将土地革命作为重点的意见，认为农民已在量地、插标、要求分田，从湖南农运的发展趋势看，也应解决农民的土

地问题。因此，区委积极支持农民的“平均佃权”的行动。一九二七年三月，区委发表《对湖南农民运动的宣言》说：“目前最急迫的问题是怎样解决贫农问题。这些贫农有的是一家耕地太少，不足自给的佃农，有的是雇农，……他们的困难是缺乏耕作的土地和资本，现在贫农中流行的思想是‘平均佃权’，他们觉得每个农民应该有两亩地的耕种权。……必须于最短期间使这些贫农能够满足这一低度的要求”。三、四月间，湘潭、醴陵、长沙、浏阳等地的农民开始自动起来分地主的田。首先是长沙附近的霞凝乡，农民按人口分田，成年人每人分产谷八石面积的田，未成年的依年龄大小，给以产谷四石至六石的土地。这说明解决土地问题已日益迫切了。一九二七年四月，我写了《湖南革命的出路》一文，提出：“湖南革命已发展到了一个新时期，这个时期要求我们确定新的策略。这个时期的中心问题，便是土地问题，解决了土地问题，便是解决了我们革命的出路问题。”认为：“土地问题的解决，是推翻封建阶级的最后胜利，是民主革命的最后完成。土地问题的解决，农民问题、财政问题才得着真正解决，工商业才得发达。……才能将封建残余、封建思想兜底打破。农民已从各方面提出了土地问题，我们不起来解决这个问题，便不能领导国民革命成功”。提出目前应即“(1)确定实现耕地农有的具体方案。(2)要解决土地问题，武装农民是最紧要的工作，应于最短期间采用各种方式——缴团防的械，由政府发械——使农民至少得到三万支枪。有很好的训练和组织……(5)实现民众政权——乡民会议、区民会议、县民

会议、市民会议、省民会议接受政权，选举各级政府，反革命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以上内容大体上反映了区委的观点。我们认为土地问题解决了，阻禁平粜的问题自会迎刃而解。我们还认为，湖南的财政因为战争的关系，仍旧继续过去的旧政策，并未实行改革。这种旧政策与革命已发生矛盾，许多人不缴田税，苛捐杂税也不能再收，致使湖南的财政入不敷出，造成很大困难。如果解决土地问题，即便土地税略增一点，农民也会踊跃缴纳，财政困难也就可以解决。

“五大”前，湖南代表团在长沙集中开了几次会，经过多次讨论，拟定了一个土地问题决议的提案，准备向大会提出。提案的内容大体是：“（一）先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先没收一百亩以上的，一百亩以下的不没收，自耕农不去扰及他。（二）到明年实行平均地权”（引自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九日夏曦在国民党土地会议第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以全国农协临时执行委员会负责人的身份，也向大会提过一个土地问题的提案。但是这两个提案都未交大会讨论。我们曾向大会秘书长蔡和森查询原因，他说，国民党正在召开土地委员会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党有关解决土地问题的意见，应与他们通过的决议一致，因而要等他们作出决议，所以湖南代表团的提案就不必在这次大会详加讨论。“五大”会议上，对土地问题的解决大体有三种意见：1.先实行政治没收，即只没收反动军官和反革命的土豪劣绅的土地和财产；2.没收除小地主和革命军官以外的土地；3.没收一切土地。最后通过的《土地问题决议案》，



决定“没收一切所谓公田以及祠堂、学校、寺庙、外国教堂及农业公司的土地”及“无代价的没收地主租与农民的土地交诸耕种的农民。属于小地主及革命军人的土地不没收”。当时，我们和中央在解决土地问题上的重要分歧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部分人，包括国际代表鲍罗廷、罗易认为，解决土地问题要以国民政府颁布的法令为遵循，因而主张等国民政府公布土地法令后再进行工作。而毛泽东和湖南代表团则主张不要等法令公布，就可以在湖南立即实行自下而上的插标分田。我记得，在“五大”后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就发生了这一争论。会上，李立三为武汉工人运动中出现的一些“左”的偏差作解释，国际代表罗易批评了他。我在会上又提出，秋收后湖南应实行插标分田，也受到罗易的批评。他说，农民自己动手插标分田，还要共产党干什么？末了，争吵一顿，无结果而散。

国民党的土地委员会从四月上旬开会，直到五月六日才原则上作出没收反革命和大地主的土地，而在目前还只实行减租减息，地租不得超过百分之四十以上的规定。就是这样的一个决议，后来送交国民党中央讨论，也决定暂不公布，只是同意湖南可以搞个单行条例，可以先走一步进行经济没收。这些都未及实行，不久，湖南就发生了马日事变。

## 大革命的失败

### (一) 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湖南人民奋起反蒋

一九二七年春，在全国革命猛烈发展的同时，统一战线内部隐藏的危机日益暴露，无产阶级同大资产阶级的斗争日益激化。四月十二日，蒋介石集团终于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广州也相继发生“四一五”反革命政变。

对于蒋介石为首的反革命政变，湖南人民十分愤慨。区委通过国民党省党部和群众团体组织了声讨运动。四月二十六日。长沙各界举行讨伐蒋介石及反对帝国主义的示威游行。我和谢觉哉、徐特立、鲁子源、张翼鹏、黄德安、李荣植、邱维震等在会上讲了话，揭露蒋介石叛变和帝国主义武装干涉中国革命的罪恶。四月二十八日，长沙又举行追悼沪、赣、皖、川被蒋介石等反动派惨杀的死难烈士大会。平江、浏阳、常德、桂阳、湘潭等县、市国民党党部及群众团体也都发出讨蒋的快邮代电。这些活动，在湖南群众中形成了浓厚的反蒋气氛。

(二)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  
扩大全会《关于中国形势问题  
的决议》和党的“五大”

在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内部的阶级斗争日趋尖锐的时刻，一九二七年初，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传到中国，中央政治局对这个决议案所指出的中国革命要向非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过渡，今后革命的动力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革命的中心任务是开展土地革命等要点，“经过详细讨论与辩难之后”，决定接受，并检讨了我党的“一个根本错误”，就是“把国民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划了很大的‘天然的不可以人力逾越的’一道鸿沟”，所以，“自第四次全国大会以来所高叫的国民革命中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去年第二次扩大会议以来所高叫的和资产阶级争领导权，都成了好听的一句空话”。政治局确定今天要“更扩大更强固由无产阶级领导农民及一切被压迫阶级的民族革命联合战线”，要把“国民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看做整个的中国革命。”在“我们的革命方针和战略上，必须抓住这两种革命的连锁，使之一气呵成”（见《中央政治局对于国际第七次扩大会议中国问题决议案的解释》）。

中央把共产国际的决议案和中央政治局关于接受国际决议的解释发至各区委、地委和特区讨论。前面说过，湖南区委为此开过三次讨论会，一致赞同国际的决议和中央

政治局的解释,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见解(这些见解见之于当时区委发的文件或负责人的文章中),认为,国际决议指出中国革命的非资本主义前途的发展方向,是非常必要的。同时认为“现在是国民革命时期,不是社会革命工农专政时期”(见一九二七年二月十六日《中共湖南区委关于如何实现乡村民主政权的通告》);分配土地作为党的中心工作,完全符合湖南农村的实际需要,“农民运动绝不是超过国民革命的运动”(见一九二七年三月《中共湖南区委对湖南农民运动的宣言》);“土地问题的解决,是推翻封建阶级的最后胜利,是民主革命的最后完成”。(见一九二七年四月李维汉《湖南革命的出路》)。

全党这次对国际决议的讨论,为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召开作了思想上的准备,它对肃清以陈独秀、彭述之为代表的在党内普遍存在的“二次革命论”的思想,加强全党在国民革命运动中与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斗争的自觉性,确有一定作用;缺点是在批判“二次革命论”的同时,又出现了所谓“一次革命论”的偏差。它支持了在工农运动中存在的某些“左”的情绪。此外,无产阶级要真正能够夺取革命的领导权,必须手中有枪杆子,对于这个在客观上虽然为时已晚的根本问题,当时党在主观上可以说仍然没有什么认识。

一九二七年四月下旬,党在汉口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分析了蒋介石叛变革命以后的政治形势,回顾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过程,指出了党在统一战线中忽略这个斗争,以及过去忽视或不重视

土地问题和乡村民主政权的错误。大会提出无产阶级在与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中”，“必须在农民中得到同盟者”；党只有通过土地革命，才能“建起雄伟的革命军队，并能使革命永立于不败之地”；而减租减息、分配土地又“非有农民自己的武装和政权不可”。大会认为土地问题的解决和乡村民主政权的建立，是深入革命、巩固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政策，会后必须落实。大会所提出的这些问题都是正确的。它较之党的“四大”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又有了进步。

但是，这次大会并未能根本纠正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的右倾错误，仍然坚持了只注重群众运动，忽视掌握军队领导权的错误方针。注重群众运动，无疑是正确的，但不掌握军队，就是大错了。尽管在“四大”以后，我们有过在北伐战争中革命武装为工农群众运动打开道路的正面经验，也有过中山舰事件，特别是刚刚发生的蒋介石叛变的惨痛教训，但是“五大”并没有真正从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因此，大会决议虽然提出了农民自卫队可以“保障自治政府及革命的胜利”，工人纠察队“是保障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主政权的武装之一”，也提出要改变军队成分，派工人去当兵，促进军队革命化的任务，却没有把它同无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任务联系起来，对于建立我党直接掌握的军队的重要性、急迫性仍然缺乏认识。在政权问题上，大会虽然主张共产党参加国民政府和省政府，同国民党共同担负责任，共同担负政权，但同时又表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参加国民政府工作，并非是以竞争者的态度要夺

得政权”。这仍然是将自己置于在野党的地位，重复过去的错误观点。对于武汉国民党和武汉政权内部的阶级关系及其斗争，缺乏科学分析，仍然坚持联合的一手政策，没有被迫破裂的另一手准备。这些右的错误是继续导致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五大”存在着上述右的错误的同时，在革命性质、阶级关系的分析上也开始滋长“左”的情绪。它没有把叛变革命的大资产阶级和虽处于动摇中而仍然应该尽可能争取的民族资产阶级区分开来，将蒋介石的叛变看作“是代表了一个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叛变。认为蒋介石叛变后的革命统一战线的组成只包括工农和小资产阶级三个阶级的联盟，确定职工运动的方针是“要极力从政治上、经济上向资产阶级勇猛的进攻”。在这个阶级分析的基础上，“五大”认为“国民革命已经冲破了资产阶级式的民权主义之限制”，“而是直接走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斗争”去了，而这个“冲破”和“直接走到”也就包含了反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内容。

当时，我党把中等商人同小商人一起，划入小资产阶级的范围，而民族资产阶级则是指从买办阶级中分化出来的，同外资联系较少或没有联系的民族企业家，即民族工业资产阶级。“五大”将中等商人划入小资产阶级，并将小资产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同大资产阶级混同看待，这种阶级划分是错误的。蒋介石主要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民族资产阶级，包括上层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由于战争，特别是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经济封锁，加之工农运动中存在的某些“左”的偏向，一般已处在

动摇中，其中小部分正在向右靠拢，但是它们尚未完全倒过去，仍然是应该和可能争取团结的对象。

当时，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历程的分析，有一个“三阶段论”。第一阶段，大体是“五卅”运动以前，革命动力是工、农、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而“民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为主要推动力之一”。第二阶段，大体是从“五卅”运动开始，上述四个阶级联盟的结构发生变化，工人阶级作为首要的政治因素出现在中国舞台上。第三阶段，“运动的主力，将是一个更有革命性的结合——无产阶级、农人及城市小资产阶级的结合，而离开一大部分大资产阶级”。“在这个阶段中，革命运动的领导权，将日益落在无产阶级身上。”（见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关于中国形势问题的决议》）认为蒋介石集团的叛变，表明中国革命已经进入了这第三个阶段。共产国际把蒋介石集团叛变后的武汉政权看作是工、农、小资产阶级联盟的政权，把汪精卫等看作是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家。对于共产国际的这个分析，我党是完全接受的。事实上当时武汉政府并不仅仅是工、农、小资产阶级三个阶级联盟的政权，汪精卫等也并不是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他们代表的主要是资产阶级，有些人也代表豪绅、买办阶级。在武汉政府及其所属的军队中就包括了暂时还赞成北伐的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对于武汉政府中的这种阶级关系，无论是共产国际或是我党中央，认识都过于简单。当时，如果我们党对此认识得比较清楚，对同盟者有一套又联合又斗争的正确政策，手中又有能够使这

些同盟者感到我们有可以依靠的力量，那么争取这些同盟者留在统一战线里面的可能性就会增大。但是，共产国际和我们党的“五大”所作的上述分析以及制定的笼统地反对资产阶级的“左”的方针，从主观上排除了这种可能性。

“五大”是在蒋介石叛变以后，武汉国民党也即将分共的前夜召开的，政治局势已经十分险恶。“五大”不但没有对险象环生的局势作出清醒的估计，甚至有一种盲目乐观的情绪，简单地认为资产阶级脱离革命，不但不会削弱革命，反能减少革命发展的障碍。这种观点，导致我党中央把希望寄托在以唐生智等武装力量为支柱的武汉国民政府和武汉国民党中央身上，给以信赖和支持，到后来更是节节退让。“五大”以后，我党仍然不作两手准备，没有大力去抓武装，特别是不抓军队，而只是单纯地片面地强调纠正工农运动中的“左”倾幼稚病，以维持同武汉国民党、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军事首脑的联合。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的这种片面的纠正“左”倾幼稚病的观点，从上年十二月中央特别会议起一直在继续发展。甚至到马日事变后还发出指示继续纠“左”。这些都是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表现。

### (三) 马日事变

我在“五大”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五届一中全会后，中央决定调我到中央组织部任部长，湖南省委书记的职务由夏曦接任（“五大”后湖南区委改称省委），并要我回省做两件事：一是向夏曦交代工作；二是帮助省委根据国民党土地委员会的土地问题决议草案，拟定一个湖南土地问题



的单行条例。

行前，我从汉口过江到徐家棚买了车票，返回住处时，有一个中央的交通员在等我，说中央同国民党代表正在开联席会议，要我去参加。当我赶到时，会已散了，只陈独秀和瞿秋白还在。陈独秀对我说：你来晚了，夏曦参加了会，会议讨论的事他都知道，我们和国民党将要联合组织考察团去湖南考察农运，你马上打个电报告诉省委，要他们迅速采取措施制止农运的过火行为。我说：我们采取过措施，也报告过中央了。现在我马上就要回省，可在省委内讨论以后再说。陈独秀很焦急地一定要我马上发电报。我还是坚持回去经省委讨论后再说。陈发了脾气，我也生了气。瞿秋白出来调解，结果不欢而散。后来我才知道，电报早已由夏曦打回去了。

大约在“五大”闭幕后十天，我回到长沙，把省委书记职务交给夏曦，移交了工作，并帮助省委按照国民党土地委员会通过的 land 问题决议草案，起草了一个土地问题单行条例。约五月中旬，我任务完成正准备回汉口时，发生夏斗寅叛变，武长路中断，无法成行。省委与中央的联系也中断了。

夏斗寅事变发生后，长沙风声紧张，我见到邓寿荃，问他情况如何。他说，形势紧张，有可能出事，要我外出时最好有人保护，晚上不要出去。我和省委估计湖南也有发生反革命事变的可能，因此省委通告各县，工农武装要准备就地自卫，并指定了四路总指挥。“马日事变”前一天，五月二十日晚上，省委开会，书记夏曦提出，如发生事变，

几个公开活动的负责人郭亮、戴晓云、李维汉和他本人，在长沙很难隐蔽，应转移地方。我同意他的提议，但主张：（1）省委几个负责人分四路转移，就地指挥工作（记不清是否已决定什么人到什么地方），同时派人到中央报告请示，我自己则设法回中央。（2）在长沙成立秘密临时省委。大家同意这样办，决定薛世纶、王则鸣、林蔚为临委成员，薛世纶为书记。并给准备转移的几个人和我发了用费。

第二天（五月二十一日）早餐后，接到报告，知道夏曦没有告诉省委就走了，只在国民党省党部办公室留了一张条子，说是同凌炳去武汉向中央报告工作。当天，国民党省党校举行开学仪式，原定夏曦代表中共湖南省委出席讲话，临时只得由我代替。我在讲话中宣传了土改的必要性。下午，我又出席长沙市委活动分子会，报告形势，提出要准备应变，领导机关要作转入地下的准备。

由于夏曦出走，晚上省委又开会，推郭亮代理省委书记。当日已得悉夏斗寅被击溃，但省委会上分析形势时，估计反动事变仍有可能发生，决定原先确定的工农武装准备就地自卫、成立秘密省委等准备应变的方针和措施继续有效，并要抓紧向中央请示。散会不久，约在十时左右，枪声四起，事变发生。驻长沙的三十三团团团长许克祥、三十五军教导团长王东原、三十五军留守处主任陶柳、三十六军留守处陈其祥等率兵千余人，分途袭击国民党省、市党部、省工会、省农民协会、省党校，将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总队缴械，捣毁特别法庭，释放被关押的土豪劣绅，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不久，国民党右派分子彭国钧、

仇鳌、萧翼锷等即在长沙组织了包括许克祥、陈其祥在内的反共的“救党委员会”，宣布脱离武汉政府，服从蒋介石的命令，并通令恢复全省的地主团防武装，在全省范围内恢复反动政权，在各县实行反革命的“清乡”。

事变第二天，五月二十二日凌晨，我转移至长沙近郊离城约二十里左右黎瑾（党员）的家里隐蔽。黎瑾的父亲是地主，同徐特立友好。后来徐特立也来他家，和我同住一室。我住黎家期间，同省委有过三次通信，彼此用的都是代号。信的内容记得有：（1）建议省委尽可能同中央取得联系，报告请示；（2）建议那个土地单行条例作废，准备秋后动手插标分田；（3）省委来信计划组织长沙城区郊区暴动（并非后来的各路农军进攻长沙的计划），我不赞成，认为工人纠察队武装已被缴械，省农协武装已转移或溃散，搞城郊暴动，实属冒险，而且此事关系全局，应当请示中央。当时不知省委是谁在主持工作，直到一九七九年，经了解才知道郭亮于二十二日即离长沙去湘阴，二十四日到了武汉。薛世纶临阵逃跑，只林蔚和王则鸣在长沙坚持，临时省委由林蔚主持。

五月三十一日上午，黎瑾报告浏阳农民自卫军来了。我感到突然（因为不知有外县农军进攻长沙的计划），当即前去联系。在路上看到自卫军正向小吴门前进，妇女宣传队走在前头，后面男自卫军有背枪的，有肩梭标的，还有挑炊事用具的，行列混杂，不象要攻城打仗的样子。我在离城不远处，找到县委书记潘心源，我问他们怎么来的？他说是三天前，柳直荀自株洲打来电话，要他们五月三十一

日来长沙会师。他问柳直荀来了没有？我说不见来。我问他农军开来多少？他说动员仓促，只通知各区如期开拔上路，未能总集合，数目不知多少。谈话间，忽闻小吴门方向有枪声，农军随即退却。潘心源问我城内敌人有多少，我告知大约有三千，他说那攻城没有把握。又问我政治形势，我说报上登载以谭平山为首的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组织的特别委员会要来湖南，可见国共两党中央合作关系没有发生问题。他问我现在农军怎么办？我说可以退回原地自卫，听候中央指示。潘未再说什么，就赶队伍去了。

以上总括起来，我在“马日事变”过程中主张的方针和措施，可以归结为三点：（1）工农武装就地自卫，省委负责人分四路指挥；（2）总的方针应等候中央指示；（3）党组织应转入地下。至于“马日事变”后临时省委决定发动各县农军进攻长沙以及后来又奉命停止等情节，我并不清楚。

中央对待“马日事变”的方针，现在根据一些材料分析，是和平解决。如五月二十五日中央政治局议决的《对于湖南工农运动的态度》、五月二十六日中央政治局的决议和六月一日中央政治局议决的《农民运动策略大纲》中，都体现了这个方针。

五月二十五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派谭平山、陈公博、彭泽湘、周鳌山、邓介松组织特别委员会赴湘调查军队与农工冲突事，鲍罗廷也随行。他们提出处理湖南问题的五点意见是：（1）改组湖南省政府；（2）改组湘省党部及农协、工会；（3）裁判越轨军人，由周斓调查；（4）

命令停止军队与农工之军事行动，不听者严厉执行；（5）其余善后问题，听中央办理。六月十三日，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和政治委员会讨论马日事变的解决办法。根据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的会议记录记载，国民党中央“讨论的结果，是对于湖南事件不用武力解决，免得引起纠纷。唐生智同志并愿意亲自到长沙去走一趟。以和平的方式，实行改组农民协会及农政部所提出之乡村自治条例等计划。毛泽东同志也承认不用武力的办法是对的”。会上吴玉章也赞成和平解决。当时毛泽东是中央农委负责人和全国农协临时执行委员会负责人，吴玉章是国民党中央秘书长，他们赞成和平解决的方针不可能只是他们自己的意见，而是贯彻中央的方针的。

中央对马日事变持和平解决方针的原因，在五月二十六日的决议中说得很清楚：“现在本党的职任，既不是推翻他们（仇敌），也不是我们完全投降，还有中间的路；要找这中间的路，现在不宜于直接和他们武装冲突，我们的职任是等候时机，深厚自己的力量，以准备不可免之进攻。”（见《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六月十九日，中央在给上海的信中说：“如湖南反许的问题……假使我们完全独立的干起来，那末，我们和国民党的关系将要破裂。固然这是光荣的失败，但是破裂对于我们是不利的，我们应当找新的道路。经过新的道路来度过现在所遇的危机与困难，使革命深入广出，而得到最后的胜利。”（见《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所谓“中间的路”、“新的道路”，就是和平解决，把希望放在国民党中央和唐生智身上。

当时，对于唐生智来说，存在着两个矛盾：一个是唐生智和何键之间的矛盾，一个是唐生智同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运动的矛盾。“马日事变”系由何键主使发动，唐生智曾有藉此除许压何之意，因此对此事变，初取中立态度，既限制军队，又限制工农。六月二十日，他在汉口总指挥部孙中山纪念周上的讲话，还表示了这种态度。但是唐、何之间的矛盾，是他们内部的矛盾，唐与共产党的矛盾，则是阶级之间的矛盾。何键主力当时不在湖南而在武汉—河南一带，对唐有威胁。唐鉴于何势大难除，又为阶级的根本利益所左右，乃决心舍小就大，决心反共。唐在回长沙后，态度急剧右转。他在七月五日湖南省政府纪念周上讲话，将“马日事变”的责任完全推到共产党身上，说：“兄弟奉命回湘查办长沙事件，结果认定湖南以前种种惨劫，完全是在湖南的共产党所造成，在湖南做工作的共产党要负完全责任的。”直到七月四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讨论湖南问题时，仍然主张联唐反蒋解决何键的方针，但是中央的这种希望落了空。中央自己既没有一条应付事变的具体措施，所以中央号召湖南农民“应当努力去推翻在长沙的反动军阀”，应当“帮助国民政府重新在长沙建立政权”，也仅仅是空喊。

我于六月下旬回到武汉，向中央汇报了“马日事变”的情况，当时中央负责人陈独秀、张国焘、瞿秋白都没有说什么，更未作什么具体指示。我也见到毛泽东和蔡和森，他们也未向我说过其他任何意见。

#### (四) 汪精卫“七一五”反革命 叛变，大革命失败

我到武汉时，武汉的局面已十分混乱，金融阻滞，汇兑不通，物价高涨，日用品缺乏，工商业衰落，厂主店主畏祸潜逃，工人失业现象严重，民心极为浮动。被蒋介石压迫以及被朱培德从江西“礼送出境”的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各党部的左派分子、各军的政治工作人员，纷纷来到武汉。他们带来各地如何反动的消息，使人们更加重了对时局的严重威胁感。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内，由于蒋介石的压力，冯玉祥的向右转，反动倾向也日益严重。共产国际代表和党中央的首脑部在复杂的形势面前，意见纷纭，莫衷一是，已经难以控制局势。

一九二七年六月，共产国际关于应即自下而上地发动土地革命；以工农新领袖补充到国民党中央里面去；动员两万左右的共产党员和两湖的五万群众编组新的革命军队；严厉镇压反革命的五月指示传达到国内。国际代表罗易私自把它交给汪精卫过目，使汪精卫最后下了分共的决心。六月八日，国民党中央主席团汪精卫、谭延闿、孙科等成员去郑州同冯玉祥会议，达成四军、十一军回防武汉，北方战线由冯的第二集团军负责的协议，同时交换了对付工农运动和共产党的意见。

当时，武汉政府表面上虽然仍维持着国共合作的局面，但已危机四伏，随时有发生事变的可能。在这种严重的局势下，陈独秀控制的党中央却仍然没有作统一战线破裂的

准备，一味的委曲求全。六月三十日，我在武昌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了国共关系问题，通过一个包括十一条内容的决议。这个决议虽然在一些条文中也提出注意工农运动中的政策问题，但在总的精神上是一个向国民党妥协退让的文件。它仍然把维持同国民党的合作作为最高原则，没有讨论党如何争取对革命的领导权，如何应付国民党可能的背叛，避免上海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重演，反而重申国民党对国民革命的领导地位，否认武汉政府实质上是国共合作的联合政府的性质，继续把自己放在在野党的地位。会上，团中央书记任弼时表示不同意见，并向陈独秀提交了团中央的书面意见。陈独秀看了大发雷霆，也不传阅，就把它撕得粉碎，扔在地上，用脚踏上。任要求发言解释，也遭拒绝。当时党中央领导核心已处于混乱涣散状态，参加扩大会的恽代英就曾提出现在中央内部是否有不一致的问题。

陈独秀在参加这次常委会后，即根据共产国际指示，离开中央领导岗位。中央组织了由张国焘、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李维汉组成的五人临时政治局常委会主持工作。这次改组，虽然还谈不上对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右倾机会主义的纠正，但开始改变了一味向国民党妥协退让的政策。七月十三日，中央发表对政局宣言，揭露了汪精卫等主持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和武汉国民政府的反共活动，命令在武汉政府的共产党员退出，这都是我党开始改变政策的表示。

此期间，武汉国民党中央也在为其叛变革命作舆论准



备。汉口《民国日报》连续登载汪精卫、顾孟余、孙科的文章，强调孙中山的容共政策并非党中有党，参加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必须服从国民党的政策、纪律，攻击工农运动不听国民党中央指挥。七月十五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分共”。这标志着第一次大革命的最终失败。

在“八一”起义前，武汉政府尚未大规模的公开逮捕屠杀共产党人，七月十六日，还曾发布过保护共产党员个人生命财产和工农运动的训令。随后，武汉政府陆续公布共产国际于五月给我党中央的五点指示，进一步作反革命宣传。八月二日，武汉政府明令对共产党员“一经拿获即行明正典刑，决不宽恕”，露出了狰狞面目，开始了公开的反革命屠杀。

#### (五) 准备起义，开始新的历史时期

“七一五”后，党中央机关即转入地下筹划反击。临时政治局常委决定了三件事：一、将我党掌握和影响的部队向南昌集中，准备起义，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等四人组织起义前敌委员会，领导起义；二、秋收季节，组织湘鄂粤赣四省农民起义；三、召集中央会议讨论决定新时期的新政策。此后，我党即担负起独立领导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重担。

# 红五军团的初创时期

肖 劲 光

一九三一年夏秋之间，在毛泽东、朱德的卓越指挥下，中央根据地取得了第三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十一月，召开了中华苏维埃工农兵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我就是在这时来到中央红色根据地的。那时，我任闽粤赣军区参谋长兼政治部主任、闽西彭杨步兵学校校长。作为闽西根据地的代表，我到瑞金参加了这次大会。会后，调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又称工农红军学校，简称“红校”）校长。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四日，发生了著名的宁都兵暴。起义的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改编为红军第五军团，我被任命为军团政治委员。我在这支部队中工作了一年多，虽然时间不长，但给我的印象是难以忘怀的。

## 一、红五军团的诞生

我最早听说国民党二十六路军的情况，是在苏维埃工农兵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当时全国处于蒋介石的白色恐怖之下，在白军四面包围的红色根据地内，成功地争取这样一支部队起义，是一件很简单的事。马克思主义告诉我

们，任何偶然事件的发生都有其必然性，都有其内在根据和外部条件。宁都起义亦不例外。

二十六路军原系冯玉祥的西北军。一九三〇年，冯玉祥、阎锡山联合反蒋失败，西北军一部被蒋介石收编为二十六路军，一九三一年春调至江西参加“围剿”红军，七、八月间到宁都。由于是非嫡系部队，倍受歧视，往往是与红军作战在前，粮饷补给在后，部队对蒋介石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在战场上又屡遭红军打击，连连失利，被迫收缩在宁都，进退维谷；加上部队都是北方人，初到南方，水土不服，疟疾流行，数月间士兵死亡以千计，军心浮动。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后，民族矛盾上升，二十六路军中抗日情绪不断高涨，一些爱国将领联名通电蒋介石要求北上抗日，但遭拒绝。蒋介石命令该军“死守宁都”，“侈谈抗日者杀无赦”。这就更加激发了官兵中仇蒋情绪的蔓延。遭受歧视又不甘现状，“围剿”红军则战不能胜，要求抗日却不能成行。在这种情况下，赵博生、董振堂等一批爱国的高级将领酝酿寻找新的前途。

促成二十六路军起义最重要的外部条件，是中国共产党不失时机地进行了大量有针对性的、正确的争取工作。早在大革命时期，就有刘伯坚、邓小平等一批共产党员在西北军工作。第一次国共合作对二十六路军的影响是深远的。大革命失败以后，虽然公开的共产党员离开了部队，但仍有我地下党员在其中秘密活动。二十六路军调江西后，我党加强了对该军的宣传工作。红军俘虏了二十六路军的士兵，给予优待，有伤的治伤，有病的医病，组织他们了

解苏区人民打土豪分田地和红军生活的情况，然后释放。红军政治部还印发了《为国民党反动政府出卖中华民族利益告全国劳动群众书》、《告诉白军士兵到红军中来的办法》等传单，给他们指明出路和前途。该军中以刘振亚、袁汉澄（袁血卒）等同志组成的中共地下党特别支部，鉴于二十六路军中的爱国主义情绪和与蒋介石的矛盾，积极发展党的组织，扩大革命影响，争取了赵博生、董振堂等爱国高级将领，并发展赵博生入了党。又通过他们，影响和争取了季振同、黄中岳等掌握主要兵权的冯玉祥的亲信，使争取这支部队全部起义有了可靠的基础。苏区中央局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与二十六路军取得联系后，分析了起义的主客观条件，详细研究了起义计划，作出了立即举行武装起义的决定和具体指示，同时部署了红军策应起义和迎接起义部队的工作。从党政机关到部队，从干部到苏区人民，都积极动员起来，等待着宁都兵暴这一伟大时刻的到来。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四日，经与七十四旅旅长季振同、一团团长黄中岳等共商后，在二十六路军参谋长、中共党员赵博生和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领导下，扫除了各种障碍，全军一万七千多人举行了起义，只有驻守宁都城的一个团没有参加。起义后，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黄中岳带头撕下帽徽、胸章，扯掉青天白日旗，率领部队浩浩荡荡开赴苏区。这次起义震撼了敌人营垒，沉重打击了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日反蒋的热情，壮大了红军力量，对巩固和发展中央苏区，增强

苏区军民革命胜利的信心，起了重要作用。

苏区人民热烈欢迎起义部队。部队走到哪里，哪里就有夹道相迎的苏区人民。人民群众端茶送水，腾屋让房，把最好的东西送来慰问部队，使部队一踏上苏区就感受到人民的温暖，感受到当红军的光荣，开始认识到红军和白军的不同。王稼祥、刘伯坚、左权亲自前往固厚迎接，安置部队。当即宣布军委命令，正式授予起义部队以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的番号，任命季振同为总指挥，董振堂为副总指挥兼十三军军长，赵博生为参谋长兼十四军军长，黄中岳为十五军军长。军团共一万七千人，两万多枝枪。当日，由刘伯坚起草了宁都暴动宣言，经中革军委正式向全国广播。红五军团诞生了。

为了教育改造好这支部队，军委选派大批政治工作人员去工作。由于这支部队的上级军官多数是日本士官学校、保定军官学校和冯玉祥西北军官学校的毕业生，比较看重学历，所以，军委派去任各级政治委员的，都是有部队工作经验，特别是有改造旧军队工作经验和出国留过学的同志。十二月十八日，军委任命我为军团政治委员，刘伯坚为军团政治部主任。我记得先后派到红五军团工作的，还有旷继权、何长工、黄火青、左权、程子华、朱良才、朱瑞、高自立、李翔吾、唐天际、宋任穷、赖传珠、慕容楚强、刘型等。

我与刘伯坚是老同学，他在宁都兵暴和改造起义部队中有不可磨灭的功勋。伯坚同志出身于四川省平昌县一个贫苦的家庭中。一九二〇年赴法国勤工俭学，与周恩来、

赵世炎等发起组织“中国少年共产党”。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三年底转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当时我也在“东大”。大革命时期，伯坚同志受党委派，在冯玉祥的西北军中主持政治工作，致力于统一战线工作，传播马列主义，灌输革命思想，培养党的干部。他才华出众，谦虚谨慎，不仅深得冯玉祥的信任和器重，也得到一些西北军高级将领的敬慕和下级军官、士兵的爱戴，在西北军中威信很高，影响很大。大革命失败后，伯坚同志去苏联，我又与他一起在列宁格勒军政大学学习军事。一九三〇年我们先后回国。二十六路军的起义，与伯坚同志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季振同就曾对我说过：“我参加红军，第一是相信毛主席，第二是相信刘伯坚。”在我们共事的一年多里，我深感伯坚是一个非常好的同志。他党性很强，思想理论水平和文化水平都很高，有非凡的组织才能。他还会做诗，文章写得漂亮，还是一个书法家。他为五军团起草了许多宣言、文告，很有宣传鼓动性。他才高而不骄矜，尊重领导，礼贤下士，善于团结同志。起义之初，一些军官的思想不稳定，伯坚同志苦口婆心地和他们谈话，哪里出了问题，他就到哪里去做工作。他非常重视部队的宣传工作和文化娱乐工作，在五军团创办了《猛进报》和猛进剧团，举办文娱训练班，建立军人俱乐部，活跃部队生活。在行军打仗期间，伯坚同志率领政治部工作人员鼓动部队士气，宣传组织群众。虽然战争那样残酷，红五军团始终保持了旺盛的战斗精神，充满了蓬勃的生气，这些都与伯坚同志的艰苦工作分不开。后来，我离开了红五军团，听说伯坚

同志受到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排斥和打击，没有随红五军团长征，留在赣南坚持艰苦的游击战争，不幸被捕。他大义凛然，威武不屈，英勇牺牲了。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中有一个《戴镣行》的悲壮歌舞，就是根据伯坚同志和夏明翰同志在狱中的表现和诗文改编的。严酷的斗争造就了一批无产阶级的坚强战士，也吞噬了我们千千万万的革命精英。每当我怀念这些牺牲了的战友，就更感到自己肩负的责任。在有生之年，我想把他们的事迹更多地写一点，让我们的子孙后代永远铭记住这些为中华民族而献身的革命烈士，从而懂得珍惜这来之不易的革命成果。

## 二、坚持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

我与伯坚等派往红五军团工作的同志很快就走马上任了。去一支新起义的部队做政治工作，我们深感肩上担子之重，同时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想法。大多数同志愿意去工作，因为宁都暴动是一件令人振奋的事，去工作是光荣的。但究竟怎样改造这支部队，一些同志心中无数。有的存在畏难情绪，感到缺乏经验，任务艰巨。当时从上至下还流传一种说法，怀疑宁都暴动拉出来的这支部队是否靠得住，甚至有的认为可能是假起义，到苏区过渡一下，再去广东投靠陈济棠。因此，有少数同志顾虑重重，不愿去这个部队工作。我们按照军委指示，在干部中统一思想，明确总的任务是在这支部队中建立红军制度，按照红军的面貌教育改造这支部队，使之成为工农的武装力量。毛泽

东对改造起义部队倾注了大量心血，给予了很具体的指示。他曾对我说，对这支部队，要努力按照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决议（古田会议决议）的精神，建立党的领导，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对起义的军官，愿留下的欢迎，组织他们学习，进学校，搞干部教育；对要求走的欢送，发给路费，来去自愿。毛泽东的指示，使我们初步明确了工作方针，统一了思想，愉快地奔赴新的岗位。

初到红五军团，的确是困难重重，问题成堆。总的看，大多数起义官兵是愿意当红军的。但由于这支部队是由上级将领组织兵变起义的，大部分起义官兵在奔往苏区的路上还不知实情，直至赵博生、董振堂等扯下帽徽、胸章，宣布起义，他们才明白。所以，大部分起义官兵不了解起义的意义，不了解苏区的情况。国民党长期的欺骗宣传对他们影响较深。一部分人怕当了红军回不了家，怕家里受株连。特别是军官思想顾虑更大，有的惧怕红军“要兵不要官”，惶惶不可终日；有的觉得当红军前途渺茫，整日唉声叹气；有的抵触情绪很大，不愿接受改造。还有些人看不起工农出身的政治干部，对红军究竟是什么样的军队，怎样建设这支部队，也很不了解。我们刚到红五军团时，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等非常欢迎，希望我们把部队引上革命道路，同时又处处谨小慎微，唯恐做错事。针对这些问题，我们首先做安顿部队的工作，从思想上教育他们，从生活上关心他们。中央还派聂荣臻来指导帮助我们做工作。我们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工作的：

建立各级政治委员制度，加强党的领导。我们从红军



中、红校中抽调一部分干部任师团政治委员和连队指导员，在连队建立了党支部，形成了政治工作网。我们积极发展进步官兵入党，通过党员联系群众，做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使党的方针、政策得以顺利地贯彻执行。

做好上层军官的团结教育工作。我们要求各级政治工作干部，除做好所属干部和部队的工作外，特别要注意做好同级干部的团结教育工作。要尊重他们，注意工作方式、方法，不揭短，不提他们在起义前做过的错事，不讲带有刺激性的话。军团组织了军事政治训练班，讲红军的宗旨、性质、任务，讲红军的管理教育工作，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民关系；也讲马克思、列宁，讲十月革命，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等革命理论，提高他们的觉悟。特别注意发挥起义的领导者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等人的作用。赵博生在起义前已是共产党员，董振堂是起义后不久入党的。这两位同志表现一直很好。他们非常注意学习，努力改造自己，积极配合我们做部队的工作。以他们为核心，团结了一批进步军官，成为教育改造部队的中坚。

组织部队参加苏区的各种活动，亲身体会红军与白军本质的不同。我们组织起义官兵轮流到党政机关、红军院校以及部队驻地去参观学习，让他们亲眼看一看红军是如何生活、工作、学习的。参观期间，中央临时政府和中革军委的领导同志毛泽东、朱德、项英等都亲自接待，给他们讲革命道理，鼓励他们进步。苏区还为起义部队专门组织欢迎大会，召开各种代表会议时都邀请五军团代表参加，还请季振同讲话。这些，深深感动了起义官兵。

关心和改善部队的的生活。起义部队多是北方人，到南方后生活不习惯，病号很多。我们将伤病员分散到红军医院、老百姓家里养伤治病；从其他部队抽调一部分有经验的司务长和炊事员帮助改善生活；组织地方群众带着菜肉、蛋禽到部队慰问，使部队感到党的温暖和人民的关怀。经过教育引导，部队也开始学着红军的样子，帮助群众打水、扫院子，征询意见，注意搞好军民关系。

对部队进行民主改造，彻底废除旧军队的封建军阀制度，实行政治、军事、经济三大民主，建立新型的官兵关系。连队成立士兵委员会，废除打骂、体罚士兵的制度，实行官兵平等，士兵有权批评监督干部。各连还建立经济委员会，实行经济民主，定期公布帐目，禁止官长侵占士兵利益，大家发一样的伙食尾子。三大民主的开展，从根本上动摇了旧军队的封建压迫制度，在士兵中引起极大的反响，使他们真正感受到解放了、翻身了。

进行阶级教育，开展忆比活动。我们从回忆对比“红军与白军有哪些不同”入手，启发士兵的阶级觉悟，收到很好的效果。在蒋介石、孙连仲等派飞机散发传单进行策反宣传时，广大士兵不为所动。

教育、改造部队的工作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一方面，旧军队的习气和制度在部队中根深蒂固，特别是一部分军官对红军的制度很不习惯，对官兵平等，不准打骂士兵，不许喝“兵血”等想不通。另一方面，在改造部队过程中，也受到一些“左”倾思想的影响，有的不恰当地强调阶级成分，将一些可以通过教育留用的军官处理走，个别部队还

发动士兵控诉军官。国民党的各种策反宣传，对部队也有一定影响。三二年一月中旬，一部分军官逃跑。一月下旬，十四军工兵连八十多人反水。还发生了一些抵制教育改造的事，如十三军一个师长领导部下公开提出“反对建立红军制度”；十四军一个师长提出辞职；十五军发生殴打政治委员左权的事件；还有极少数人喊反对革命反对我党的口号。这些事件的发生，对一支刚刚起义的部队来说，是不奇怪的。但在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下，党内一部分人对起义部队发生的这些问题看得较重，指示我们对部队进行“坚决的”、“无情的洗刷工作”，“彻底肃清反动的、对革命动摇的投机主义者”，还有“要兵不要官”的说法，甚至提出武力缴械的主张。这更加剧了部队的思想混乱。问题比较突出的是十五军，各种议论夹杂着谣言，搅得部队很不安宁，什么“对要走的官兵将以逃兵论处，实行武力解决”；“季振同、黄中岳已被中央扣留，师长、团长都没有什么希望”；“中央已批准红四军来缴十五军的枪”等等。一些连队宣布戒严，还有的无故放枪，气氛非常紧张。为解决十五军的问题，军团政治部主任刘伯坚深入部队，与各级政治委员一起，找上层军官谈心，做稳定部队的工作。

在形势最紧张的时候，一些军官到军团部要求离开部队。为了切实解决干部的思想问题，我与季振同等研究决定，召集了九堡会议。那时军团部和十五军军部都在九堡。参加会议的是五军团的几位高级军官，具体是谁我已记不清了。当时我们在里屋开会，那些要求走的军官打着背包坐在外屋等着，季振同对此束手无策。会上，我反复说明

党对起义官兵的政策，做干部们的思想工作，要求大家不要听信谣言，要相信党。有的人提出“要兵不要官”、“武力解决”、“彻底清洗”等说法如何解释？季振同也向我提出质问，同时提出，对要求走的军官怎么办？我看会议实在无法开下去，便宣布休会。我说，大家不要着急，我马上到中央去请示。从九堡到瑞金三十里路，我一口气赶到。先找了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又见了中央局及军委领导同志。我向他们报告了红五军团出现的情况和九堡会议遇到的难题。当时，有的领导同志提出，马上派部队去武力解决。我不同意，建议先不要采取这个办法，待做些工作看看再说。从军委出来，我又去找毛主席。毛主席住在一个两层的小楼上，一楼是放东西的仓库，二楼是毛主席的办公室兼卧室。房间不大，屋里陈设简单，只有一张桌子，摆些书刊、文件，一两个凳子，还有一张床。我向毛主席汇报了部队中出现的问题和有人主张武力解决的意见，请示毛主席怎样办。毛主席听后沉思片刻，反问我：“你的意见呢？”我说：“我不同意用武力解决，那样事情会更糟。”毛主席说，怎么能用武力去解决问题呢？只能通过教育改造，争取他们革命。只能用“剥笋”的办法，将真正反动的“剥”掉；不能用“割韭菜”的办法，不分青红皂白一刀割。毛主席说，你马上回去，对他们宣布我的话：第一，宁都暴动参加革命是你们自觉自愿的，我们表示欢迎；第二，如果你们认为这儿不好，愿意回去，我们表示欢送。听了毛主席的意见，我心里豁然开朗，立即赶回九堡，重新召集会议。我把毛主席的意见在会上一说，季振同非常兴奋，

一拍桌子说，好！拥护！赞成！我们要坚决革命到底，部队发生的事情，我们大家分头去做工作。季振同这样一说，其他同志的情绪也都转变了，很快统一了思想。季振同走到门口，对等在外边的军官传达了毛主席的意见。他说，你们要革命的就留下，一定要回去的，我们欢送。他还拿出自己的钱，分给那些要求走的人作路费。经过深入地工作，一场狂风巨浪平息了。这就是毛泽东思想的感召力。我们这些在毛主席几十年教育下走过来的同志，对这点体会特别深刻。

在宁都兵暴和教育改造部队期间，赵博生、董振堂起了非常好的表率 and 推动作用。赵博生是起义的核心组织者。起义后，季振同任红五军团总指挥，他任参谋长兼十四军军长，亦欣然服从组织决定。博生同志有学识，有胆略，文武双全。他处理问题深思熟虑，多谋善断。对部下，他循循善诱，晓之以理，从不以势压人。生活上朴素廉洁，完全没有旧军人的那种恶习。具有这样品质的高级将领，在旧军队中是少见的。起义后，他一再向我表示，自己没有受到党的训练，希望党多多给予帮助。每次与他商谈工作，他都非常谦虚。一旦组织上决定了的事，他总是坚决地执行，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很强的党性和组织纪律性。董振堂也是一个很好的同志。他为人刚正，不苟言笑，赏罚严明，带兵既严格又能以身作则，在官兵中享有很高的声望。他的部队训练有素，善于擒拿格斗和近战，有相当的战斗能力。起义后不久，他入了党，曾向我表示，从此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了党。他有一些储蓄，也执意要拿出来献给党。作为

一员武将，他特别认真地学习红军的战略战术，经常与我一起商讨军事问题。这两位同志在红五军团中是很有影响的。在教育改造部队的过程中，他们与我们这些派进去的干部合作得很好，做了大量工作。在后来的赣州、水口战役中，他们身先士卒，不怕牺牲，指挥若定。这些都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博生同志英勇牺牲于第四次反“围剿”的黄狮渡战役；振堂同志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后随军西渡黄河，在高台战役中英勇牺牲。对于他们，我至今仍很怀念。

在红五军团，季振同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他是河北沧州人，出身于大地主家庭，时年三十岁。原是冯玉祥的手枪旅旅长，改编成二十六路军后为七十四旅旅长。这个旅实力雄厚，装备精良，是二十六路军的主力。鉴于季振同是宁都起义的有功人员和他在部队中的影响，我党任命他为红五军团总指挥。我刚到五军团的时候，季振同一方面欢迎我，一方面又有戒心。大革命时期我曾在国民革命军中当党代表，对国民党将领的特点有所了解。在工作中，我注意尊重他，维护他在部队中的威信，虚心向他了解部队的情况，同时将革命的道理由浅入深地讲给他听。从思想感情上，我也尽量与他接近，关心他。我曾有意同他谈自己的革命经历，谈国民革命、北伐战争，谈我们俩在寻找革命道路的过程中的共同点，使他消除顾虑，树立信心，当好红军指挥员。季振同性格活泼、开朗，爱好文艺，喜欢跳舞、演戏，我们就经常请他参加部队的文娱活动。记得有一次，我和季振同同台演戏，他演军阀，我演帝国主

义分子。我们演得都很认真、很风趣，部队看得十分开心。事后，我们经常在一起开玩笑，他喊我“帝国主义”，我喊他“军阀”，十分友好、融洽，相互信任。当时敌人对季振同的策反很厉害，有些事情季振同也对我讲。如季振同在西北军时的老上级派高参与他联系，季振同告诉了我，我也报告了中央，经中央同意后与其见面。敌人的一些策反信他也送给我看。当然，敌人的策反活动他是否都报告了，也很难说。我当时认为敌人的这些策反活动是很自然的，我们无法阻止敌人这样做，但我们可以通过工作，争取季振同革命，粉碎敌人的阴谋。事实也是这样。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季振同向我提出入党的要求。对此，我们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就季振同本人的思想来看，基本上还是旧军人思想，做一个共产党员是不够格的。然而，他能够提出这样的要求，是其要求进步的表现。从有利于部队的整编，有利于稳定起义官兵的思想情绪这个大局考虑，有必要吸收他入党。于是，我们将此事报告了中革军委。后军委批准他入党，周恩来、朱德是介绍人。

经过一段艰苦的思想工作，部队稳定下来，各项工作进展比较顺利。除了政治课以外，部队还有军事课，着重山地运动战、游击战的训练。我们还组织军人俱乐部，教唱红军歌曲，开展文体活动。部队生气勃勃，初步有了红军的样子。在此基础上，为了打破旧军队的宗派主义和山头主义，根据军委二月二日训令，从二月中旬开始，五军团打破建制，实行混编。由于思想工作做得较好，混编进展顺利，不到一周就完成了任务。大部分起义官兵愉快地

组成了新的战斗集体，少数愿意离队的，就发足路费送行。有一些起义官兵离开部队后，找不到出路，不少人又自动回来了，我们仍表示欢迎。还有一部分军官调红军学校去学习、任教。苏进、孙毅就是这时离开五军团去红校的。我们从基层士兵和下级军官中提拔了一批思想进步、表现好的同志，发展他们入党，逐步改变部队上层领导的成份。经过两个多月的集中整编、改造和教育训练，红五军团初步成长为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

### 三、在战斗中成长的红色劲旅

红五军团整编期间，赣州战役打响了。打赣州，毛主席是不同意的。毛主席主张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赣东北发展。但教条主义者却命令部队攻打敌人占领的中心城市，企图实现“革命在江西一省或湘鄂赣数省的首先胜利”。

赣州战役是彭德怀指挥的，三军团的指战员打得很英勇。赣州城三面环水，一面是坚固的城墙，强攻不易。三军团便进行坑道作业，接近敌人的城墙进行爆破。然而敌人火力太猛，连续几次爆破都未成功，我军伤亡很大。军委指示红五军团迅速完成整编，准备参战。二月中旬，五军团完成了整编。二月下旬，按照军委指示，五军团十三、十四、十五军向赣州疾进，驻茅店、江口一带，准备增援三军团。二十七日，接到三军团彭德怀、滕代远来函，得知敌罗卓英师及陈诚、公秉藩部自吉安方向来援。我们立即请示军委，建议在潭口、储潭、大湖江一线沿河阻击敌



人。军委同意。我十五军进至储潭、大湖江一线，其余部队进至里镇、梅林（今赣县）一带，阻击增援敌人。此时，赣州战役已打了近一个月，我攻城部队伤亡大而且困乏。城内敌人自恃有援兵，便进行出击，包围了我三军团挖地道的一个师，情况危急。军委急调五军团前去增援。五军团的部队手持大刀冲了上去，与敌人短兵相接，展开肉搏战。敌人血肉横飞，丢下几百具尸体，仓皇退回城里。三军团的这个师转危为安。前几年，一位当年曾在这个师任师职的干部来看我时还说，若不是五军团去救援，那个师就全完了。这是红五军团组建以来参加的第一次战斗。

赣州战役历时一月余，最后不得不于三月七日撤围。这一仗没有打胜，主要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指导造成的。

赣州撤围以后，部队集结于江口。三月十二日，军委发布命令，重编一、三、五军团。原五军团第十五军调给一军团；十四军调给三军团；十三军和原属一军团的第三军组成五军团。季振同仍任五军团总指挥，董振堂为副总指挥，我为政治委员，周子昆为参谋长。十三军军长由董振堂兼，政委何长工；三军军长徐彦刚，政委葛耀山。

这时，季振同的思想发生了一些变化，要求去苏联学习。我曾和他推心置腹地交谈过，诚恳地挽留他。他对我说，自己是大少爷出身，吃不了苦，又不懂军事，没有指挥能力，还带着旧军阀的帽子，希望能去苏联学习军事。他说：“请你放心，我不会再回蒋介石那里去。我已经带着部队起义了，做了红军的总指挥，又是党员了，回去肯定

要杀头的。我不会去把头送给他们杀，我也不会回冯玉祥那里去，我就是想去苏联学习军事。”我分析季振同起义以来总的态度是明朗的，是积极配合我们进行改编工作的，赣州战役表现也是好的，没有发现他有后悔、反叛之意。他感到缺乏军事指挥能力，惧怕艰苦生活的思想是真实的，同时对我们党的政策还不放心，有顾虑，背着思想包袱，反叛回去，自知不会有好结果，所以感到去苏联学习是较好的出路，基本思想还是积极的。于是，我发电报请示中央，中央同意了他学习的要求。季振同还要求给他一点金子作路费，中央也同意了。季振同走的时候，我召开了欢送会。他把所有的东西都留下了。望远镜留给了我，一匹很好的青鬃马也留下了，后来我送给朱总司令骑了。枪也交了，他的警卫班（班长就是后来曾任过空军副司令员的王秉璋）也没有带，只带了一个马弁（即侍从）、一个打手（即保镖）。我派人将他送到中央。季振同走后，红五军团由董振堂同志接任总指挥。

赣州战役以后，中央召开会议，毛主席再次提出向北发展的主张，即集中兵力向敌人防御力量较薄弱的赣东北发展，开展游击战争，逐渐与赣东北根据地联成一片。但“左”倾路线指导下的中央没有采纳毛主席的意见，决定主力分中、西两路。三月十八日，军委命令三军团组成西路军，彭德怀为总指挥，滕代远为总政委；一、五军团组成中路军，林彪为总指挥，聂荣臻为总政委。分兵的目的，是沿赣江而下，赤化两岸地区，占领沿江大城市，完成夺取一省数省胜利的任务。分兵以后，军委给五军团的任务

是做第二梯队，监视粤军，掩护三军团过江，处理一军团行动后的善后工作。这样，五军团的三军、十三军即活动于赣州以南、信丰与安远之间，把守苏区南大门，同时发动群众，扩大红军，打土豪，筹款子。这时，毛主席建议，中路军改为东路军，向闽西发展。经军委批准，一军团先行东下，打下龙岩后，准备向闽南攻打漳州。漳州是福建的一个大城市，主要作战对象是国民党张贞的四十九师。为了打胜这一仗，军委命令五军团迅速开往龙岩。四月中旬，五军团到达龙岩。三军由徐彦刚军长率领，配属一军团参加攻打漳州。军团总直属队驻龙岩城。十三军驻适中、夏老、大小池，保卫龙岩至龙山、汀洲至上杭的交通线，保证漳州战役顺利进行。

此时，龙岩打下不久，尚属新区，情况较复杂。土豪劣绅多逃进土围子，不少群众受欺骗宣传躲进山里，城里粮食很贵，周围土匪很多。部队一面执行总部交给的任务，一面打土围子、剿匪、筹粮筹款，发动群众，恢复苏区，同时继续整顿部队。由于初到新区，我们对部队要求很严，规定不准无故放枪，违者坐禁闭。一天，董振堂擦枪不小心走了火。下边有些士兵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不是讲开枪要坐禁闭吗？总指挥坐不坐禁闭呀？”这些议论传到董振堂耳朵里，于是他打起背包要去坐禁闭。我连忙劝阻，但董振堂执意要执行纪律。最后我急了，说，如果你一定要去坐禁闭，我也陪你一起去坐。这他才罢休。这件事传开了，部队很受教育，总指挥这样严格要求自己，模范遵守纪律，下级官兵还有什么可说的呢？红五军团所以能迅

速改造成一支纪律严明、作战勇敢的部队，与董振堂、赵博生等自觉革命、自觉改造的表率作用有很大关系。

漳州战役在毛主席的亲自指挥下，打了一个大胜仗，歼灭了张贞的主力，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筹到一大笔款子和物资，补充了部队。更重要的是，这一大胆的外线出击，打击了敌人的气焰，壮大了红军的声威，震撼了敌人的营垒。

五月份，发生了所谓的季、黄谋叛事件。先是十五军军长黄中岳在漳州被逮捕，以后等待出国的季振同也被逮捕。由于这时季振同已离开部队，黄中岳率十五军划归一军团，亦不在我部，所以我对他们被捕判罪的情况一无所知。当时我虽有疑虑，但为了稳定部队，还是按照中央的口径去教育部队。以后前方战事紧张，也没有过问此事。后来听说季、黄二人被公审，原定死刑，经中央执行委员会研究改为十年徒刑。长征前，在“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影响下，将他们二人处决了。在延安时曾听毛主席讲过，把季、黄杀掉是不应该的。建国后，在中南海怀仁堂后厅召开的一次高干会议上，毛主席再次讲过，季、黄在宁都起义中是有功的，没有他们，二十六路军全部起义是不可能的，把他们处决是错误的。

漳州战役后，部队准备向北发展。这时，广东陈济棠所属粤军频频向苏区进犯。为了巩固中央苏区，保证主力部队顺利向北发展，军委决定集中兵力回师赣南，狠狠打击粤敌的嚣张气焰。

一九三二年六月，五军团作为东路军的先头部队，从

龙岩出发。当时，南方已经很热，但部队情绪高昂。途中，一军团第四军军长王良牺牲，军委决定调五军团参谋长周子昆任四军军长。

六月底，五军团到达芥子圩。东路军番号取消，重新恢复一方面军建制，朱德任总司令，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毛泽东主席随一军团行动。当时的敌情是粤敌十二个团窃据赣南的赣州、南康、大庾、上犹、杨眉寺（上犹南）、信丰等地，六个团在广东南雄附近。另外，赣州以北有蒋介石的五个师，湘南有何键的两个师。我们一、五军团的任务是由信丰进军南雄，威胁敌后，迫敌回援；在敌回援时，我们在南雄一带截击，三军团追着敌人后面打，我第十二军、独三师、独六师等部队协同配合，给敌以致命打击。于是，在毛主席、朱总司令的亲自指挥下，五军团在水口地区打了一场恶仗，就是著名的水口战役。

七月七日，粤敌张枚新第四师到达乌迳（南雄东北）。军委命令五军团迅速出击，消灭张部于乌迳、新田一线。我们立即部署第十三军担任正面攻击，第三军迂回左翼包抄。八日晨，得知敌于昨夜十二时许向水口（南雄东）逃窜。三军奉命追击，十三军取捷径奔水口，断敌退路。下午一时，先头部队三十八师抵达水口以东的翦过村，隔河与敌打响。三时，三军也赶到该村东北端森林内。我们命令三军立即在十三军左翼展开，从翦过村东南地区向敌右侧背后发起攻击。下午四时左右，敌人两个团溃逃，我乘胜追击，过了浈水，直追至离水口约五里的高地。这时已是晚上七时左右了。当夜我军撤回，主力靠拢宿营。

九日晨，接到军委消灭水口之敌的命令。我军立即发起攻击，在浈水南岸高地与敌展开激烈的拚杀。十三军仍担任正面攻击。三军从左翼迂回到敌后，与敌两个团相遇，激战数小时。中午，敌人援兵赶到，以九个团的优势兵力向我三军阵地猛扑，战斗异常激烈。我军指战员英勇顽强地阻击敌人，阵地数次得而复失，预备队使用殆尽，部队伤亡很大。三军八师的连、团干部大部分伤亡，部队几乎失去指挥。九师伤亡亦很大。军长、政委、参谋长均亲临前线指挥战斗。董振堂亲自指挥十三军，他把外衣脱掉，身穿一件白衬衫，在阵地上与敌人白刃格斗。随着震耳欲聋的喊杀声，战士们手起刀落，敌人一片片地倒下，阵地上尸横遍野，战士们浑身上下血迹斑斑。敌人一次次地进攻，又一次次地溃退，战斗达到了白热化程度。到下午四时，敌人的进攻才渐渐减弱。这时，我独三、独六师的援兵赶到，未等命令即进入阵地与我军并肩战斗。直至晚七时，才打退敌人的进攻。晚间，方面军总部命令五军团选择有利地形，固守待援。于是，我们转移阵地露营。水口方向的枪声一夜未断。

十日拂晓，一军团和十二军赶到了。毛主席来到我们指挥所，聂荣臻和林彪也来了。毛主席听了我和董振堂的汇报，了解了敌我两军对峙的态势，又亲自观察了敌军阵地，当即向林、聂和我们部署了战斗任务。决定一军团使用于三军方面，十二军使用于十三军方面，命令我们马上出击，坚决消灭敌人。增援部队到达指定位置后，冲锋号一齐吹响，部队以排山倒海之势向敌人冲击。陈济棠虽然

调来八个团增援，但在我军的强大攻势下，很快溃退了，我军乘胜追击。我跟着部队冲上去，发现毛主席也上来了。我连忙停下劝阻毛主席。我说，现在离敌人很近，太危险，你不要追了，我们随部队追击就行了。但毛主席不答应，一定要追。这样，毛主席和我们一起冒着枪林弹雨追击敌人，他身先士卒的精神对广大指挥员是极大的鼓舞。

水口战役，共击溃敌二十个团。粤敌经此惨败，全部退出赣南，较长时间未敢再犯。我中央根据地的南大门得到巩固，取得了主力部队向北发展的条件。但从当时部队调动的情况看，本意是想集中兵力歼灭敌人，然而在实施过程中没能集中起来。五军团在水口和敌人对峙了两三天后，一军团、十二军才赶到。三军团赶到时，水口战役已经基本结束了。由于敌我兵力相当，虽然击溃了陈济棠二十个团，“本来一般算作胜仗，而且还算作大胜仗的”，但因为缴获不超过消耗，所以，毛主席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曾指出，水口这一仗，“吃了兵力不集中的亏”。但从作战的情况看，五军团指战员表现了高度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在水口战役三四天的时间内，天上滴雨未下，烈日当头。有时送不上水和饭，战士们渴了喝稻田里的水，饿了嚼口生米，夜晚就露宿在阵地上。由于实在太困乏，倒地就睡，醒来时才知道是与敌人的尸体躺在一起。战争如此残酷，五军团指战员没有临阵逃脱的。据战后统计，在五军团阵地前，光砍死的敌人就有九百多。事实雄辩地证明，五军团已经成长为一支可以信赖的有战斗力的红色劲旅。

水口战役后，部队开始向北发展。八月，红军又一次进行整编，五军团的第三军重归一军团建制，第十四、十五军重归五军团建制。军委重新任命毛泽东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在毛泽东、朱德的亲自指挥下，一、三、五军团发起乐安、宜黄战役。以后，又向赣东北方向顺利发展，开辟了建（宁）黎（川）泰（宁）地区。宁都暴动一周年的时候，军委在黎川城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朱德、周恩来在会上代表军委向宁都起义的有功人员赵博生、董振堂等颁发了勋章。中共临时政府向五军团全体指战员发了嘉慰电，表彰五军团创建一年来的巨大功勋。会后，我就离开了五军团，就任新组建的建黎泰警备区司令员兼政委。

红五军团干部中，至今仍担任党和军队重要职务的有：姬鹏飞、李达、黄镇、苏进、孙毅、张永励、谷广善、李雪山、刘向山、蒋耀德等。在革命斗争中，赵博生、董振堂等一大批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女为革命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他们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激励着我们不断地战斗、前进。一九三八年，毛主席在延安接见了参加宁都起义的部分同志，与我们一起合影留念。毛主席书写了“以宁都起义的精神用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我们是战无不胜的”题词。红五军团以她光辉灿烂的英雄业绩载入了中国革命的史册。

（本文原载《军史资料》总第一期，

本刊转载时作者对个别字句作了修改。）



# 回忆我党在 杨虎城部三十八军的工作

蒙 定 军

国民革命军陆军第三十八军，原为杨虎城将军所领导的部队。一九三八年前，军长是孙蔚如；一九三八年后，军长为赵寿山。关于这支部队同我党的关系，早在一九四五年一月，毛主席就说过：三十八军在形式上虽是国民党的编制，但实质上军内地下党组织是按照我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改造、建设部队的，广大指战员同日、蒋进行了艰苦的斗争。一九六二年，毛主席在同原三十八军领导人孔从周谈话时又说：三十八军是我党统一战线工作的一个典范。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康生煽动极左思潮，把三十八军地下党组织诬陷为“黑党”，“假党”，“真国民党，假共产党”，对三十八军地下党的同志和许多长期与我党合作的进步人士进行了残酷的迫害。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一九八一年，中央批准陕西省委《关于为杨虎城部三十八军地下党组织被诬陷为“黑党”、“假党”等问题进行平反的请示报告》以后，被颠倒的历史已经重新纠正过来，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已经被推倒，受诬陷的同志恢复了名誉，

死者得到了昭雪。为了把我党在三十八军工作的这段历史立准、立好，为了总结丰富我党统一战线工作的经验，为了使“文革”中出现的历史悲剧不再重演，我想回顾一下我参加三十八军工委工作期间所了解的情况，把它简略记述如下。不妥之处，望了解情况的同志批评、指正。

### 我党早期在三十八军的活动

早在大革命时期，三十八军就有了我党地下组织的活动。

辛亥革命后，杨虎城率部参加了与孙中山先生有联系的陕西靖国军，进行反对段祺瑞、曹锟、吴佩孚等军阀的斗争。大革命时期又支援了北伐战争。一九二五年，杨在陕西耀县设立“三民军官学校”，就有共产党员在该校任教和学习。从这时开始，杨的部队中就有了共产党的组织活动，以后一直没有中断。

一九二七年“四·一二”以后，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中共陕西省委也多次遭到破坏，大批党员被国民党特务逮捕杀害。由于杨虎城和蒋介石有矛盾，杨不愿公开反共，因此，在杨部，党的组织基本上没有遭到破坏。

“九·一八”事变以后，杨虎城和蒋介石的矛盾日益加剧，杨任用了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如南汉宸和杜斌丞、王菊人等在陕西省政府和军队中担任重要职务，因此党在杨部的活动比较顺利。杨虎城回陕西前曾任十七路军总指

挥兼潼关行营主任，随后又任西安绥署主任。此间有一批参加过渭华暴动、旬邑起义、清涧起义和以后的两当起义的同志，因起义失败在地方不能立足，参加了十七路军各部。

一九三〇年孙蔚如任十七师师长，三一年夏，孙在陕西凤翔办起了随营军官学校，就有共产党员充任教官或学员，并在学校建立并发展了党的组织。三一年十七师赵寿山的五十一旅去陕南，孙蔚如率两个旅以甘肃宣慰使入甘肃，有些共产党员随军入甘工作，我同崔维峻等同志就是在甘肃平凉入孙部工作的。

一九三二年，蒋介石出于怕杨虎城部控制甘肃、宁夏、青海，任命邵力子为甘肃省主席，升任孙蔚如为第三十八军军长（孙自兼十七师师长），并于一九三三年调孙部到汉中。

杨虎城为了培养干部，发展自己的势力，入潼关前，在河南南阳即办了教导队，到西安后又办了步兵训练班，设有军官队和学生队，每期都有共产党员参加学习。此时，杨部中的党员已经有了一定的数量，其中不少人担任了旅、团长。部队中建立了党的地下支部，在中共陕南特委的领导下积极开展工作。

这个时期党的任务是发展组织，掌握武装，待机暴动，建立红军。

### 团结改造三十八军方针的确立

我红四方面军进军川北后，由于杨虎城有保存实力，不愿与红军作战的思想，加上蒋介石派嫡系胡宗南率军入

陕甘之压力，主张与红军互不侵犯，遂由驻汉中的三十八军孙蔚如军长出面，写信派代表和红四方面军联系，孙派军部参谋武志平为代表前往川北。四方面军派徐以新为代表到汉中与孙蔚如谈判，达成了互不侵犯的默契。地下党利用这种关系，秘密建立了有名的“陕川红色交通线”，支援了红军大批医药和军用物资，包括西北西南方面的军用地图等。三三年到三五年初两年多的时间中，双方往返达十余次之多。当时红四方面军有些同志到过汉中。参加这一工作的西安有杜斌丞、宋绮云，在汉中有张汉民、徐梦周、崔尽善（崔维峻）等同志。还有经张汉民派去川北联络的张含辉（去后下落不明）。一九三五年初红四方面军进军汉中时，中共三十八军地下党支部书记崔尽善暴露遇害。

一九三五年八月，党中央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十月，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十二月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决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随后政治局又通过了《中央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决定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党中央先后派汪锋和张文彬等同志做争取杨虎城的工作，经过谈判杨完全接受了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在共同抗日的原则下，红军和十七路军建立了抗日友好互不侵犯协定。这时三十八军已由汉中调渭北至郿（富）县一线，地下党根据中央和省委的指示，认真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积极开展抗日宣传教育工作，帮助红军输送物资和

掩护人员往来。

一九三六年六、七月间，叶剑英受党中央的委派，作为红军代表到西安协助张学良、杨虎城工作。这时杨虎城把西安绥署所办的步兵训练班改为军官训练大队，杨自兼大队长，以赵寿山为大队副，调共产党员团长阎揆要、刘威诚为队长，加紧抗日宣传和干部训练。又在西安以南之王曲开办了军官训练团，张学良、杨虎城分别兼任团长、副团长，为十七路军和东北军团结合作打下了基础。此时，三十八军有一批党员干部和进步军官接受了训练，为这支部队反蒋抗日准备了干部力量。

毛主席到达陕北以后，由于在党内贯彻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批判和纠正了关门主义和冒险盲动，三十八军地下党从过去准备武装暴动的方针转变为团结改造这支部队反蒋抗日的方针。这一重大策略变化不仅使党的地下组织有了较快的发展，而且团结了部队内的进步官兵，形成了一种核心力量。西安事变期间，三十八军作为事变的主要力量之一，在事变的当天，赵寿山受杨虎城之命，指挥陕西警备第二旅（旅长孔从周，副旅长许权中）解除了蒋介石在西安的反动武装，并接任西安市公安局长。西安绥署宋文梅的警卫营在西京招待所扣留了中央包括陕西省主席邵力子在内的全部军政大员（公安局长马志超漏网逃跑）。东北军在临潼华清池活捉了蒋介石。事变期间孙蔚如任西安戒严司令，有些共产党员参加了司令部工作。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在事变后的十二月十六日来到西安，在极其复杂激烈的斗争中，对张、杨及其他将领

和中下层军官作了大量工作，使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和发展。

## 党的抗日政策和蒋介石的卖国 行径教育了十七师官兵

西安事变以后，赵寿山升任十七师师长。赵是杨虎城的老部下，“九·一八”事变以后，赵寿山接触了不少进步人士，对蒋介石集团对外妥协投降，进行反共反人民的内战政策有所不满，接受我党“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主张。西安事变期间，赵多次受周恩来副主席和叶剑英等同志的帮助教育。事变以后，部队驻三原县期间，又多次受到彭德怀、贺龙等同志的接见谈话。党的教育使赵逐渐坚定了抗日信念和与共产党合作的决心，愿意接受共产党派干部帮助他的工作。一九三七年初，中共陕西省委派申敬之为特派员到十七师负责领导三十八军地下党的工作，随后杨明轩、孔叔东、杨晓初、崔仲远等同志相继到十七师进行上层统战工作。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十七师奉命开赴河北，参加了伟大的抗日战争。我党中央非常关心这支部队，八月初周恩来、彭德怀同志曾到保定前线看望赵寿山师长，并鼓励全师官兵巩固西安事变成果，坚持长期抗战。从一九三七年八月至十一月，十七师先后参加了河北保定以北新安镇一线的阻击战、漕河战役、阜河战役、山西娘子关雪花山乏驴岭战役、太原东郊陈家峪战斗等。这些战役由

于整个国民党军队的腐败和蒋介石长期不抵抗政策的影响，作战指挥不统一、各自都企图保存实力，因此各次战役全都失败。十七师虽有抗战之决心，又有共产党员和爱国将士浴血奋战，但由于蒋介石阴谋借日寇炮火消灭这支参加过西安事变的抗日力量，在河北战场上将十七师的两个团割归国民党嫡系五十一军指挥，严重削弱了十七师的力量。而且战斗刚打响，刘峙就乘火车跑了，剩下十七师孤军奋战，受到日寇两面夹击，损失很大。在固守娘子关乏驴岭和雪花山战斗中，我国军队与日本军队激战九昼夜，曾一度夺取了井径车站，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给日寇以重创。但由于单纯军事防御，互相配合不好，因此付出重大代价，没有取得应有的战果。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八日太原失守，山西境内的国民党军队纷纷向晋南溃退。十七师经过河北和晋东两战场的连续作战，疲惫不堪，思想相当混乱，一部分进步官兵要求随同东进的八路军去敌后打游击，一部分人则对抗日悲观，逃亡不断发生。党为了保存这支抗日武装力量，当时曾向赵寿山建议部队留在正太路以北之孟县地区开展游击战争，但未能取得一致意见。在由娘子关向太原方向撤退时，我八路军派两名干部来十七师进行抗日宣传，帮助巩固部队，同时建议赵寿山率部去晋西八路军留守兵团驻地进行整训，重整旗鼓，继续抗日。严酷的事实教育了赵寿山和十七师广大官兵，不仅从战争中看到国民党军队的腐败，也进一步认清了蒋介石不顾国家民族危亡甚至不惜借用日寇炮火消灭异己的反共卖国面目。于是，赵率部经太原以

南，转移到离石县碛口一带。

## 碛口整训，十七师走上革命道路

部队由离石去碛口途中，受到我留守兵团及群众的热烈欢迎，并在兵团帮助下开始收容整顿。这时党中央派南汉宸率慰问团来部队慰问。南汉宸多次给部队官兵做形势报告，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全民抗战最后一定胜利的道理。肖劲光同志讲话时，肯定了十七师抗日战绩，赞扬了部队流血牺牲的精神，极大的鼓舞了士气，提高了抗日信心。部队在八路军河防部队肖劲光旅的帮助下，抽调班以上干部办短期训练班进行整训（即五日整训），学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学习全民抗战方针，总结河北、晋东战场失利原因，学习游击战术。为了整顿军纪，改造部队，在地下党的帮助下，赵寿山颁布了三大禁令：禁嫖、禁赌、禁吸大烟，提出四大口号：人事公开、经济公开、自我教育、自觉纪律，惩办了违犯禁令的军官。

通过碛口整训，十七师广大官兵抗战精神为之一振，广大官兵有了重返前线的决心，当时就编有“碛口整军振旗鼓”的歌曲。

一九三七年年底，部队从碛口过黄河到绥德进行补充，我受地下党派，以去后方安抚伤病员和收容散失官兵为名，去延安和云阳向中央和陕西省委汇报工作。在延安，罗瑞卿听取了汇报，后由刘向三向我传达了中央的指示：抗战是长期的，地下党要协助部队大量培养干部，加强部



队的政治改造工作，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健全和发展党的组织，扩大实力，准备长期抗战。随后，在三原以北之云阳镇，又向省委书记欧阳钦和军委汪锋作了汇报，研究了贯彻中央指示的具体办法。

此时赵寿山师长也到了延安，受到毛主席、叶剑英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接见。毛主席向赵寿山详细讲述了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提出了改造军队的建议，为赵寿山指明了今后奋斗的方向。赵寿山表示完全拥护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愿意和我党合作，愿意改造部队，使其适应抗日的要求，配合八路军抗战到底。毛主席还交给赵寿山一本密电码，约定以后通讯联系。毛主席亲自做十七师的统战工作，对赵走上革命道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一九三八年元月，十七师由绥德到延川，从延水关过黄河经永和、隰县抵洪洞集结待命。这时，八路军朱德总司令来到部队，在一所小教堂里给连长以上的干部讲了话，分析了形势，阐述了持久抗战，抗日必胜的道理，使大家受到极大鼓舞，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朱总司令还和赵寿山师长作了长时间的交谈，向赵讲述了运动战、游击战的方针，进一步坚定其团结抗日的思想。三月，部队经沁水、阳城到达晋城一带，编入第二战区东路军（十八集团军）战斗序列，受朱德总司令和彭德怀副总司令指挥。此后彭总多次来十七师进行视察指导，慰勉部队坚持长期抗战。

## 开办教导队，培养 青年干部，改造部队

赵寿山接受党中央关于改造部队的意见后，在地下党的帮助下，从一九三七年开始对部队进行改造。改造工作大体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即碛口整训；第二阶段是一九三八年在晋东南期间；第三阶段是中条山期间；第四阶段是一九四一年在河南守备黄河河防期间。

从一九三八年开始，地下党把培养青年干部和改造部队作为工作的中心。经过碛口整训，十七师进行了大量补充，需要大批下级军官，赵寿山师长为了防止蒋介石、胡宗南以偷梁换柱的手法，派中央军校学生来替换部队干部，接受了中共陕西省委意见，开办教导队大量培养下级军官。第一期教导队在三原县开办，由陕西省安吴堡青训班调出一批学生做学员。在教员学员中都有不少共产党员，还有一些知名的进步人士任教。教导队的大队长、中队长、区队长等干部大都是共产党员。以后各期的学员除由青训班选调外，也选招陕西、山西的青年学生及地方党团组织和民先队从关中陕南各地介绍来的党员和进步青年。

教导队从一九三八年元月在陕西三原成立到一九四四年三月，共办了五期。第一期是十七师教导队，一九三八年七月后改为三十八军教导队，以后遭到反动的政治部主任张太祥破坏，即改名教育连，四、五期又以补充团二营名义续办。其中领导干部虽有变动，但一直完全由我党掌

握。教导队的教材都采用抗大的，还有从安吴青训班抄来的政治时事教材。开设的课程除军事课外，政治课有：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土地问题、抗日战争的战略战术、群众工作等。地下党还用电台抄收新华社发的社论和党内文件中有关毛主席的讲话报告等。一九四二年全党整风时，整风文件就全部用电台抄收下来，不仅作为党内学习文件，也曾作为教导队的教材。

教导队（包括一个儿童连）先后培养了一千多人，其中约半数先后发展成党员。他们不断被派送到连队，有效地加强了部队的改造工作，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后来，针对蒋介石制定的控制杂牌军的一条规定（即非中央军校出身的人不能担任连队主官），地下党经请示陕西省委同意，又有计划地选派了百余名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去国民党中央军校“镀金”，毕业回来后，担任排、连、营长职务。一九三八年底，政治部主任张太祥和以后的罗仁一，要所有军官必须加入国民党。为了掩护党的工作，经请示省委同意，地下党又指示党员军官可随其他军官集体加入国民党。成立战地服务团、血花剧团，开展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为进一步开展部队政治教育和战地群众工作，一九三八年十七师到晋东南后，成立了战地服务团，由崔仲远任团长，武志平任副团长，团内工作人员大部分是中共党员。战地服务团派人以指导员的名义到各团、营、连检查和贯彻纪律检查会、生活检讨会制度，组织官兵发动群众，宣传抗日，密切军民关系。战地服务团还出版油印的《战地》报，发表抗日言论、官兵学习体会、作战经验等文章，进

行抗日宣传。这一时期，由于受东路军的指挥，经常和八路军并肩作战；举行驻地联欢，还派了一批干部去东路军游击干部训练班学习，这对促进部队政治改造，改变部队作风和作战方法都起了积极作用。

部队在绥德期间，八路军警备区政治部帮助十七师组织了宣传队，派警备区政治部师瑞和原八路军战地服务团的袁烙等同志负责，并组织了血花剧团（由从绥德随军到晋东南的青年学生和从延安等地调来的革命文艺工作干部组成）。演出的抗日剧目有：《放下你的鞭子》、《江山好》，教唱抗日救亡歌曲，如《大刀歌》、《游击队员之歌》、《黄河大合唱》及东北流亡曲等。这些活动对鼓舞部队士气，进一步坚定抗日信心，起了很大作用。

### 开办干部训练班， 进一步推进新作风运动

一九三八年七月赵寿山升任三十八军军长，辖十七师和独立四十六旅（后改为新编三十五师），部队随即由晋东南调中条山，归还三十一军团（后改为第四集团军）孙蔚如建制。为了进一步加强部队的改造工作，军部在矛津渡办起了干部训练班，赵寿山任班主任，孔祥桢任教育主任，设有军官队、军士队、军需队、军医队和通讯队。接着教导队也从陕西三原来到前方，加强干部训练工作。教学内容除前述学习内容，还有周恩来副主席一九三八年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和郭沫若任该部第三厅厅长时颁布的

“学习小组讨论会实施简则”、“生活检讨会实施简则”。为了进一步推进新作风运动，改造干部的旧思想、旧作风和旧的作战方法，干训班进一步重申三大禁令、四大口号，同时提出“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的原则，废除打骂，反对克扣兵饷和贪污，反对欺压打骂驻地群众。部队还实行了三项措施：一是军队不驻城镇，住在农村，自己开荒种菜养猪，节约开支，减轻群众负担，并且支援农村生产，救济灾荒；二是军师长带头不带眷属，眷属来前方探亲至多不能超过半月，敌占区逃来的眷属，由于生活困难送各师陕西后方生产基地安置；三是派小部队轮流到敌占区进行游击战，实习游击战术。连队还成立了“民运组”，平时帮助群众生产，宣传抗日，战时帮助群众转移、疏散，密切军民关系。

部队在中条山时期，还与山西新军、牺盟会、妇救会建立了较密切的联系，牺盟会、妇救会帮助部队联系群众，每逢战斗及时给部队传递情报，解决给养，部队则送给他们枪枝弹药，建立地方游击武装。一九三九年十二月阎锡山配合蒋介石发动反共磨擦，动用六个军的兵力向我党领导的山西新军（即决死队）各部展开全面进攻，同时指使其晋南反共突击队在平陆、芮城、夏县等地破坏各县、乡的牺盟会、妇救会等群众组织，大肆逮捕杀害抗日志士和共产党员。三十八军除了镇压当地反动势力，立即动员部队将大批受追捕的同志掩护起来，如当时中共平陆地委书记薛涛、县委书记姚文、新军团长张瑞达、夏县牺盟会负责人干玉梅等同志都受到三十八军的掩护，以后有些

牺盟会员留在三十八军工作。

## 与蒋介石的破坏活动展开 针锋相对的斗争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对三十八军极为仇视，千方百计企图消灭这支部队。在极其尖锐复杂的形势下，地下党和进步力量有效地粉碎了蒋介石的种种阴谋。

一九三八年冬，蒋介石召开了武功军事会议，置杂牌军于对日作战第一线，置其嫡系部队于第二线，将胡宗南部留陕西包围陕甘宁边区。赵寿山参加了这次会议。会后我们把赵谈的会议情况向中央和省委作了汇报。此后，蒋介石对三十八军的仇视和压迫也日甚一日，从一九三八年底派张太祥为政治部主任开始，陆续派大批特工及中央军校学生来三十八军，以指导员名义分配到连队，进行反共活动，破坏部队抗日和进步，妄图“化掉”这支抗日力量。他们强迫撤销了血花剧团、战地服务团，不准《战地》报出版，扣发《新华日报》、《解放周刊》，没收进步书籍，阻挠部队的改造工作。地下党和进步力量同他们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干训班不让办，赵寿山就通过孙蔚如同意，在四集团军总部干训班继续办；不让办教导队，就改名为教育连，以后为了掩护，又以补充团二营名义继续办；扣发《新华日报》、《解放周刊》，就派人到边区秘密携带。为了及时了解形势，就用电台抄收新华社新闻社论，在连队以办“中山室”为掩护，继续组织官兵学习；撤销了战地服务

团和血花剧团，就将部分同志送回边区，其余人员分配到连队继续工作。并公开组织战地视导团，由赵寿山担任团长，刘威诚任副团长，到各部队检查部队训练、生活检讨会和小组学习会执行情况。视导团成员由共产党员和进步军官组成。他们同官兵谈话，检查学习日记、壁报，访问地方进步组织及驻地群众，了解部队纪律，最后评比发布“奖惩令”。部队驻守黄河河防时，国民党军统特务组织的“黄河支队”和胡宗南的渡口“检查站”走私贩毒十分猖獗，对部队腐蚀影响极大，视导团视察河防时，惩办了违法乱纪分子，震动了全军，加强了部队纪律。

一九四〇年，蒋介石以反共不力撤销了军政治部主任张太祥，另派罗仁一充任，并派刘文光组织十七师“特别党部”。一九四二年又撤换了罗仁一，改派秦怀玺任军政治部主任，并派极端反动的龙冠军任十七师副师长兼政治部主任。这些反动分子偷听官兵谈话，搜查官兵行李，拉拢腐蚀干部，发展特务组织，斗争日益尖锐复杂。省委及时传达了中央指示：地下党为了掩护和隐蔽，要内红外白，要入污泥而不染，同流而不合污，要把上层统战工作和群众工作结合起来，顶住逆流，团结抗日。我们按照指示精神，一方面研究利用国民党自抗战初期发布的一切可以利用的命令、法律以及社会习惯使我们的言行“合法化”，坚持抗日与进步；另一方面则发动官兵对特务政工人员展开多种形式的斗争，在抗日的前提下，能争取的争取，不能争取的设置障碍使其活动困难。对派到连队的反共分子则利用他们畏缩怕死的弱点，派其带小部队出击侦察或到敌后

游击，结果这些人吓的大部逃跑。对个别已经危害地下党组织和进步官兵安全的极端反动分子则秘密加以惩处。在中条山时，曾发生过包围共产党员王廷杰营，企图搜捕共产党的事件，地下党即团结进步力量，将被收买利用的反动营长撤职查办。由于地下党组织团结了全体官兵进行斗争，使特务政工人员几乎无法活动，一度不得不把牌子挂在远离前方的陕西华岳庙。他们无法了解到部队的真实情况。

蒋介石用特务手段瓦解不了这支坚持抗日的部队，于是就采取了更加阴险毒辣的手段，从组织上下毒手。在中条山时，就已经发生电令孙蔚如查处总部干部训练班“异党”分子雷展如等同志的事件，经孙复电：雷非“异党”而抵制。一九四〇年冬，为了切断三十八军与八路军的直接联系，蒋令四集团军全部调离中条山，南渡黄河，守备洛阳郑州间数百余里河防。三十八军守备巩县郑州间百余里河防，处于日伪军及汤恩伯数十万中央军包围之中。换防刚结束，蒋介石就以“异党”嫌疑为名，调孟定均（我当时名蒙鼎钧）等三十七名军官去洛阳干训团“受训”。这三十七人中有地下党员，也有非党的旅、团、营长，明显地暴露了蒋介石以抽梁换柱的手法来搞垮、吃掉三十八军的阴谋，引起了全军官兵乃至四集团军总部的不满和愤怒。地下党立即利用上层统战工作揭露蒋介石消灭异己，吃掉杂牌军的阴谋，并向全军握有实力的军官说明利害。军、师长联名发电进行抵制：查无孟定均其人，部队也没有“异党”，河防吃紧，无暇受训。但蒋介石回电，名单上去掉



了孟定均，但仍坚持其余人员去受训。赵寿山看到送走这些部队骨干，蒋介石必将派反动军官来任职，那时三十八军就会被蒋介石完全控制，于是与地下党商议，决定举行起义，渡河到豫北。部队一面进行起义准备工作：控制渡口船只，补充战备物资，派人去豫北进行侦察联系；一面向省委、中央请示报告。中央复示：国共合作还不会完全破裂，起义不符合团结抗日的原则，要采取各种方式进行斗争，坚持下去。根据中央指示，工委和赵寿山研究取消了起义。工委也否定了党内一部分同志要求将指名调去受训的党员撤退的意见，因为这样做既不符合坚持斗争的方针，又会暴露这些人的政治面目，使留下的同志和赵寿山的处境更加困难，甚至会破裂我党同全部第四集团军的统一战线关系。在蒋介石接二连三的电令催促下，赵寿山感到硬顶不是办法，担心蒋介石以“违抗军令”加罪，于是去和孙蔚如商谈，要孙致函第一战区长官卫立煌，证明被指调军官均系第四集团军老部属，决非“异党”分子，要求免训。孙蔚如也看出蒋介石指调是为了瓦解异己，但他从自己的处境和杨虎城将军尚在关押考虑，同意采取婉转拖延的办法应付，向卫写信保证。卫接孙信后，以河防吃紧要求缓训复电蒋介石。蒋介石虽仍不同意，但退了一步，指令先送少数几个人去洛阳审查。当时卫和赵之间的私人关系较好，卫答应可以送几个人去洛阳应付蒋介石，然后以日寇企图渡河进犯为由要求将人调回。赵于是派下级军官张西鼎、尤继贤、陈居莘等八人去洛阳，旋即又以河防吃紧要求免训，经卫批准，八人全部返回部队。不久，蒋介石

石又来电称：军长办公室主任姚警尘就是“异党”，必须离开部队。为了减少敌人攻击目标，这次由赵寿山出面将姚介绍到孙蔚如总部工作。接着又发生了胡宗南电令指调魏洪涛（党员，军部秘书）、陈居莘（非党，营副）、邵青山（非党，连长）去西安劳动营受训。为此，赵寿山再去洛阳活动，经三十八军驻西安办事处杨晓初请客送礼，并利用陈居莘岳父刘守中（国民党中央执委）的关系，将三人先后要回部队。部队没有因魏等受训暴露地下党的组织，更无一个党员因此受到牵连。但四二年又连续发生了要查处孔叔东（孔祥祯）、王安仁（王静先）及张安翔的“异党”嫌疑和部队有“异党”活动等一系列事件。为了孔叔东的安全，工委派人护送孔回太岳解放区，由赵寿山师长报告卫立煌说孔早已离开部队。对王、章二人则分别经军法处（处长常汉三）进行假审问，然后以二人均非“异党”，也查无其他“异党”分子活动进行应付。经过以上事件的斗争，蒋介石不仅没能搞垮三十八军，反而使军内更加团结。

蒋介石不仅从组织上，而且从文化教育、训练方法、干部作风等方面，妄图瓦解这支部队。三十八军到河南后，政治部除了继续查禁《新华日报》和进步书籍，还大量推销《扫荡报》和反动书刊。为了抵制反动影响，地下党和进步力量创办了《新军人》刊物，十七师还办了《前哨》，转载新华社消息和抗日文章，在党内传阅。

一九四二年日寇大举渡河进犯，由于右翼孙桐轩部花园口防线被突破，威胁到三十八军右侧背，不得不将右翼部队撤至北邙山抵抗。三十八军在百余里长的防线上孤军

奋战，而汤恩伯几十万大军不仅按兵不动，且断绝三十八军的粮弹供应，使三十八军在日寇优势炮火下伤亡惨重，黄河铁桥南岸为日军突破。蒋介石不但不追查孙桐轩部的责任，反而乘机以丢失河防的罪名压迫三十八军，追查赵寿山的责任，下令撤职查办刘威诚团长和王廷杰营长。为对付蒋介石，第四集团军总部对刘作了撤职留任处理，对王以假关押应付，后调任军部特务连少校连长。同年，蒋鼎文又派武装特务偷袭我地下党专用秘密电台，被电台保卫人员及时发觉，将敌打退，保卫了电台。一九四二年秋，军部侦察兵截获了日寇派驻重庆进行日蒋勾结的代表，地下党立即将查获的情报，包括日蒋合作，以黄河为界，华北归日本，华南归蒋介石，以及日蒋联合反共的文件和日蒋联络用的密电本等全部报告了党中央。后由新华社作了揭露。对此蒋介石恼羞成怒，并于一九四三年冬将赵寿山调离三十八军，以便消灭这支抗日力量。

## 经过改造的三十八军 受到人民的爱戴

三十八军经过教育改造，面貌发生了变化，官兵关系和军民关系都与国民党军队有了明显的不同，大大减少了侵犯驻地群众利益的事情。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三年，河南广武一带连年发生蝗灾、旱灾，加上蒋介石炸毁黄河花园口河堤，河水泛滥，人民流离失所，饿殍载道，国民党汤恩伯部队又乘机抢掠灾民，群众愤恨地称为水、旱、蝗、

汤（恩伯）四大灾害。当时三十八军则拨出一部分军粮救济驻地灾民，动员官兵帮助群众扑灭蝗虫。十七师还将一百多儿童（大部分是十三、四岁孤儿）收编成一个儿童连，连、排、班长大多由共产党员担任，使他们有吃有穿。这些都受到了当地群众的欢迎。在晋东南时期，三十八军配合八路军徐海东部进攻长治一带日寇，使我八路军收复了晋东南上党地区十九县。在中条山抗日期间，从一九三八年八月至一九四〇年冬，日寇对中条山进攻十一次，大的九次，其中有一九三九年的“三·二九”战役、“六·六”战役，一九四〇年的“四·一七”战役。一九四〇年，三十八军还按彭德怀指示积极策应八路军百团大战。在这些战役中，三十八军虽因受上级的不正确指挥，坚持打阵地战，没有完全发挥战斗力，但仍是这一地区战斗力较强的部队，对确保中条山地区和保卫洛阳起了重要作用。由于作战勇敢顽强，部队被群众誉为“铁的三十八军”。

一九三九年春节，中共陕西省委派田静沉和安吴青训班樊中黎率慰问团来中条山前线慰问，给第四集团军和三十八军分别赠送了锦旗，同时了解了三十八军地下党的工作、部队改造工作和对日作战情况。为了进一步加强党的工作，一九三九年三月，中共陕西省委决定由我和郝克勇、张西鼎组成中共三十八军工作委员会，由我担任书记。这时三十八军地下党的组织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发展，军、师部、教导队及十七师各旅、团、营都分别建立了党的支部。工委成立后，为了对付蒋介石的反共活动，根据省委指示，改变了组织形式，团以上保留支部（三人），团以下改为单

线联系并加强了保密纪律。

## 毛主席、党中央深切关怀三十八军

在同蒋介石及顽固派斗争中，三十八军得到了中共中央、中共陕西省委的关怀和八路军的帮助。从一九三八年起，地下党就和党中央、省委及八路军总部建立了电台联系，开始是利用军、师通讯连电台联系，电台由共产党员刘振高等同志掌握。一九四〇年，在赵寿山的支持下，地下党建立了专用秘密电台。一九四一年三月在洛阳调训事件以后，工委派张西鼎去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工作，毛主席亲自接见，叶剑英和陕西省委汪锋同志参加听取了汇报。毛主席肯定了工委的工作，并指示：要继续大量培养干部、扩大充实部队；整顿健全党的组织，清理内部；要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聚力量，以待时机，反对急性和暴露；要进一步扩大统一战线。毛主席还针对蒋介石妄图破坏地下党组织，消灭三十八军的阴谋，指示我们要提高警惕，防止蒋日伪的突然袭击，和顽固派斗争要尽量利用国民党内一切可以利用的矛盾和关系，在必要时要征得赵寿山的同意和合作才能起义。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工委认真总结了工作中的经验教训，进一步扩大教导队，吸收一批进步知识分子参加部队，加强干部训练工作，同时，严密了党内纪律，停止了少数动摇分子的党籍，清除了部队中的内奸，挤走了蒋介石、胡宗南派来的中央军校特务学生，撤换了部队中的顽固军官，做好了一切应变的准备。

一九四二年秋，省委通知工委派人去延安汇报。工委研究决定派郝克勇和已在延安参加整风学习的张西鼎进行汇报。他们汇报了抗战以来三十八军的情况和赵寿山自毛主席接见后的表现，以及蒋介石分化、瓦解、迫害三十八军的种种阴谋。毛主席亲自听取了汇报，并对党在三十八军的方针政策、工作方法做了指示。指出要进一步做好原十七路军各部的工作，要学会交朋友，广泛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进一步团结原十七路军广大官兵共同抗日，重大问题工委要同赵寿山商量解决。毛主席还针对地下党一些同志急于起义和不安心三十八军工作，要求回延安的思想状况，指示我们：现在国共还在合作，主要敌人是日本人，只要还能合作，就要合作，不能急于起义。并说：“你们穿国民党的衣服，吃国民党的饭，而为革命工作，这还不好吗？你们有合法身份比派别的同志去方便得多。”毛主席还接受了赵寿山的入党要求，但指出目前不入为好，更方便些。毛主席的教导指明了方向，坚定了我们做好工作的信心。

在晋东南、中条山时期，三十八军的工作也多次得到八路军的帮助。八路军派人帮助训练部队，与三十八军并肩作战。特别令人难忘的是一九四二年日寇大举渡河进犯，三十八军孤军奋战，伤亡惨重的危急关头，彭德怀副总指挥一面指示三十八军让开河防，靠近嵩山五支岭一带开展游击战争，避免和优势敌人打阵地战、消耗战，一面派八路军在黄河北岸武陵一带出击，牵制了日军继续南侵。

地下党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把统一战线中的上层工作与群众工作密切地结合起来。在三十八军中担任高级职务

的党员同志，专门负责进行团以上军官及第四集团军孙蔚如等高级将领的统战工作。三十八军和第四集团军的上层人士在抗日战争时期，基本上能够坚持抗战，而且对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行径有一定的抵制，这是与上层统一战线工作分不开的。

地下党特别注意团结部队中的进步人士一起工作。当时，在三十八军和第四集团军中，有一批抗战开始后来部队工作的进步民主人士和高级知识分子，他们对这支部队坚持抗日，坚持团结，坚持进步都做了一定的贡献。特别是陈雨皋先生，他在陕西民主运动中有较高的威望，西安事变期间，曾参加过陕西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的工作，一九三七年三月以“联络工作组”的名义去延安，受到毛主席的几次接见。抗战开始后，他来三十八军，一直担任军部参谋处人事科长，并在教导队和干训班代课，主讲群众工作，在学生中有很高的威信。工委能够有计划地把大批党员安排在军部、师部的各要害部门，如办公室、参谋处、译电室、通讯连、特务连，任命党员担任排、连、营长，撤免一批反动军官，这是与陈雨皋先生的密切配合分不开的。

一九四二年，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工委向赵寿山公开了一批共产党员名单。此后，赵寿山对党更加信任，合作更为密切了。

### 三十八军光荣参加人民军队大家庭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蒋介石突然调赵寿山去重庆中央

训练团将官班受训，一九四四年二月受训毕滞留重庆，派反共分子张耀明任三十八军军长，一九四四年三月才让赵寿山回部队办交接手续，委任赵寿山为第三集团军空头司令。情况骤然变化，地下党和赵寿山一面进行起义准备，一面请示中央。中央指示：现在还不能起义，赵寿山可以去任新职，将部队中已经“红”了的党员（主要是军部工作的同志）撤回边区，担任军事指挥职务的党员留部队坚持工作，工委进行有计划的撤退。按中央指示，赵寿山和一百多名党员干部陆续离开三十八军，有些送回边区学习，有的去第三集团军总部或留西安工作。赵寿山去武威赴任时，要求已去延安学习的原三十八军军医处长张归仁去任医生。我转报中央后，中央即决定派张归仁任赵的保健大夫。行前毛主席亲自同张谈了话，周恩来副主席要张转告赵寿山，要时刻与三十八军党内保持联系，一旦形势变化，便于指挥，并要赵多与反动头目交往，在自己身边造成一个灰色局面，做好随时行动的准备。此后，我即以第三集团军驻西安办事处主任职务为掩护，在西安仍联系三十八军及第三集团军地下党，并负责西安军事情报工作。

赵寿山调离后，三十八军地下党的工作开始了自抗战以来最艰苦的时期。张耀明反共气焰十分嚣张，一到部队就扬言三十八军有共产党，为搞垮部队制造舆论，不久就借口将共产党员营长尤继贤撤职。以后张耀明又关押了教导队副队长、共产党员李昶东，接着又解散了教导队。

一九四三年三月，发生了中原战役（即河南战役）。三月十九日，日寇四个师团占领郑州后，继续西犯，驻守郑



州荥阳一线的国民党八十五军和十二军不战而退，日军一部直驱扼守虎牢关至登丰一线的第四集团军阵地。这时蒋介石嫡系部队汤恩伯和胡宗南三十万大军已溃退洛阳，但为了消灭异己，将孙蔚如调去洛阳开会，张耀明（这时兼指挥第四集团军）要三十八军和九十六军死守阵地。三十八军坚守阵地十八天，付出极大牺牲，发现日军已绕道进击洛阳，才不得不且战且退到豫西。正如毛主席指出的：“河南战役已打了一个多月，敌人不过几个师团，国民党几十万军队不战而溃，只有杂牌军还能打一下。”

河南战役后，三十八军由于损失严重，开始休整，抽派两个团的干部到陕西凤邠师管区补充兵源。赵寿山去甘肃赴任前，委托孔从周掌握三十八军的工作。地下党同意和支持孔的工作。

一九四五年元月，中央应孔的要求，派周仲英、张西鼎去三十八军协助工作。在西安，我们一起研究了三十八军地下党在日军一旦占领洛阳继续西进时，如何进一步开展豫西地区工作和在必要时进行起义的组织工作。随后，给周、张写了介绍信，由徐又彬护送去洛宁部队驻地。周、张向部队工委负责人梁励生、朱曼青、徐又彬等传达了中央的指示，并分别会见了孔从周、刘威诚、张复振等，讲明了中央的意图。但是，周仲英、张西鼎到后不久就引起张耀明的注意，他们难以在部队立足。于是工委派人将他们经三十五师护送到陕县国民兵团尤继贤那里。四月，由于形势愈来愈危急，梁励生派鱼化龙来西安向我谈了部队的情况，正好我收到姚警尘从重庆来电，转告周恩来副主席通

知的情报：蒋介石将调孙蔚如任第六战区长官，并准备派姚国俊等大批军官去十七师替换连以上军官。获此消息后，工委立即派人去马栏向省委汇报请示，同时感到形势严重，因为当时虽然调走了赵寿山，但孙蔚如仍在第四集团军，蒋介石要彻底搞掉十七路军仍有障碍；而孙调走后，蒋介石就可以放手干了。因此，工委要鱼化龙去前方，通知部队立即着手起义的准备工作，具体时间等候中央通知。七月初，中央指示可以起义。我即按中央指示，给刘威诚、张复振、梁励生、朱曼青、徐又彬、崔治堂等写了密信，要他们立即执行中央决定组织起义。此时张耀明已将三十八军与九十六军合并为三十八军，辖十七师、五十五师、一七七师，部队由十四个团缩编为九个团，并准备将刘威诚同志任团长的五十一团肢解拨编，形势相当紧迫。刘威诚等接到密信后，立即实施起义计划。一九四五年七月十七日，十七师（其中军部几个直属连队和四十九团一部因河水暴涨未能过河同时行动）在共产党员刘威诚和张复振等同志率领下，在河南洛宁县故县镇举旗起义。二十八日，十七师到达我豫西第二军分区，受到韩钧司令员、刘巨奎政委的热烈欢迎，尤继贤、张西鼎同志由陕县率二百多人的游击队也赶来汇合，在渑池县向党中央发电报告。毛主席复电嘉勉：“祝贺你们胜利的参加人民军队大家庭！希望你们团结一致，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奋斗到底！”一九四六年五月，五十五师由孔从周率领在河南巩县起义，经与国民党军连续激战虽告失败，但主要干部陆续进入我晋冀鲁豫解放区。战斗中，副师长孙子坤、译电室孙乃华被俘，

后在南京雨花台慷慨就义。同年八月，一七七师吕元璧、薛生荣率部在辉县内战前线起义。随孙蔚如去武汉的张敬白部，在解放战争中随程潜在湖南长沙起义。

一九四六年九月十三日，根据党中央的命令，十七师和五十五师在河北邯郸组成了西北民主联军第三十八军，任命孔从周为军长，陈先瑞、刘威诚为副军长，汪锋为政治委员，王汝昭为参谋长，崔仲远为政治部主任，下辖两个师，十七师（后改为五十七师）师长张复振，五十五师师长杨健（原三十五师团长）。并向全国通电：“本军坚决反对独裁，反对内战，反对卖国。誓以至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实现独立、和平、民主、自由、统一、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到底。”朱总司令、邓小平、刘伯承以及解放区各党政机关均来电祝贺勉励。朱总司令在贺电中说：“西北与全国人民深庆又得生力军；人民力量日益团结与壮大，于此又得一新证明”，“并祝一切反独裁、反内战的军队与军人相继奋起，拒绝蒋介石的乱命，共同为实现和平、民主、独立而奋斗！”

以后民主联军三十八军在邓小平、刘伯承同志的指挥下，先后参加过上党自卫战和解放战争，为人民的解放和新中国的建立贡献了力量。

从抗日战争到全国解放，三十八军有数万名官兵和上百名共产党员为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英勇地献出了他们的生命，人民将永远铭记他们。

# 内蒙工作的回忆

刘 春

## 抗日战争胜利后内蒙古的 情况和我党的方针

一九四五年八月八日，苏联对日宣战，苏联红军随即进入我国东北，苏蒙联军进到察哈尔省的张北和热河省的承德。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各地抗日人民武装解放了华北、东北等广大国土，内蒙古各地相继获得了解放。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的胜利，全国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内蒙古的民族解放运动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为了适应新的革命形势，还在一九四五年初，中央即决定成立了绥蒙区党委、绥蒙政府和绥蒙军区，任命乌兰夫为政府主席。他带领一批蒙古干部从延安去大青山地区，刚过黄河，日本就投降了。为此，中央又决定乌兰夫转到张家口，主持内蒙古工作，开展自治运动。

当时，内蒙古的政治形势是很复杂的。日本投降不几天，蒋介石根据波茨坦公告，于八月二十五日宣布承认外

蒙古独立。这时，一批蒙奸、战犯、敌伪人员和一些封建上层人物，纷纷起来活动，掀起了一阵内外蒙合并和内蒙古独立的浪潮。他们妄图借此逃避人民的惩罚，重新爬在人民头上，恢复自己的封建统治，甚至想乘机捞取更高的地位和更大的权势。象德王、李守信等更是摇身一变，从日本帝国主义的怀抱转向国民党的怀抱。还有一部分人虽有强烈的民族解放要求，但不了解内蒙古民族解放的正确方向和道路，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受狭隘民族主义影响，也被卷进了这个旋涡。

根据当时情况，党中央明确指出：对内蒙的基本方针是实行区域自治。但内蒙人民由于长期处在日本统治下刚刚获得解放，要立即成立自治政府是缺乏基础的，需要广泛发动群众，经过艰苦的斗争和大量的工作，以创造必要的条件。因此，决定先成立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开展群众性的自治活动。

我是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从延安到张家口的。原来富春同志要我去承德，到冀热辽中央局分配工作，可是到张家口以后才知道冀热辽中央局不成立了，改为冀热辽分局，受晋察冀中央局领导。把我留下是乌兰夫向晋察冀中央局建议的，从此我就在内蒙古工作了。当时，内蒙古正在举行各盟旗代表大会预备会议，准备成立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

## “内蒙古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

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成立前两、三个月，即一九四五年九月间，内蒙古西部锡林郭勒盟西苏尼特旗德王府，曾经出现了一个“内蒙古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而八月间，在内蒙古东部则成立了内蒙古人民解放委员会和内蒙古人民革命党。这都是苏联对日宣战以后，苏联红军进入我国东北和苏蒙联军进入锡林郭勒草原不久后发生的。

苏联对日宣战后，苏蒙联军向日本侵略者发动了进攻，一直打到张北，但是没有再往南打，张家口是我晋察冀部队解放的。这时，在西苏尼特旗的以伪蒙疆政府高等法院院长、巴彦塔拉盟盟长补英达赉（这个人在日寇统治时期，最被重视，是日寇培养出来的）为首的几个蒙奸、战犯，纠集一部分伪蒙疆人员，欺骗一部分要求民族解放的青年，打出“蒙族代表”和“民族独立”的旗号，经过和苏蒙联军交涉，在西苏尼特旗召开了所谓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成立了“内蒙古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补英达赉当了政府主席，并派出代表团到蒙古人民共和国要求援助，企图取得合法地位，逃避内蒙古人民和全国人民的惩罚。但外蒙古没有回答，把他们打发回来了。这时国民党承认了外蒙古独立，正派员在乌兰巴托监督公民投票。

党中央和晋察冀中央局得知上述情况以后，指示乌兰夫负责去处理这个问题。于是，乌兰夫带着奎璧、克力更、田户、陈炳宇、黄静涛等，于同年十月到达西苏尼特旗，

找到了这个所谓的共和国临时政府。当时这个政府正局促在德王府内，只是一个空牌子。它是乘日寇溃逃，人民军队和人民政府还没有接管这个地区的空隙仓猝拼凑起来的，内蒙古人民没有注意到它，甚至还不知道它的存在。乌兰夫首先找到这个“政府”里个别认识的人，如亢仁（乌兰夫过去的同学），了解了情况，然后通过亢仁找了呼尔沁毕力格、乌勒吉那仁等青年和几个上层人士进行工作。乌兰夫向他们指出：日本投降以后，晋察冀边区人民政府在张家口颁布了一个《战犯通缉令》，伪蒙疆政府的德王、李守信和补英达赉等都列为战犯，你们在这里成立“政府”，而这个“政府”的主席，正是我们晋察冀边区人民政府通缉的战犯，这怎么行呢？青年们听了也感到这样不行，很不光彩。当时，苏蒙联军驻扎在西苏尼特旗，这个“临时政府”的成立，他们是知道的，代表团到外蒙古去也是经过他们的。所以，乌兰夫去找联军的政治委员（苏方少将），和他交换意见。但是那个政治委员却主张内蒙古要实行自决，意思是说可以独立和分离。乌兰夫说：你的意见和我们党的方针是不符的，我们党主张内蒙古民族自治，不赞成独立和分离。那位政治委员仍然坚持他的意见。于是，乌兰夫告诉他：我讲的是我们党中央的意见，希望你向你们的中央报告。后来，那位联军政治委员调回去了，来了一位外蒙的副顾问尼古拉也夫。乌兰夫找尼古拉也夫重申了我们党的主张。尼古拉也夫说：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是正确的，他（指原来的联军政委）的意见应该一笔勾销。这说明当时联军虽然听任了这些所谓的“独立”活动，但当知道

我们党不同意时，还是采取了应有的态度，使问题得到了解决。乌兰夫经过同苏蒙联军代表商谈和对青年及几个上层人士说服工作之后，重新召开了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改组了“临时政府”，罢免了补英达赉，选举乌兰夫为主席，奎璧、克力更、陈炳宇、黄静涛等分别当选为各部的部长、副部长。乌兰夫当选政府主席后，以给养困难等为理由，说服大家，将重新选出的政府迁到张北。在张北找一个地方挂出牌子，随即把政府人员都带到张家口。十月二十三日，中央书记处发出了《对内蒙古工作的意见》，指出：“对内蒙的基本方针，在目前是实行区域自治，首先从各旗开始，争取时间，放手发动与组织蒙人的地方自治运动”，“准备建立内蒙自治筹委会的组织，统一各盟旗自治运动的领导”，并决定“统一西蒙的领导，大的方针由中央定，实际工作由晋察冀中央局和晋绥分局分别自行处理。由乌兰夫同志和两局联系，以筹划共同的行动方针与统一步骤。”晋察冀中央局于十月二十七日将乌兰夫处理西苏尼特的“内蒙古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的情况电告中央，提出工作方针。电报中还说：“马林诺夫斯基电张北苏军查问此事，外蒙已派副顾问尼古拉也夫来张家口商谈，同意对内蒙问题执行中央之方针”。十一月八日、九日，晋察冀中央局两次电告中央，决定成立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该会由乌兰夫负责，准备将来成立内蒙古自治政府。中央书记处于十一月十日复电指出：“同意先成立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宣布纲领，发动广大蒙民，准备将来建立内蒙古自治政府的方针。目前，在各省区内之蒙民可成立地方性质的



自治政府，分别归绥、察、热省政府领导。”以后随着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宣告成立，那块内蒙古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的牌子，就取下来了，那个临时政府也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 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 和内蒙古党委的成立

为了贯彻执行中央的指示，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由乌兰夫主持，在张家口召开了内蒙古各盟旗代表大会。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成立了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作为统一领导内蒙古自治运动的机构。

内蒙古各盟旗代表大会的召开和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的成立，开始了我党解决国内民族问题和内蒙古民族解放运动的新篇章。会上，选举了乌兰夫等组成的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执行委员会，执委会推选乌兰夫同志为主席，并通过我任联合会的秘书长。联合会办公地点设在伪蒙疆实业公司。联合会是内蒙古自治运动的统一领导机构，既带有革命群众团体性质又带有人民政权性质的组织。从组成成员来看，又是我党领导下团结内蒙古各个阶层，包括一部份上层人士在内的统一战线性质的组织。联合会当时直接管辖的范围是锡林郭勒盟和察哈尔盟。张家口蒙古族居民不少，而且曾是伪蒙疆政府所在地，需要进行大量的群众工作，为此设立了张家口分会。

联合会成立以后，我们曾向晋察冀中央局提议在内蒙

古建立统一领导内蒙古工作的内蒙古工作委员会，属晋察冀中央局领导，其下暂设东蒙工委和西蒙工委，并提议确定一个政治中心。后来晋察冀中央局决定成立内蒙古党委，领导联合会及其直辖的锡、察两盟的工作，并通过联合会指导内蒙古各盟旗联合会分、支会的工作。以后，内蒙古党委下面又成立了锡察工委。内蒙古党委书记是乌兰夫，委员我记得有奎壁和我，以后又有王铎。党委成立时，奎壁同志不在张家口，他主要管巴、乌两盟的工作。记得当时对党委成员的选定，不是从整个内蒙古的党员干部中，而是从在联合会工作的党员领导干部中考虑的。

一九四六年九月，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向我们发动进攻，内蒙古党委从张家口撤到贝子庙。

## 赴 东 蒙 谈 判

联合会成立大会刚刚结束，正在建立机构、部署工作的时候，内蒙古东部代表包玉昆从王爷庙来到张家口。他带来了特木尔巴根写给佛鼎等人的介绍信。乌兰夫看了介绍信以后，不知道特木尔巴根是谁？因为乌兰夫在苏联的时候，只知道特木尔巴根的汉名，而不知道他的蒙名。信的大意是说：日本投降了，现在我们这里正在进行工作，想必你们一定在进行，所以派包玉昆前来联系，希望得到回音。当时我们都不了解东部的情况，据包玉昆自己介绍，他曾当过伪满少校军官，但热心于蒙古民族解放事业，对乌兰夫组织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很称赞，政府主席将由

博彦满都来担任，玛尼巴达拉也是重要人物。还成立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由哈丰阿、特木尔巴根、阿斯根等人负责。他们认为内蒙古搞自治应该大家一起搞，所以来西边联系。他还谈到他们找了苏联红军，也找了我们的东北党组织，派他来张家口的时候，将有人去外蒙古，还要去找国民党。问他：这个政府纲领是什么内容？他不知道，但他很坦率地说：“我们蒙古民族自己搞自己的事情，现在要和各方面拉关系。外蒙古同我们是同一个民族，将来还是要和外蒙古合在一起的。我是个军人，大老粗，只凭‘民族热’（当时蒙古人中流行这个词，意思是热心于蒙古民族的事业），不大懂得应该怎么做才好。”他的话的确反映了当时一部分蒙古青年和一部分热心蒙古民族解放事业的中上层人士的想法。他们不明白，或者不明确知道内蒙古民族解放的正确道路是什么，应该朝那个方向发展？甚至不少革命同志也处于这种思想状态。包玉昆的来到，把如何联合内蒙古东部，形成统一的内蒙古自治运动的问题，提到了我们的面前。从包玉昆的谈话看来，我们东北的党组织可能已和他们取得联系，但是对东北党组织的工作情况以及东北局对东蒙自治是如何分析的，我们不了解。要把东部的工作作好，当然要靠东北的党组织，但党领导下的内蒙古革命力量——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也是应该做工作的。所以我们准备派代表同包玉昆一起去东蒙谈判，看看那里的情况，和他们研究怎样解决内蒙古统一自治的问题。于是乌兰夫向晋察冀中央局提出了派代表去东蒙谈判的建议。中央局非常同意，并决定由我代表联合会和云

泽（乌兰夫的汉名）主席去王爷庙同东蒙负责人谈判。同时还派了一部分同志组成东蒙工作团去东蒙工作，有克力更、包彦、乌兰（女）、孔飞、田户同志，还有新参加工作的几个蒙古族青年，如乌勒吉那仁、赛西雅勒图（吉尔嘎朗的弟弟）、庆格勒图（王宗洛的二儿子）、高德明、桑培勒、白音仓等。他们大部是东部的，有的是哲里木盟人，有的是卓索图盟人，一共有十来个人。我为团长，克力更为副团长。

我们一行和包玉昆一起，从张家口乘火车出发，十二月底到达承德。我立即去冀热辽分局，见到了分局书记程子华、冀热辽军区司令员肖克、分局秘书长欧阳钦等同志，汇报了我们此行的任务和人员的情况，并谈了在热河开展自治运动，建立联合会分、支会等问题。程子华说，分局和热河省委在热河境内的蒙古民族中进行了一些工作，吸收了一部份蒙古族青年参加，也进行了上层统一战线工作，各方面的工作都在开展，但总的说来还是才开始。蒙古族工作中心在赤峰，省委书记胡锡奎在那里，可以去那里研究。

在承德稍事停留，安排设立了联合会驻承德办事处，地址设在喀喇沁右旗王爷笃多博的家中，由田户任主任，我们就向赤峰进发了。在赤峰见到了热河省委书记胡锡奎。可是，到赤峰的第二天我就病倒了，病得相当厉害，只好派乌勒吉那仁带着乌兰夫信的抄件和包玉昆去王爷庙，请东蒙负责人派代表来承德、赤峰会谈。他们走了好几天，不见东盟负责人到来，就又派克力更代表我携带乌兰夫的

原信和包彦前去，仍约对方来承德、赤峰会谈。包玉昆到王爷庙后，因商谈林东和我们的关系问题又来到了赤峰，我才知道东蒙负责人还没有起程，于是亲笔给博产满都等九人写了一封信，请包玉昆再返王爷庙邀请。

我经过短期治疗，病好一些了。这时，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派来的白云航和其他一些人也到了赤峰。他找到热河省委负责同志，提出了种种要求。他说来这里是要成立卓索图盟政府，他又是东蒙古自治军委派的第三师师长，要组织部队，他还要发展人民革命党。他一来就和敌伪统治时代的一些人联系，并着手招收“散兵游勇”，用蒙古自治运动促进会的名义，在翁牛特右旗建立分会，动员各旗派代表去王爷庙开会，共三批十余人。他们还在青年中、学校中进行人民革命党的活动。胡锡奎同志对我说：“这里是我们党领导的八路军解放的地区，建立了人民政权，他的要求是不能同意的。现在联合会派你们来了，这里的蒙古族工作和自治运动应由你们负责。”又说：“你是联合会的代表，由你出面直接对他作工作更好些。”当时我看到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暂行纲领》和东蒙本部执行委员会发表的《内蒙古人民解放宣言》。《暂行纲领》中虽有“解放内蒙人民，确立民主主义政体”，“排除商业资本主义之榨取，为将来实现社会主义，使经济向非资本主义的路线上发展”等内容，但它声称：本党“受苏维埃联邦及蒙古人民共和国之指导”，“和中国共产党则取得紧密联络，互相帮助。”《宣言》则主张内、外蒙合并，声称：“内蒙古根据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指导，从此加入在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指

导之下，成为蒙古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以期完成解放。在国家组织完成以前，依据人民战线的原则，临时组织内蒙古人民解放委员会，迅速恢复地方秩序，以便使教育、产业、内政、外交、财政、卫生、交通、建设一切都蹈袭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成轨，推进合作的基础工作。”还看到参加东蒙古人民代表大会的喀喇沁右旗和翁牛特右旗的两个代表从王爷庙带回的《东蒙古人民自治法》、《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树立宣言》和《施政纲领》，其中虽没有提内、外蒙合并，但仍提出“在不侵害宗主国之主权范围内行使自治权”，这也远远超出了区域自治和地方自治的范围，没有正确地解决内蒙古民族解放的方向、道路和内蒙古革命斗争一系列根本性的问题。于是，我找到白云航和人民革命党在赤峰的负责人哈斯巴特尔和哈司存博儒商谈，郑重地告诉他们，我是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和云泽（乌兰夫）主席派到东蒙去谈判的，因病留在赤峰，已派克力更、乌勒吉那仁、包彦同志等去王爷庙邀请东蒙派代表来赤峰会谈。他们对双方在赤峰会谈表示很赞成（白云航和哈斯巴特尔后来也是“四·三会议”的东蒙代表），认为内蒙古自治的统一联合，应尽速进行，应在国共两党中央全会时提出意见，成立组织，争取时机。这次商谈，决定由张家口、王爷庙各派负责人五人在赤峰开会，并于一九四六年二月十三日，托我请分局转了他们致东蒙负责人的电报，催派代表，接着又派出专人快马去王爷庙促请。我还根据党解决民族问题的方针、政策以及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的方针、路线和各项主张，同他进行交谈，并介绍了联合会的情况，

指出联合会进行的自治运动是内蒙古解放的正确道路，希望他们参加联合会的工作，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和我们共同开展卓盟的自治运动。

白云航是白云梯（国民党中央委员）的弟弟，从前参加过人民革命党，曾由白云梯送往苏联学军事，他要我们把卓盟交给他，对我讲的有关内蒙古自治运动的方针、路线问题的话都听不进去，所以谈不拢。他在赤峰活动了一阵以后，看到自己的一套不可能实现，也就转弯了，想凭借我们党和八路军的力量把他扶起来，他表示愿意加入自治运动联合会，并实行我们的纲领，赤峰的人民革命党党员一律加入联合会，过去他们所成立的蒙古自治运动促进会一律取消，均组成我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的分、支会。并商定组织联合会热蒙工作五人委员会，由包彦、克力更、田户同志和金起铄、白云航为委员，包彦为主任（这个委员会后来没有成立）。但他一定要组织军队，他当师长；成立盟政府，他当盟长。经和胡锡奎研究后回答了他。我们提出：为了反对国民党的民族压迫，进行自卫，可以组织蒙古族人民的武装，受八路军统一指挥。但八路军的师都很大，在热河还没有师的建制，这支部队可以称热河支队（以后称作卓盟纵队），不要叫师，他可以当司令员。将来成立盟政府，也可以当盟长。但不能身兼数职，可以在司令员、盟长二者中选择一个。如我们所料，他要当司令员，并且将来还要当盟长。

## 关于东蒙古人民政府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六日，由东盟负责人组织的东蒙古人民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东蒙古人民自治法》、《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树立宣言》和《施政纲领》（当时还通过了《东蒙古人民政府组织法》，我没有看到过）的主要问题，如前面所说，虽不象《内蒙古人民解放宣言》那样明确地讲要内、外蒙合并，但仍把中国看成“宗主国”，这就是要“独立自主”，要同中国分离。代表大会选举政府主席及小会（即执委）代表四十五人，又由小会代表中选举干部会（即常委）及政府委员。干部会由博彦满都（原解放委员会委员长）、哈丰阿（人民革命党书记）、特木尔巴根（青年同盟书记）、玛尼巴达拉（原解放委员会秘书长）、阿斯根等七人组成。博彦满都为政府主席，哈丰阿为秘书长。据从王爷庙开会回来的代表说：会上，博彦满都致词称：“自治政府是苏军、外蒙、中共八路军帮助。第一步东蒙自治，第二步东西合流，第三步内外合并。”又说：德王府的“内蒙古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的代表也参加并讲了话。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自治法》认为中国是“宗主国”，要“在尊重中国宗主权下实行高度自治”。这是不符合内蒙古的实际情况的，不是中国革命和内蒙古人民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确定的内蒙古民族解放的正确方向、道路。我认为他们的《暂行纲领》、《自治法》、《施政纲领》等文件都是不能同意的，即于二月十六日把我的意见写成一份报告，连同东蒙



古人民政府的三个文件一并送到冀热辽分局(《暂行纲领》由胡锡奎同志带交分局)，并转乌兰夫。分局转报了中央。后来知道，东北局根据中央指示曾向东蒙的负责人明确表示：你们搞地方自治我们支持，但是你们的《自治法》和《施政纲领》不能同意，也是不可能实现的。我初次见到哈丰阿时，他告诉我，他曾和博彦满都、特木尔巴根去外蒙，要求内、外蒙合并，蒙古人民共和国方面表示：内蒙古问题由中国共产党负责，你们找中国共产党吧！在这种情况下，才成立了东蒙古人民政府。当时苏蒙联军还没有从内蒙古东部地区撤走，东蒙的自治和东蒙负责人去外蒙，是在苏军支持下进行的。他们从外蒙回来，外蒙派了工作人员驻王爷庙联系。

## 承 德 会 谈

克力更等人到达王爷庙的时候，正值东蒙古人民政府成立，他们向东蒙古人民政府主席博彦满都和负责人哈丰阿、特木尔巴根（哈、特又是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主要负责人）讲述了他们此行的使命。东蒙的三位负责人对同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会商很积极，决定亲自来赤峰和我们见面。三月间，他们和包玉昆、克力更、包彦、乌勒吉那仁一起经林东到达赤峰。我就此事电告了冀热辽分局，并转报乌兰夫。分局的意见是让我们和东蒙古人民政府的代表一起到承德去，让乌兰夫也到承德来参加谈判，并为此向晋察冀中央局和乌兰夫发了电报。

在赤峰和从赤峰到承德的途中，我和博彦满都、哈丰阿、特木尔巴根等人初步交换了意见。交谈主要是在我和哈、特之间进行的，博彦满都没有多参加。首先，他们向我简单介绍了东蒙古自治的经过，提到了苏联对日宣战后，东蒙古革命青年在王爷庙起义欢迎苏联红军，成立内蒙古人民解放委员会，同我们东北党组织联系，派玛尼巴达拉到北平向国民党请愿要求自治，也谈到了他们三人通过苏联红军去外蒙要求内、外蒙合并等等，但对人民革命党的情况却谈得很少。我说话是围绕着内蒙古民族解放的方向、道路问题，内蒙古自治运动的方针、路线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来进行的。我比较详细地介绍了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和乌兰夫的情况，讲了我党和联合会关于内蒙古民族解放和自治运动的主张，谈了我对《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暂行纲领》、东蒙古《自治法》和《施政纲领》的一些看法，表示了对组织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和内、外蒙合并、“独立自主”等问题的不同意见。对此，他们回答说，长期以来他们就追求内、外蒙合并，现在蒙古民族中也有这个要求，所以要实现内、外蒙合并。既然这个问题现在解决不了，那就内蒙古自己成立自治政府，没有必要搞自治运动。现在需要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以后可以自己干。于是，我讲了民族解放斗争必须正确地解决方向、道路的问题。经过交谈，可以看到双方分歧很大，这点他们自己也是明白的。尽管如此，正如哈、特自己表示的，他们有实现内蒙古民族统一和内蒙古东西部统一自治的愿望，因此，他们还是愿意和我们互相交换意见进行探讨的。

我们和博彦满都、哈丰阿、特木尔巴根等一行从赤峰到承德后不久，乌兰夫也到了。冀热辽分局程子华对他们一行来到承德表示欢迎，并向他们介绍了当时的形势。乌兰夫一见特木尔巴根就说：“啊！是老张啊！你在信上写特木尔巴根，我还不知道是你呢？”原来特木尔巴根在苏联留学的时候叫张成，当时特木尔巴根在东方大学，乌兰夫在中山大学，后经共产国际派回国，乌兰夫在内蒙西部工作，特木尔巴根在东部活动。双方原来都不知道谈判的对方是谁，没有料到竟是老友重逢，久别之后，又会合一起，都很高兴，这就为以后的谈判带来了有利因素。我原来一直在想，双方距离这么远，怎么容易谈得拢呢？这样一来，确实好谈多了，特别是他们两人交谈时，可以开诚布公，直接了当。会谈之前，在赤峰的人民革命党人员中，曾十分离奇地传说中国共产党派了一个汉人充当“云王”，到内蒙古来当主席。为此，我们在蒙古人中驳斥了这种无耻谰言，指出这是企图挑拨党和蒙古民族的关系，中伤乌兰夫，破坏党领导的内蒙古自治运动。这次会晤使得这种谣言不攻自破了。博彦满都见到乌兰夫，检讨说：“我算是改嫁了的媳妇又回来了，很惭愧！”还说他去外蒙时也说了这番话。

克力更和我向乌兰夫汇报以后，研究了会谈如何进行，接着就约他们交换意见。会谈开始是以自由交谈的形式进行的，因此虽然双方分歧很大，甚至发生激烈争论，但还不致于使会谈感到很紧张。这次会谈的议题是内蒙古自治的统一问题。在交谈中，先是他们谈了一下东部的情况，

接着讲了对内蒙古民族解放、内蒙古自治的看法和主张，也提到了他们去外蒙古要求合并等。统一和自治问题是与内蒙古民族解放的方向、道路问题，其中主要是党的领导问题相连的，由于双方对这个根本问题的看法不一致，因而在如何实现内蒙古的统一和自治问题上分歧很大，发生争论了。在赤峰时，我对他们的看法已经表示了不同意见，这次乌兰夫又讲了内蒙古民族解放的方向、道路问题，重申了联合会的主张，并指明这是中国共产党解决内蒙古民族问题的方针、路线、政策。经乌兰夫讲述以后，对这些问题他们不争辩了，但还是坚持内蒙古革命要由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来领导。为此，乌兰夫回顾了内蒙古革命斗争的历史，并根据历史经验来阐明内蒙古人民的革命事业只能由中国共产党来领导的道理。因为双方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分歧很大，乌兰夫是联合会执行委员会主席，有些问题不便当面和他们争论，所以，有些时候由我出面来和哈丰阿、特木尔巴根两位单独谈。

会谈进行了好几次，争论的焦点就是党的领导问题。考虑到他们没有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的实践，对内蒙古民族解放的方向、道路问题缺乏认识，只是在苏联红军到东北以后才起来搞自治的，所以我们决定耐心地多讲一些道理，多作解释。我们反复地从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特点，从内蒙古社会发展和内蒙古民族解放同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关系，谈到内蒙古革命斗争和当前自治运动的实际；从基本理论和民族解放的方向、道路问题，谈到当前的方针、路线、政策，由此来说明在内蒙古没有必要也不应该重建

人民革命党，更不可能由这样一个党来领导内蒙古民族解放斗争取得胜利，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同中国各民族共同获得解放。但是，这些话他们一时还是不能接受。后来，我们严正地指出：内蒙古的革命斗争向来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过去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也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帮助下建立的，其领导成员中的革命派主要是中国共产党党员，这和外蒙古人民革命党在苏联帮助下不同。（根据最近看到的党史文件，一九二五年十月，中央扩大全会的《蒙古问题议决案》中提出应当组织内蒙古国民革命党，一九二九年二月《中央给蒙委的信》中又提出“内蒙古国民党为革命的群众的组织”。内蒙古国民革命党又称内蒙古国民党，后来称为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但是，人民革命党内的反动派白云梯窃取了委员长的地位，尽管革命派撤消了白云梯的领导职务，在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后，白云梯等还是叛变革命，投靠了国民党反动派，招致了当时内蒙古革命运动的失败。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在全国“清党”的同时，下令解散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就是和白云梯等串通起来进行的。为什么国民党反动派在“清党”的同时，要解散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呢？还不是因为人民革命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组织吗？从此以后，人民革命党逐渐失去作用，停止了组织活动，内蒙古革命斗争就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并且开创了今天这个局面。否则，怎么能有我们今天的会谈呢？听了这些话以后，他们的态度开始有了变化，但是摆在他们面前的还有他们组织的人民革命党今后的去存问题。因为如果同意内

蒙古革命斗争不能由人民革命党而只能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取消这个组织就是势所必然的，所以他们仍然迟疑。后来，乌兰夫又找特木尔巴根进行了一次个别谈话，对特木尔巴根很有影响。他说：“你说的有道理，你的意见可以考虑。”

### 吸收哈丰阿和特木尔巴根入党

在冀热辽分局会议上，我们汇报了会谈的情况。当研究会谈下一步如何进行时，分局书记程子华提出了吸收哈丰阿入党的建议。分局同志都很赞成，认为根据哈丰阿自己的声明，他过去就是人民革命党党员，现在是为内蒙古民族解放而工作的，我们可以考虑他的入党问题。这个建议提出的经过我现在记不清楚了。可能是乌兰夫在汇报中说到和特木尔巴根单独谈话时，特木尔巴根提出了党籍问题，引起了程子华的注意和重视，因而提出吸收哈丰阿入党；也可能是程子华考虑到当时的形势与大局的需要而直接提出的。特木尔巴根得知以后，也要求解决党籍问题。特木尔巴根在苏联时参加了联共，回国以后一直没有关系，和我们党也没有联系。乌兰夫知道他这一段历史，所以他问乌兰夫他这个党员还算不算数，是否可以转为中共党员时，乌兰夫作了肯定的答复。分局同志对特木尔巴根由联共党员转为中共党员也都赞成。对分局的决定，乌兰夫和我完全同意，并由乌兰夫把党组织批准特木尔巴根由联共党员转为中共党员，通知了他本人。

哈丰阿的入党问题是由我谈的，他表示愿意和要求参加中国共产党。于是，分局又指定我和克力更为哈丰阿的入党介绍人，由我们把党组织批准他入党的决定通知了他。

吸收哈丰阿和特木尔巴根入党一事，分局曾报告晋察冀中央局和东北局，还报告了中央。

他们入党后，双方会谈就顺利了。经过耐心地讲道理，最后他们表示接受党提出的解决内蒙古民族问题和现阶段内蒙古自治的方向、道路、路线、政策的各项主张。我们提出取消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和解散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由联合会统一领导进行内蒙古自治运动，他们也都接受了，并征得博彦满都同意。只是在讨论为了体现内蒙古自治运动的统一，增补联合会执委、常委和增设一名副主席名单时，他们对执委会主席问题有异议，但后来仍同意了我们的意见，由博彦满都担任副主席。

至此，双方会谈在主要问题上都取得了一致。接着，根据对等的原则，商定由他们提出的东蒙方面参加联合会的执委、常委名单和我们提出的补充名单（我就是这次增补为执委和常委的），以及联合会的机构设置。对双方提出的各部、处负责人人选也作了安排。还商定由我起草一个双方会谈的决议。

承德的会谈，除多次个别交谈以外，双方一共举行了五次，后来统称之为准备会议。然后，开了一次双方全体代表参加的正式会议，通过会议的决议，会谈方告结束。

## “四·三”会议

一九四六年四月三日，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和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的代表正式举行了内蒙古自治运动统一会议。这就是有名的“四·三”会议。这次在党的领导下举行的承德会谈的正式会议，对内蒙古自治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参加会议的代表共十四人，联合会的代表为乌兰夫、刘春、克力更、包彦、田户、乌勒吉那仁、庆格勒图。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的代表为博彦满都、哈丰阿、特木尔巴根、包玉昆、白云航、义德嘎苏荣、哈斯巴特尔。

会上，双方代表一致通过了《内蒙古自治运动统一会议主要决议》。决议通过以后，由冀热辽分局上报晋察冀中央局、东北局，并转报中央。决议指明了内蒙古民族解放的方向、道路，对内蒙古自治运动的方针、路线、政策等一系列重大问题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决议确定“内蒙古自治运动的方针是平等自治，不是‘独立自治’”<sup>①</sup>，即在中国的版图之内实行民族平等和自治，“并且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帮助下，才能得到解放。”还确定要预防特务的

---

① 平等自治这个提法，是一九四六年二月十八日中央对内蒙古工作应采取慎重态度的指示电中提出的。电报中说：“国民党现利用所谓内蒙独立问题大造谣言，引起了国内外注意。我们对蒙古问题应采取慎重态度。根据和平建国纲领要求民族平等自治，但不提出独立自治口号”。



破坏活动，给国民党反动派与一切反对内蒙古自治运动的行为以打击。会议决定：“在目前的形势下，以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为内蒙古自治运动统一领导机关，东西各盟均组织其分、支会，实现其纲领。应建立各盟旗民主政府，分别受各解放区民主政府领导及帮助。”会议决定解散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成立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东蒙总分会。同时决定取消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但是这个问题没有写进决议里去，原因是哈丰阿和特木尔巴根提出他们回去做说服工作，由人民革命党自己作出决定，不要写在决议里。后来知道他们回去以后，宣布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停止活动，虽然没有明确宣布取消，但实际上是取消了。会议决定以赤峰为内蒙古临时中心，联合会就设在那里，但考虑到国民党反动派可能发动大规模进攻，也为联合会设在林东作准备。还决定联合会直接领导卓索图、昭乌达、锡林郭勒、察哈尔四盟；东蒙总分会领导兴安、哲里木、纳文慕仁、呼伦贝尔四盟；设立西蒙总分会，领导巴彦塔拉、乌兰察布、伊克昭三盟及宁夏蒙古（阿拉善旗、额济纳旗）。东蒙总分会以哈丰阿为主任，西蒙总分会以奎璧为主任，这两项决定没有写进决议。哈丰阿还任联合会的副秘书长和宣传部长，奎璧仍任组织部长。乌兰夫兼任军事部长，阿斯根和田户任副部长。会议还通过了哈丰阿的建议，采用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的旗帜为联合会会旗（上下红色，中间蓝色，蓝色中有黄色套马杆及锄头交叉，交叉中为红色五星）。考虑到这个政府已经决定撤销，采用其旗帜为会旗，对增进双方的团结合作是有利的，所以大家同意了。但这

个问题是临时动议，在会谈中没有涉及，所以决议中也没有写。

“四·三”会议作出的重要决定，诸如解散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各盟、旗政府分别接受各解放区民主政府领导，八路军在内蒙古各县发动群众、改造政权、维持治安，内蒙古军队分别地区归八路军各军区领导指挥，各解放区政府、各军区帮助培养蒙古干部、训练蒙古军队，西满多派干部参加王爷庙蒙古工作，为联合会设在林东作准备等等，后来都付诸实施了。由于这些决定的实施，使得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在与蒙古民族有关系的很多问题上，比较顺利地得到解决，对以后的解放战争以及动员内蒙古人民参加解放战争起了很大的作用。“四·三”会议以后，内蒙古各武装部队统一归属内蒙古人民自卫军建制，东蒙古人民自治军也改称为内蒙古人民自卫军。自卫军各部队归联合会领导，由联合会军事部管辖，但是分别接受八路军、东北民主联军和以后的人民解放军各军区的领导和指挥。博彦满都、哈丰阿、特木尔巴根回去以后，撤销了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根据东北局和西满分局的意见，改建兴安省，受东北人民政府和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双重领导。成立了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东蒙总分会和兴安省政府，哈丰阿任总分会主任，还兼任东北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特木尔巴根任省政府主席。党的东蒙工委改为兴安省工委，并增加哈丰阿、特木尔巴根、阿斯根、朋斯克同志等为工委委员。当时的卓索图盟、昭乌达盟各旗均属热河省，但是“四·三”会议以前，西拉木伦河以北的昭盟林西、

林东地区我党我军还进不去。“四·三”会议上，商定了《昭乌达盟行政问题蒙汉关系解决办法》，国民党开始大规模的进攻后，冀热辽分局和军区都转移到昭盟林西去了，联合会也准备设在林东。这些在当时来说都解决了很大的问题。

“四·三”会议，实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东西蒙古自治运动的统一，确定了东西蒙统一自治的方针，而且后来一步一步地都实现了。从蒙古民族本身来讲，这个统一是来之不易的，结束了几百年的分裂局面，所以有的同志说“四·三”会议是东西蒙统一会议，这并不夸张。“四·三”会议是内蒙古民族解放运动和内蒙古革命历史上带有关键性的一次重要会议，对当时全国的解放战争也是有贡献的。会议之所以能够由开始的重大分歧，经过激烈争论，终于通过了党所提出的决议草案，是与党所领导的中国革命发展总的形势分不开的。正是在中国革命事业胜利前进的影响和推动下，“四·三”会议才能够获得成功的。

### 卓盟纵队和卓盟反霸斗争

“四·三”会议后，东蒙古代表回去了。克力更、包彦、乌勒吉那仁决定去东部工作，也一同走了。因为“四·三”会议决定联合会会址设在赤峰，需要察看一下，作必要的安排，所以，乌兰夫和我们到了赤峰。这时，白云航已随哈丰阿等先到了赤峰，他停止了人民革命党的活动，但提出建立联合会卓盟分会时，他要任主任，热河省委不同意。

原来他曾提出要当纵队司令员(师长)和盟长,现在则要一身而三任。我们到赤峰以后,立即和白云航商量组织军队和他当司令员的问题。我们的意见卓盟政府现在还不成立,盟长一事以后才能考虑,他可以在司令员、分会主任二者中间选择一个。他经过考虑后表示愿当司令员,不过将来成立盟政府,还要当盟长。我们同意了他的意见。于是热河省委决定成立卓盟纵队,不称第三师,由白云航任司令员,孔飞任副司令员,乌兰任政治部副主任。当时白云航是没有兵的,这个纵队完全是热河省军区帮助建立的,并受冀热辽军区和省军区领导。

联合会卓盟分会,经过一番筹备以后也成立了,由孔飞任主任。分会成立以后的主要工作,是发动群众进行反霸斗争。当时我们同意白云航不任主任而任司令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使分会能够放手发动群众进行反霸斗争。可以设想,如果白云航任主任,很难指望他能够这样作。蒙古族人民发动起来以后,坚决要求枪毙伪满时喀喇沁中旗旗长陈子善,他是中旗一霸,民愤很大。“四·三”会议时,他曾自己跑到承德活动,想参加会议,未得允许。考虑到他是蒙古上层,当时我们还曾想过不采取镇压的办法,可是蒙古族群众的要求很强烈,所以乌兰夫批准把他枪毙了。这场斗争进行得轰轰烈烈,我们没有亲在现场,但随时听到情况汇报。这次反霸斗争是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第一次领导内蒙古地区的群众斗争取得胜利,是乌兰夫直接参加的,这以后的斗争和土改运动就都是在热河省委领导下进行了。喀喇沁中旗是蒙汉杂居区,考虑到这个

特点，确定在这里进行反霸斗争的方法是：放手发动群众，蒙汉共同参加，蒙霸蒙斗，汉霸汉斗。这样作的效果很好，可以避免阶级敌人挑拨民族矛盾，引起民族纠纷，为以后的土改创造了一个普遍适用的好经验。

赤峰是昭、卓两盟的中心，经济、文化在内蒙古地区是比较发达的，而且处于东、西蒙接合部。在这里停留一段以后，我们都觉得联合会设在这里是比较合适的。所以决定回张家口后就派干部来，逐渐进行各项筹建工作，后来确也派了一批干部来。当时热河省委还建议在这里设立自治学院，为内蒙古培养自治运动的干部，乌兰夫也同意了，并兼任院长，由金起铎任副院长，并从张家口派来齐永存任教育长。只是后来国民党大举进攻，占领了赤峰，才改变了联合会设在赤峰的计划。

## 联合会撤到贝子庙

卓盟的工作大体有了头绪以后，乌兰夫和我们返回承德。六月间，我们回到了张家口。到了九月，国民党军队开始全面进攻，傅作义的部队从绥远向东大举进犯。张家口准备撤出，于是晋察冀中央局决定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撤到锡盟贝子庙。

当时形势很紧张，敌人侵占张家口以后，派了一部分部队向北进占多伦，晋察冀中央局电告我们，敌人有突袭贝子庙的部署。当时，我们的部队很少，又搞不清楚敌人进攻的规模，所以，一方面在贝子庙安家，一方面在靠近

外蒙边境离贝子庙五、六十里的代喇嘛庙准备后方。中央局和苏蒙联军、蒙古人民共和国原有通讯联系，国民党开始进攻时，中央局撤到河北省阜平，相隔太远，没有必要联系了。于是中央局聂荣臻决定由乌兰夫在内蒙古就近和蒙古人民共和国保持通讯联络。我们讨论以后，乌兰夫决定亲自到蒙古人民共和国去取得联系。

乌兰夫走后不几天，敌人果然打到了正蓝旗。当时有很多人从张家口往东北撤退，一时都涌到了贝子庙。在贝子庙只有二十来个人的警卫排，敌人要进攻的话，我们是没有力量抵御的。就在这个时候，随着联合会撤退到贝子庙的伪蒙疆政府经济部长吉尔嘎朗潜逃到国民党反动派那里去了，他了解我们的虚实，所以我们就更紧张了。我和王铎、王再天、刘景平几个同志商量以后，决定调李秀山的骑兵独立旅迅速到贝子庙，并把联合会、锡盟机关以及一般工作人员和家属后撤到代喇嘛庙。在贝子庙存有很多从东北运往华北解放区的枪支，我们把一部分枪支武装了留在贝子庙的全体干部和工作人员，由刘景平指挥保卫贝子庙，我和王铎等撤到代喇嘛庙。李秀山部队接到调令赶来，到正蓝旗时与敌人遭遇，打退了敌人，敌人进占贝子庙的企图没有得逞。当时敌人只是派了一支骑兵部队来试探虚实，伺机占领贝子庙，看到我们有了准备，后来也没有再组织进攻。这时晋察冀中央局指示我们，为了避免敌人对内蒙古首脑部门袭击造成大的损失，要内蒙古党委向林西冀热辽分局靠拢。后又电告我们，中央局决定内蒙古党委就近受冀热辽分局领导。接着分局也来电要我们靠拢。但

是乌兰夫走后一直没有消息，我们很着急。我和王铎商量派王再天到中蒙边境去催乌兰夫回来。他走后也没有消息，只好我再去。我和王宗洛、勇夫（他们去过外蒙古）三人，乘汽车到了中蒙边境。我们刚到边境，外蒙的边防军就把我们包围了。经说明来意，才把我们带到了边防哨所。正好乌兰夫已经到达，准备出境，听说我们来了，就让他们把我们接进去。我把贝子庙的情况以及分局一再电催向他们靠拢的问题，都向乌兰夫作了汇报。乌兰夫也讲了到乌兰巴托联系的情况，还介绍吉雅泰（任过绥远地区工委书记，在乌兰巴托作中国侨民的工作）和我见了面。我们在边境上没有停留多久，就回到了代喇嘛庙。

## 向 林 东 转 移

乌兰夫回来以后，内蒙古党委向党委所属党组织、联合会各级组织以及内蒙古全体同志发了一个指示。指示是由我执笔起草的，分析了当时战争的性质和形势，对战争的发展和必胜的前途作了估计，号召内蒙古全体同志和全体蒙古民族以及各族人民团结起来，反对国民党大汉族主义的民族压迫，对蒋介石——以后又称为美蒋反动派的进攻，进行民族自卫战争，并提出了怎样进行这场战争以争取内蒙古民族彻底解放的方针、任务。其结束语为：成吉思汗的子孙团结起来，争取民族自卫战争的伟大胜利。时间是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同时对内蒙古地区的工作作了部署，决定把内蒙古自治运动的领导中心转移到林东去。这是因

为“四·三”会议决定了联合会的会址准备设在林东，这样也可以靠近分局。锡林郭勒草原上人口稀少，给养困难，没有粮食，交通很不方便。特别是草原辽阔，无边无际，容易遭受敌人的骑兵突袭，党的领导中心放在这里对于整个工作是不利的。

我们对内蒙古工作作了部署以后，乌兰夫派我和王再天先到林西向分局汇报情况。不久乌兰夫他们也从贝子庙到了林西。在林西，分局召集我们讨论了在当前形势下的内蒙古自治问题。分局和我们都认为可以考虑成立内蒙古自治政府，其性质是内蒙各阶层地区性的高度自治政府，同时内蒙古是蒙汉杂居，除纯牧区外，农业区和半农半牧区汉人占多数，必须吸收汉人参加，实质上又是蒙汉联合政府性质。内蒙古要实现自治，党政军民和军事、财经、文教均需有整个一套，内蒙古工作重心又在东北，为统一内蒙古领导，建议组织内蒙古党中央分局，归东北局领导。会上还谈了人民革命党、人民革命同盟和青年团等问题。分局将讨论的意见，于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五日报告了中央。关于内蒙古实现统一自治问题，我们在张家口的时候，就考虑过。一九四六年八月一日在乌兰夫复中央如何在内蒙古贯彻“五·四”指示解决土地问题的电报（电报是我起草的）中，提出了这个问题。电报中说：“目前我党在绥、察、热及东北所面临的问题，首先是十一个盟、一百七十八万人口的自治问题，过去阶段党已经克服了两次独立运动，承德会议在蒙人中影响较大，但蒙人一般不满目前的分盟自治与归省政府领导，要求统一自治。如何适当的满



足蒙古族这一要求，这与解决土地问题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关于此点，我已提出意见交中央局，请中央并予考虑”。分局讨论内蒙古自治问题以后，乌兰夫提出派我和吉雅泰到王爷庙和哈丰阿等人讨论召开执委会问题，分局同意了。我们走后不久，乌兰夫和联合会的其他同志就到了林东。

我和吉雅泰到了阿尔山，才知道敌人侵占通辽以后，东蒙总分会在这里设了一个后方办事处。办事处的负责人听说我们是联合会派来的，很热情地招待了我们。从他那里听到了“四·三”会议以后东蒙的一些情况：国民党已经占领了通辽、开鲁一带；新成立的兴安省政府迁到扎兰屯去了；东蒙总分会还在王爷庙等等。从阿尔山出发，两天以后，到了海拉尔，在那里见到了呼伦贝尔盟工委的郑北辰和高锦明等。又从海拉尔出发，于一九四七年元旦到了扎兰屯，在那里见到了特木尔巴根、克力更和朱子休、夏辅仁等。克力更当时是纳文慕仁盟工委书记，夏辅仁是委员，实际工作由夏辅仁主持。新年过后，我又从扎兰屯赶到西满分局所在地齐齐哈尔。

在西满分局，我们见到分局书记李富春，还有蔡畅。富春同志谈了当时整个东北的形势和东蒙的工作。他说：我们党在东蒙还没有站稳，东蒙地区我们党虽然进去了，作了些工作，发展了革命力量，撤销了东蒙古人民政府，成立了兴安省工委和政府，但很多人都希望成立内蒙古自治政府。现在看来还是存在着很多问题，原因就是受到国民党反动派进攻的影响，有些人毕竟要考虑他们在这种形势下该怎么办了。对联合会的工作应该怎么做，他谈了

总的精神，指示我首先是争取团结绝大多数，多和哈丰阿谈，有什么问题可同兴安省工委商量，重大问题报告分局。

## 王爷庙的新情况

在齐齐哈尔，停了不到两天的时间，我就到了王爷庙，和哈丰阿、博彦满都见面了，也见到了兴安省工委书记张策和其他同志，同张策交谈了情况。兴安省工委门口挂着西满军区办事处的牌子，但都知道是工委机关。

我们住在东蒙总分会。经过和哈丰阿等初步交谈，发现这里的负责人中有些人思想上有较大的波动。我向他们转达了乌兰夫的意见，并就在国民党反动派大举进攻的形势下，联合会如何组织蒙古人民进行民族自卫战争，如何贯彻实现“四·三”会议决议，在新形势下开展自治运动等问题，同他们交换意见。我提出请哈丰阿邀集博彦满都、特木尔巴根等联合会的负责人开会，传达乌兰夫的意见，讨论当前的形势、蒙古民族怎么样进行民族自卫战争、联合会今后的工作以及召开执委会全体会议的问题。但有人对内蒙古执行党进行民族自卫战争的方针、政策信心不足，发生了疑虑。我和吉雅泰到王爷庙不久，博彦满都给我们“接风”，在他家吃饭中间，内蒙古人民自卫军第一师司令（师长）莫德尔图忽然把手枪放在炕桌上，竟然气势汹汹地说：“过去我们是听了西边的，现在也应该听我们东边的了，是不是我们蒙古人一定要跟着共产党去打仗？我们可不可以退出这个战争，保持中立？”他突然提出这样严重的问题，

显然是因为当时的战争形势比较紧张，国民党的部队离王爷庙不太远，象他这样的人就动摇了。当然除他以外，还有其他人，也还有一些主意不定、认识模糊的人。有人就主张我党和民主联军的人员、军队从东蒙撤出去，只要有代表就行，并且对逮捕向国民党请愿因而被收买成为国民党特务的玛尼巴达拉极为不满。当时在王爷庙的部队，就是莫德尔图的第一师，他觉得自己有势力，有最大的发言权。不过他不知道情况正在变化，广大蒙古人民和革命干部、革命青年的民族解放觉悟已经大大提高了，对前途是充满信心的。就在第一师和人民革命青年团，东蒙（兴安省）的党组织发展了一批党员，好几位负责人，如王海山、都左尔扎布、旺丹同志以及其他一些同志已经是党员了。不过我们还是把我们党的方针严肃而又耐心地进行了解释，反驳了他的意见。由于当时气氛很紧张，所以博彦满都出面打圆场，他说：“不谈了吧！吃饭，吃饭”。为此我到西满军区办事处同张策进行了研究，认为在国民党反动派大举进攻的形势下，东蒙确有一些人在思想上产生了波动，情况很值得注意。

## 中央决定成立内蒙古自治区 和联合会迁到王爷庙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党中央根据当时形势的需要，采纳了西满分局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八日关于成立内蒙古自治区的建议，认为经过一年多的自治运动，成立内蒙古

自治政府的条件已经成熟，于十一月二十六日发出了对内蒙古自治问题的指示电。指示中说：“西满分局巧电悉。内蒙自治，现在不仅东蒙无论老年、青年，进步的、落后的一致有此要求，而且国民大会的内蒙代表一致有此要求，”“估计国大不会允许自治，但可能恢复蒙政会及采取其他欺骗。前此东蒙自治，正值政协初开与东北问题紧张时期，现在政协与东北问题均成过去，国内舆论同情内蒙自治，而国方已逐渐侵入内蒙。故中央认为，为了团结内蒙古人民共同抵抗蒋介石的军事进攻与政治经济压迫，现在即可联合东蒙西蒙成立一地方性的高度自治政府，发布施政纲领，对蒙汉杂居地区仍容纳汉人合作，并避免采取独立国形式。”中央要求东北局、晋察冀中央局、冀热辽分局、晋绥分局、西满分局和乌兰夫同志“即考虑此事，提出具体意见，进行具体准备，以便于最近期内实现。”这是一个英明的决策。当我们和哈丰阿等知道中央来电内容以后，非常兴奋。有些对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持怀疑态度的人，不相信可以取得胜利的人，和想在国共两党之间保持中立的人，也都表示赞成这个决定。这就使主张置身于解放战争之外的思想一下子失去了市场。大家都在考虑怎样成立政府的事，所以紧张一时的局面缓和下来了，各项工作的进行也顺利多了。

为了了解东盟负责人对成立内蒙古自治政府的想法，我分别同他们交谈了几次。他们谈了很多意见，中心问题还是党的领导，以及与此相连的人事安排。有人还主张组织人民革命党，领导内蒙古工作。对人选问题，我表示有

些意见是适宜的，整个人事安排应待乌兰夫来后商定。对党的领导问题，我说：“四·三”会议已经正确地解决了不应再提。这样他们才没有继续谈下去，但并不是放弃了自己的意见。

正在这个时候，乌兰夫从林东给我和哈丰阿来电，说他要到王爷庙来讨论召开联合会执委会议和成立内蒙古自治区的问题。我送此电给哈丰阿时，他表示非常赞成，并积极准备欢迎。因为从林东到王爷庙的路上，国民党土匪很多，乌兰夫来电中提出要部队到中途去接，我就此事同哈丰阿商量时，他一口承允，随即派王海山带了一个团，并由辽吉军区派出两辆汽车，迎接乌兰夫和联合会的其他同志到了王爷庙。从此，内蒙古党委和联合会的领导中心转移到了王爷庙。

### 拟订“选举联盟”

为了准备召开联合会执委会议和成立内蒙古自治区，东北局来电邀请联合会各负责人，乌兰夫、博彦满都、哈丰阿、特木尔巴根、乌力吉敖其尔、奎璧、克力更和我到东北局去。路过齐齐哈尔，西满分局书记李富春主持召开了一次隆重的“欢迎乌兰夫主席、博彦满都副主席大会”，并派方知达同行工作。到了哈尔滨以后，东北局把乌兰夫、博彦满都一行作为贵宾安排在宾馆里招待。这是表示对蒙古民族的尊重和对这次会议的重视。东北局的负责人林彪、罗荣桓、高岗（当时任东北局秘书长）、李富春（在齐齐哈

尔)等都接见了内蒙古的负责人。东北局指示说:你们自己提出一个施政纲领和政府组织法,人选问题也由你们自己讨论决定。这时(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三日)中央又向各有关中央局、分局发出《关于内蒙古诸问题的意见》的电报,其中谈到:“东蒙及热察三地蒙民久已要求成立统一的自治政府,我们不应再劝阻,故原则上我们同意……产生内蒙统一的民族自治政府。”并指出:“内蒙自治政府非独立政府,它所反对的为蒋介石国民党独裁政府及其所制定的取消民族自治权利的伪宪法与其卖国内战反动的政策”。电报还提出一些起草自治政府纲领和组织法必须注意的问题。由于有中央明确而具体的指示,我们开会讨论很顺利,由我执笔起草了自治政府《施政纲领》和《暂行组织大纲》,经大家讨论通过后报到东北局,并转报党中央原则上批准。人选问题,拟定由乌兰夫担任内蒙古自治政府主席,博彦满都担任参议会会议长(当时各解放区政府都有参议会),哈丰阿担任自治政府副主席。还共同商定了政府组成人员名单和参议会名单,其中包括东西部的蒙古族负责人和汉族负责工作人员,包括了各阶层、各方面的人士,而且中上层的比例相当大,上层里左、中、右三方面的都有。后来我们就把这两份协商确定的名单,称之为“选举联盟”。这个“选举联盟”的代表性是相当广泛的,反映了蒙古民族团结一致进行反蒋自卫战争的决心。这里面包括的一些人是当时蒙古族青年不拥护的,但是我们认为还是应从大局出发,要团结全民族的各阶级、各阶层,不能因为有些人过去做了一些不应该做的事,就把他们排除在外。我们认为这个

政府是内蒙古民族统一的自治政府，建立这样的政府将是内蒙古历史上空前的盛举。因此，组成这个民族的自治政府，必须具有最广泛的代表性，必须能够代表全民族，其成员必须能够代表内蒙古的各阶级、各阶层、各界、各方面、各民族，必须能够团结除蒙奸、反革命、人民敌人在外的全体人民。所以，如果没有这些人，就会使我们团结的范围不够广泛。如果我们不采取正确的政策，由于我们政策上的过失，不能在最大范围内团结各阶层的人，那将是我们的责任。这个“选举联盟”，在当时来说是很正确的，东北局也同意了。

我们还认为，这个政府之所以是高度的自治政府，也是当时形势的产物。当时解放战争正在进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未建立，还没有中央人民政府，所以内蒙古地区的自治政府必然是高度的自治政府。但高度自治仍然是平等自治，而不是“独立自治”，是在统一的国家内的自治，这个性质并没有变化。

### 内蒙古自治政府的成立

哈尔滨会议以后，大家高高兴兴地回到了王爷庙。一九四七年四月三日，也就是“四·三”会议一周年之际，召开了联合会执委会议，确定成立内蒙古自治政府。可是到了四月二十三日召开内蒙古人民代表大会（开始时称为人民代表会议）的时候，有些人竟然不想选举在哈尔滨共同商定的参议会和政府组成人员名单中的人了，提出了不选

延安来的蒙古革命干部(大概是除乌兰夫、奎璧同志以外)、不选日本投降以后参加革命的青年(包括东部的青年在内)、不选汉人的“三不选”主张,并重新拟定了一个参议会和政府组成人员名单。这实际上是要建立一个由封建上层控制的政权。参加这个活动的,不仅有原东蒙古人民政府的人,还有从西边来的人。临近选举时,一些蒙古族党员和革命青年知道了这个情况,立即向党组织作了报告,因此我们才得以知道。这个问题发生的太突然,我们事先没有一点思想准备,所以内蒙古党委和兴安省工委立即召开会议共同讨论对策。会上,也有同志提出要号召选举好人(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民主根据地选举中曾提过这种口号),这样大家就不会不选共产党员、革命干部和革命青年了。但是大多数同志的意见认为还是要作具体部署,不可掉以轻心,贻误大事。决定用各种方法向所有参加选举的共产党员、内蒙古人民革命青年团团员和一些青年作具体布置,坚决执行协商确定的“选举联盟”,不仅要保证他们所谓“三不选”的同志当选,还必须保证博彦满都当选,保证哈丰阿、特木尔巴根、乌力吉敖其尔、朋斯克等当选。我们根据当时的形势,估计到乌兰夫当选为自治政府主席可能是没有问题的,只要保证这一点,其他同志即使不当选也还可以掌握这个政权。退一步说,即使我们全部落选,我们也还是可以重来的,在东北解放区的后方,估计也乱不到那里去,翻腾几下,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不过为了对付意外的情况,也作了必要的准备。

代表们正式投票选举的时候,气氛很紧张。由于他们



提出的错误主张不得人心，所以选举结果我们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我们保证要当选的人都当选了，乌兰夫、奎璧得票最多，其他都过半数当选。而落选的人得票数也都接近，只差几票。当时规定的是限额选举，即限制了当选参议员的名额，不过半数票不得当选，虽过半数但超额也不得当选。排列在限额最后的有四个人得票数相同。这时我们又面临着一个复杂的局面，因为四个人中只能有一人当选。经过研究，乌兰夫提议由主席团开会决定当选人，报告大会通过，以保证更具有代表性的人士当选，实现我们的“选举联盟”。但有的同志却主张由四人抽签来决定谁当选。我们当然不赞成，万一具有代表性的人不能当选，就打乱了我们的“选举联盟”，给反对我们的人以借口，对我们是不利的，也无法向党中央和东北局交待。可是，这个问题提交讨论时，这四个候选人都坚持要抽签，不同意由主席团决定。参加主席团的有些同志当时在政治上没有经验，看不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也有同意抽签的。尽管乌兰夫和我们不同意，但是多数人主张抽签。结果是“选举联盟”拟定的人抽着了，这个严重的问题就这样侥幸地解决了。我们后来总结这次会议斗争的经验教训时，说这是“仰赖马克思在天之灵”，靠这种偶然性得到的结果是不足为训的。

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参议会后，接着召开参议会选举了正、副议长，政府主席、副主席和委员。选举前通过了《施政纲领》和《政府暂行组织大纲》。《施政纲领》明确规定：内蒙古自治政府，以内蒙古各盟（包括盟内旗、县、市）旗

为自治区域，是中国的组成部分；自治政府是实现高度自治的区域性的民主政府；区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建立各民族间的亲密合作团结互助的新民族关系。首届政府委员会通过五月一日为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纪念日，原联合会会旗为政府旗。还通过内蒙古自治政府暂设王爷庙，并改王爷庙为乌兰浩特市（红城）。一九四七年五月一日，内蒙古自治政府宣告成立，向党中央毛主席、朱总司令发了致敬电。还向斯大林和却伊巴桑发了致敬电。后来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发来了贺电。贺电说：“曾经饱受困难的内蒙同胞，在你们领导之下，正在开始创造自由光明的新历史。我们相信蒙古民族将与汉族和国内其他民族亲密团结，为着扫除民族压迫与封建压迫，建设新蒙古与新中国而奋斗。庆祝你们的胜利。”内蒙古人民代表大会开会和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的时候，东北人民政府和辽西省政府都派了负责同志前来热烈祝贺，西满分局和西满军区派张平化参加并指导工作。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内蒙古自治政府的成立，不仅解决了蒙古民族多年以来梦寐以求的一个根本问题，标志着内蒙古民族解放事业和内蒙古人民的革命斗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而且在全国范围来说也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对各少数民族的解放斗争作出了榜样。同时在对敌斗争紧张的时候极大地鼓舞了内蒙古人民和全国各民族人民。我们党领导内蒙古人民实现了多年的愿望，受到了广大蒙古民族人民的衷心拥护和爱戴。当新政府宣布成立时，内蒙古人民、蒙古民族各界人士无不兴高彩烈，踊跃欢呼，热烈

庆祝，互相致贺，同声欢呼党的民族政策的伟大胜利。

## 内蒙古共产党工作委员会的成立

正当内蒙古自治区成立的时候，党内有人忽然又提出要建立或恢复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来领导内蒙古，并要求乌兰夫召集会议讨论这个问题。开始乌兰夫不同意，指出这个问题“四·三”会议早已解决了，事隔一年，人民革命党早已停止活动，不要再提也不应再讨论了。但他们坚持要开，乌兰夫只好开了一次小型党内会议，讨论这个问题。会上他们提出：根据内蒙古社会历史现状的实际情况，应该建立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以此来领导内蒙古的革命运动。理由是：1.内蒙古的社会状况和内地不一样，内蒙古没有无产阶级，成立共产党没有阶级基础，所以只能成立代表牧民和农民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2.内、外蒙古不仅是同一个民族，而且社会经济结构也相同，外蒙古革命是由蒙古人民革命党领导的，所以内蒙古也只能成立内蒙古人民革命党；3.内蒙古的历史上也有过内蒙古人民革命党。

我们不同意这些意见和论点，因而发生了激烈争论。我们指出把已经解决了的问题又重新提出来是错误的，不是一个共产党员所应采取的态度，希望他们放弃这个意见。对他们所持论点的回答，在前面都已讲到了。但这次我们还分析了内蒙古社会经济发展和中国社会经济是一个整体的问题，指出：同一国家、同一社会不可能在各个民族中分

别产生和形成各自的无产阶级，任何一个中国境内的民族都不可能单独产生和形成自己民族的无产阶级。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并不只是那一个民族的党，那种说中国共产党是什么“汉人党”，因而蒙古民族或国内其他民族的解放运动不能由中国共产党来领导的观点是根本错误的。更何况中国共产党过去领导内蒙古革命斗争和民族解放斗争，获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现在又领导内蒙古民族人民成立了自己的自治政府，为什么要改变历史形成的事实呢？

后来，他们想出一个妥协的主张：在内蒙古可以成立中国共产党工作委员会，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可以接受中国共产党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但是中国共产党不建立各级组织和支部，也不发展党员，内蒙古地区和内蒙古工作统由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来负责直接领导。由于双方的意见无法取得一致，我们提出把争论的问题向东北局和党中央报告，他们也同意这样做。东北局很快发来了回电，说中央决定“内蒙古不组织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成立内蒙古共产党工作委员会。”乌兰夫和我接到电报以后，对“内蒙古共产党工作委员会”一词作了研究，以为发电报时译错了，所以立即致电东北局询问：“来电成立内蒙古共产党工作委员会是不是译电有误？”东北局回电说就是叫内蒙古共产党工作委员会。我们很快把东北局的复电给提出争论的几个同志看了，他们也再没有提出不同意见，从此再也没有提出成立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事。后来，他们还在党的会议上承认了自己过去的错误。

原来东北局于一九四七年四月一日曾向中央就人民革命党重新组织和内蒙古党的领导问题提出过意见，认为“最近东蒙有些人又重提组党，动机不尽纯洁，因此，组织内蒙古人民革命党问题应慎重考虑，待内蒙共产党及群众有相当基础，东蒙领袖分子能经过考验进一步靠拢我党时，看清情况是否需要再定”。并说：“目前是首先成立内蒙古自治政府，组党问题，以时机未熟，不提出。”“现在即组内蒙古共产党工作委员会，吸收内蒙的积极分子及进步分子入党……，内蒙古工委受东北局领导。”中央在四月二十日《对于东北局关于内蒙古自治问题意见的复示》（由周恩来同志批发）中，对这个问题即已同意东北局的意见，作出了决定，并任乌兰夫为书记。内蒙古工委委员还有奎璧、王铎、王再天、王逸伦、克力更、哈丰阿、特木尔巴根、朋斯克和我，吉雅泰为候补委员（一九四九年六月，经中央组织部和东北局批准，作了调整，乌兰夫仍任书记，我任副书记，奎璧、王再天、王逸伦、王铎、吉雅泰为常委，委员克力更任青委书记。哈丰阿、特木尔巴根和朋斯克三位仍为委员）。

一九四七年七月九日在乌兰浩特隆重举行群众大会，公开宣布内蒙古共产党工作委员会的成立，乌兰夫代表工委在大会上讲了话。党的公开，在内蒙古民族中产生了极大极良好的影响。从此在整个内蒙古巩固地确立了我们的党的领导，党的崇高威信在内蒙古人民中日盛一日地不断增长与提高。

就在党内有同志提出要建立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同

时，和内蒙古共产党工作委员会成立前后，内蒙古东部刮起了一阵邪风，由各色各样人拼凑起来的各种名目的“党”纷纷出现。这些所谓的“党”，人数极少，有的只有几个人。它们提出各种反动的主张，其中包括一些没有政治常识的奇谈怪论。在我们党的工委公开宣布成立以后，它们也就逐渐销声匿迹了。一些由反动分子组成的或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人民政府依法作了处理和制裁。呼伦贝尔盟和纳文慕仁盟一些反动分子组织的所谓“正义党”，企图在这两个盟组织反动政府，并在扎兰屯进行反革命暴动，人民政府镇压了这一反革命活动。以原东蒙古人民政府警卫团长（伪满军官）张尼玛为首的反动分子组织的“劳动农牧民革命前进会”，策划进行军事叛乱，准备在宣布内蒙古共产党工作委员会成立的大会开会时炸毁主席台，杀害党的领导人，推翻我党的领导和人民政权。党和革命群众及时发现了这一罪恶阴谋，粉碎了这次叛乱。

内蒙古共产党工作委员会（习惯上仍称内蒙古党委）宣布以后，根据东北局的决定，撤销了兴安省工委，全部工作移交内蒙古党委。

### 东北局对于内蒙古工作的指示

这场政府选举和要不要成立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争论，引起了党中央、东北局和西满分局的高度重视，所以东北局要乌兰夫和我到哈尔滨去汇报，并对内蒙古地区的工作作了具体指示。东北局的分析是：虽然成立了内蒙古

自治政府，全国解放战争的形势也已经开始好转，但是蒙古民族要彻底翻身解放，彻底肃清几百年来的封建压迫和民族压迫的影响，不是一两年的时间内所能办得到的。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前后所发生的一系列事情，不管它形式上是另拟选举名单，还是主张成立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根本的问题还是代表着一种倾向。就是有些人甚至包括我们党的一些同志，看不清蒙古民族的解放和反对美蒋反动派的自卫战争胜利的前途，所以主张在自卫战争中保持中立，搞“独立自主”或者叫“孤立自治”。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从教育青年，大量培养干部，改造军队，发动群众进行民主改革，发展党、团组织等根本问题上做起。东北局指示我们首先要把以上几项工作作好。并指出内蒙古党委的工作重点要放在下面，负责同志不要浮在上面，要下去，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上面乱一点也不要紧，主要是放手、大胆、深入发动群众，在群众中扎下根，打好基础，巩固已经取得的胜利。李富春说：内蒙古四周是东北解放区，铁桶江山，要乱也乱不到那里去。但内蒙古又是东北的后方，现在我们还没有站稳，所以要努力把工作作好，要巩固，不要发生大乱子。处理问题要慎重，工作要踏实，必须团结蒙古民族的绝大多数。现在的改革是削弱封建，还不能是激进的，必须采取慎重缓进的方针。为了贯彻执行东北局的指示，内蒙古党委作了一个详细的工作计划，一项一项地作了部署，付诸实施。

## 呼伦贝尔地方自治政府的撤销

呼伦贝尔地方自治政府，是苏军撤退前，在苏联支持下成立起来的。当时苏联可能是对我们打赢这场战争估计不足，为了准备在国民党侵占西满时留一个缓冲地带。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以后，我们就讨论了撤销这个政府的问题，认为内蒙古自治政府是统一的民族的自治，下面不应该再实行什么地方自治。但是，呼伦贝尔地方自治政府是得到苏联支持的，政府主席额尔钦巴图虽然是个上层王公，但和苏联的关系却很密切，所以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不是内蒙古自治政府所能解决得了的。这次我和乌兰夫到东北局汇报工作的时候，提出了我们的意见。当时高岗说：“我们同意你们的意见，你们直接找苏联在哈尔滨的代表谈吧！”于是由东北局把我们介绍给苏联代表（总领事）。我们在同苏联代表会谈时提出：过去日本刚刚投降，内蒙古各地方都自己起来自治，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现在情况不同了，已经成立了高度自治的统一的内蒙古自治政府，所以，同一民族的一个部分对本民族统一的自治政府实现自治的状况继续下去是没有必要的。我们认为呼伦贝尔地方自治政府应该撤销。苏联代表同意了我们的意见，只要求我们给呼伦贝尔地方自治政府的人员都安排适当的工作，我们也同意了。我们回来以后，邀请呼伦贝尔地方自治政府主席额尔钦巴图到乌兰浩特来，共同商量撤销呼伦贝尔地方自治政府的问题。大概是苏方已经先通知了他，



所以接到邀请后马上就来了。对乌兰夫向他提出撤销呼伦贝尔地方自治政府，成立呼伦贝尔盟政府，额尔钦巴图任盟长，给自治政府的其他人员都安排工作的建议，额尔钦巴图都同意了，回去后也立即取消了这个自治政府，改建呼伦贝尔盟政府。

### 教育青年，培养干部，发展党、团组织

西满分局为了给内蒙古大量培养干部，在齐齐哈尔专门办了一所内蒙古军政大学，校长由乌兰夫兼任，派齐永存任教育长，干部都由内蒙古党委派去，而工作则由西满分局领导，并负责供给经费和给养。在这个军政大学里前后培养了一大批蒙古族青年干部，后来大部分学员走上了重要的岗位。为什么在齐齐哈尔办一所军政大学呢？这是为了防止在学校教育和学员学习过程中受到干扰。后来，在内蒙古党委领导下，建立了内蒙古军政学院，以后改为内蒙古党校，乌兰夫兼校长，我兼副校长，尹育然（丁仕一）任教育长。军政学院和党校也培养了一大批蒙古族干部，其中很多人也走上了重要的岗位。

在内蒙古党委领导下，各级党委采取积极慎重的方针，从部队、机关、学校、厂矿以及土改后的农村和牧区吸收了一大批党员，主要是青年党员，发展和健全了党的组织。还大量发展了青年团员，并改内蒙古人民革命青年团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即后来的共青团，建立了团委和团的各级组织。对蒙古族知识分子则都安排了工作，采取

团结、信任、使用的政策。我们曾经进行过调查，蒙古族的知识分子，除了跑到国民党那里去的极少数人以外，几乎都有适当的工作。

## 支援解放战争

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以后，不仅对知识分子，而且对各行各业都采取安居乐业的政策，让农民有地可种，牧民有牲畜可放，商人有买卖可做。在东北解放区的支持下，内蒙古银行发行的纸币和东北银行发行的纸币等值，可以互相兑换。当时内蒙古自治政府没有支前任务，财政经济上又得到东北解放区的支持和援助，所以内蒙古地区的经济很快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甚至比东北一些地方还高。只是东北解放区可以来内蒙古自由采购，就算是对解放战争的一种支援。鉴于这种情况，乌兰夫代表内蒙古自治政府，向东北局提出内蒙古也出钱支援前线。东北局陈云说：“你们搞好自己的事情就行了，不要交什么啦，把内蒙古工作作好了，中长铁路沿线不出乱子，就是支援前线嘛。”乌兰夫说：“现在日子还过得去，应该支援。”所以陈云又说：“既然要支援就象征性地交一点吧！”因此，内蒙古自治政府为了支援前线向东北行政委员会交了一点钱，具体数字记不清楚了，按以后的人民币折算，大概是几万元吧？真是微不足道，不过尽心而已。

## 改造军队，参加解放战争

“四·三”会议以后，内蒙古军队一律称为内蒙古人民自卫军，东部的东蒙古人民自治军也改称自卫军。自治政府成立后，对全军各部队都进行了改造和训练。一九四八年一月，内蒙古人民自卫军改编为内蒙古人民解放军。土地改革以后，大量翻身青年农民踊跃参加了解放军。一九四九年五月，内蒙古人民解放军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序列，同时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内蒙古军区，受东北军区领导。在辽沈战役期间，内蒙古人民解放军以师为单位，在各省军区的指挥下参加了这次战役。内蒙古的一师、二师虽然不是主攻部队，但是消灭和俘虏了不少敌人，也缴获了很多武器弹药。内蒙古东部（当时有些地方还不属于内蒙古自治政府管辖）被国民党占领地区的大部分，是内蒙古部队自己解放的，对于这些地区国民党军队和勾结敌人的土匪，都是内蒙古的部队去消灭的（对当时参加西部地区和平津战役的战况我不清楚）。所以说，内蒙古人民、内蒙古政府、内蒙古军队，不但支援了解放战争，而且直接参加了这次战争，为全中国的最后解放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 农业区的土地改革

民族问题的彻底解决，不仅要扫除民族压迫，还必须消灭封建剥削。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以后，内蒙古党委就

考虑了根据毛主席、朱总司令贺电中指示的精神，实行民主改革，主要是土地改革，消灭封建制度的问题。但是，内蒙古农业区的土地改革，是从一九四七年底才开始的，这是有客观原因的。当时东北地区正在搞土改，可是内蒙古要成立自治政府，还要培养干部、改造军队，所以一直没有来得及办这件事。到了后来，尽管有一部分人（主要是在上层中）说什么蒙古民族没有阶级，内蒙古只有民族问题，没有民主问题，反对民主改革和土地改革，但是广大劳动人民都是迫切要求改革的。靠近黑龙江省、嫩江省和辽西省的农业区蒙汉农民就自动组织农会，搞起了土地改革。在这种情况下，进行农业区土地改革的条件已经成熟了，不能再缓了。内蒙古党委讨论了这个问题之后，向东北局作了汇报。东北局让乌兰夫和我到哈尔滨去，共同研究这个问题。当时东北局负责人高岗问我们：“内蒙古地区的土地改革完全按照《中国土地法大纲》行不行？”我们说：“完全照办恐怕不行，因为《中国土地法大纲》没有也不可能反映内蒙古地区的具体特点，所以执行《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同时，还要制定适合内蒙古地区实际情况的补充办法”。在内蒙古的农业区虽然有很多汉族农民，但是这些农民都认为他们种的地原来是蒙古人的，蒙古人更是这样认为的了。实际情况也是如此。土地关系和民族关系纠缠在一起，问题很复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由我执笔起草了一个内蒙古农业区土地改革补充办法。这个补充办法，经过东北局审查原则上同意。李富春看了以后说：“你们现在可以根据土地法大纲消灭封建，可以采取激进的土地政

策了。”这个文件根据内蒙古农村土地关系的特点和民族关系的特点，规定了一系列处理民族关系、调整民族关系的具体原则，虽然没有正式公布，但是在实际工作中是按照其中的规定执行的，为内蒙古地区土地改革工作的顺利进行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比如前面说到的卓盟反霸斗争中实行的办法：恶霸地主是蒙古人必须由蒙古族农民起来斗，是汉族人必须由汉族农民起来斗；分配土地时，在农业区如果是户口地，中小地主一般不动，富农一律不动；在半农半牧区小地主、富农的土地不动；汉族农民和蒙古族农民分同样的土地，但是允许蒙古族农民多分一点，等等。对此汉族农民也都赞成，没有意见。在土地改革中，在基本群众发动起来以后，内蒙古党委和各盟、旗党委还做了大量说服工作，保护了翻身农、牧民有意见的担任公职的蒙古族中上层人士和家属，在他们认错的情况下，避免了对他们的斗争。

在全面铺开土地改革之前，内蒙古各级党委进行了整党。内蒙古党委整党时召集了各盟、旗党委主要负责人参加，由我主持，共同进行，先走一步。各土改工作队也是经过“五查”（查思想、查立场、查作风、查阶级、查成份）以后才进村的。土地改革一般都经过大胆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清算反霸（反奸）斗争、组织贫农协会、分配土地、建政等几个阶段，大体上和东北地区相同。

土地改革全面铺开是在一九四七年十一月间。当时在内蒙古党委召开的兴安盟群众工作会议上，宣布了内蒙古地区根据一九四七年九月中国共产党全国土地工作会议通

过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在农村进行彻底的土地改革。从此全面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推翻了封建土地所有制，使蒙古族和汉族以及其他各民族无地少地的农民都分得了土地，获得了彻底的翻身，解放了广大农村的生产力。在城市也发动群众进行了民主改革，使城市贫民获得了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得到翻身。

### 牧区的民主改革和 “三不两利政策”的提出

牧区的民主改革，开始进行的是“互助”运动，这是西满分局提出来的。就是牧主拿出牲畜，牧民放牧，收获大部分归牧民所有。当时呼伦贝尔盟的一些有牲畜的人，专为这个事来找我们，他们的意见是牧主牧工三七或四六分成都可以。我们党早就提出要在牧区实行民主改革，并提出了废除封建特权，“牧场公有，放牧自由”的政策。到了一九四八年元旦，为了动员全区人民进行土地改革，我们在《内蒙古日报》上发表了一篇社论，提出了“农业区要消灭封建”，“牧业区也要消灭封建”的口号。说是“也要”，当时的意图是先在农村区进行土地改革，牧区和农业区的情况不同，所以要有区别地进行，但也要改革，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由于理解的差误，牧区、半农半牧区，自从这篇社论发表以后，没有经过必要准备，就开始分牲畜、土地了。呼伦贝尔盟经请示内蒙古党委后没有动。兴安盟和纳文慕仁盟牧区的民主改革大体上还比较稳，没有出什么

大问题。只是纳盟在城市群众工作中出现了一些“左”的偏差。锡盟、察盟和昭盟的牧区在民主改革过程中，有些地方由于离领导中心较远，掌握政策不严，出现了一些过“左”的偏向，把不该斗的也斗了。本来我们是主张牧区分畜不分群的，这时把不该分的也分了。所以造成了一些不好影响。我是管土地改革工作的，没有防“左”的准备和措施，是应该由我负责的。当时高岗去热河视察工作，在昭盟等地走了一遍，回到东北局又听到中长铁路的反映，特向内蒙古党委发来电报，说扎兰屯连牛乳都买不到了，牧区问题也很大，赶快派人去检查。内蒙古党委根据这个情况，立即宣布牧区一律不动。我们在哈尔滨开高干会的时候，还接到了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电报，反映了我们在锡盟、察盟民主改革中的“左”的现象，但他们发电时，锡察巴乌工委已经制止了这种事态的继续发展。乌兰夫向外蒙复电解释说，我们已经发现了这种现象，并在纠正。

在哈尔滨开高干会以前，与宣布牧区不动的同时，乌兰夫提出了在牧区“不斗、不分、不划阶级，牧工牧主两利”的政策。后来还补充了一句“扶助贫苦牧民”。因为当时所讲的“牧工”，是指为牧主家里的牧群放牧的人，这和“贫苦牧民”的概念还有所不同，后来在中央民委总结牧区工作经验的时候，采用了这句话。

### 哈尔滨高干会议

一九四八年三、四月间，为了总结前一阶段的工作，

乌兰夫召集我们几个主要负责人到扎兰屯，商量召开旗、团以上领导干部会议，总结内蒙古前一段工作和确定今后任务的问题。这个会议原来定在扎兰屯开，各盟、旗及师、团的主要负责人都已经到了扎兰屯。但是东北局接到我们的报告以后，认为这次会议很重要，为了就近领导，指示我们把会议改到哈尔滨开。全体代表到了哈尔滨，在哈尔滨最有名的马迭尔旅馆开了这次会议。会议的全部过程都是按照我们原来的计划进行的。

乌兰夫代表内蒙古党委在会上作了报告。会议期间，东北局的负责人林彪和高岗讲了话，罗荣桓也讲了话。会后高岗让我们写一个这次会议的综合报告，上报中央。后来高岗说要把我们的报告改成一段，作为东北局给中央的综合报告的一个部分。不久，高岗的讲话由中央批发下来了。因为公布了高岗的讲话，所以乌兰夫的报告没有发表，也没有作为正式文件下达。

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大家对党的方针、政策统一了认识，团结了同志，为以后内蒙古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起了重要作用。以后就称这次会议为“哈尔滨高干会”。

## 内蒙古自治区名称的由来 和内蒙古分局、东部区党委的成立

辽沈战役获胜，东北大军进关，东北局把原属辽北省的哲里木盟和原属热河省的昭乌达盟划归了内蒙古自治政府。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召开时，根据中央的决定，



内蒙古自治政府是作为一个地区单位参加的。内蒙古原来不叫“自治区”，就叫内蒙古自治政府。参加这次大会的有西北、华北、华东、东北、华中、华南六大解放区，一个解放区作为一个单位，加上内蒙古自治政府直接管辖的地区和待解放地区以及北京、天津两直辖市，按区域讲，一共是九个单位。政协的文件上正式称内蒙古自治政府直接管辖的地区为“内蒙古自治区”，所以以后也就沿用了这个名称，没有通过什么改称的决定。从此，内蒙古自治政府也就相应地改称为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

内蒙古自治政府方面参加这次政协会议的正式代表有乌兰夫、特木尔巴根、王再天、王逸伦和我，还有伊盟的王悦丰（因为当时党中央已经决定把伊盟也要划归内蒙古自治区，所以王悦丰是以内蒙古自治区的代表身份参加的）。朋斯克是候补代表。奎璧是作为国内少数民族代表参加政协会议的。我们参加了政协《共同纲领》等文件的讨论，参与了《共同纲领》中有关民族政策部分的制定。在中央制定的《共同纲领》中，提出了“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把“民族区域自治”定为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区域自治”这个概念，我们党常常引用。一九四五年十月，中央确定内蒙古工作的基本方针就是“区域自治”。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中央曾向我们征求对宪法中关于少数民族问题的意见。我们于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七日向中央写的报告中，根据中央确定的基本方针，提出过：“在目前，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各少数民族在自己的居住区域建立统一的自治政府，并制定地方宪法。某些与汉族夹杂的

小聚居区，可在地方政府下建立自治区”。但把“民族区域自治”作为基本政策，写进党所制定的纲领性文件中，据我所知，是从《共同纲领》开始的。开完这次大会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了，包括蒙古民族在内的中华民族获得了解放，中华各民族共同组成了统一的祖国大家庭。

当时中央已经确定了完成内蒙古地区和绥远地区合并的方针，只是还要有步骤地进行，等待时机的成熟。政协会议后，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我们对合并问题进行了讨论。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中央决定先把内蒙古党委改为内蒙古分局，并与自治区人民政府一同迁到张家口，为合并作准备。因为在张家口只是暂时的，所以被风趣地称作“借荆州”。内蒙古分局由乌兰夫任书记，委员为奎璧、我和王铎、王再天、王逸伦、高增培（改名高峰），候补委员为吉雅泰、克力更、特木尔巴根。同时，中央又决定成立内蒙古东部区党委，领导东部地区的工作（原兴安省加上原属辽北省的哲里木盟和原属热河省的昭乌达盟），受内蒙古分局、华北局的领导和东北局的指导，我是书记，王逸伦是副书记。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从乌兰浩特迁到张家口的时候，又决定成立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东部办事处，我兼任办事处主任，特木尔巴根是副主任。这个办事处管内蒙古自治政府原来管辖的东部几个盟的工作。

## 内蒙古自治区区域的划定

一九五〇年初，中央要研究内蒙古自治区区域划分问

题，乌兰夫和我来到了北京。周总理把我们找到他的住处办公室里（中南海的西华厅），一边征求我们的意见，一边用红铅笔在地图上划出了内蒙古自治区的区域四界。这次定的区划，后来逐步实现了。同时还决定内蒙古自治区的首府将来要迁到呼和浩特。

一九五〇年八月间，接到中央的电报，要调我到中央工作。内蒙古分局决定由王铎接替我的工作，担任东部区党委书记。至此，我就调离了内蒙古自治区。

# 我的回忆\*

李伯钊

## 一、学生时代与青年运动

一九一一年三月，我出生在四川省重庆市，小学毕业后，考进四川重庆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是重庆最大的学校。重庆还有省立男子中学、省立师范学校（男校），城外还有中法大学。当时对我影响最深的是肖楚女先生，他是我们的国语教员。他教我们在学校办起了校工读书团。我们是师范学校，有校工来读书，对我们也是个学习和实践的机会。校工都是近郊农民、城市平民。校工读书团教他们识字、唱歌，给他们作报告，使他们了解一些国家的事。我当时是学生，年岁比较小，也比较活泼，肖楚女先生很喜欢我，我也很听先生的话，觉得先生的话都很有道理。肖楚女先生办校工读书团，我当时只知道这样去做，但并不明确这里边的意思。校工

---

\* 本文是李伯钊同志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九日至十二月二十一日对文化部党史资料征集工作领导小组同志的口述，得涯、曹晔、石雅娟整理。

学习都很积极。先生、学生、校工相处都很好，学校也很活跃。

白天我们要学习，校工也要工作，晚上才能给他们上课，一天一次。校工中有些人，住得离学校不远，或就住在本校。他们天天把学校打扫得整齐、干净，校方也很高兴。现在想起来，肖先生这个主意很好，他教我们了解青年农民，跟群众结合，走群众路线。但当时并不了解这一点，只觉得我们应该学习当先生，学着如何教学生。我们心里都很高兴，都很喜欢肖楚女先生。

还有一位先生是张闻天，他是从美国留学回来的，教英文课。能有美国留学生教课，当然是非常好的事情。他思想进步，除教课外，还组织我们参加“平民学社”，学习《新社会观》、《共产主义ABC》。后一活动是自由参加。我就在那时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

后来来了廖苏华，她的原名叫廖竹君，是廖划平的妹妹。廖划平是很老的共产党员。廖竹君也教我们参加一些活动，特别是组织“校友会”，把校友团结起来。我们还演过戏。记得当时演的第一个戏叫《可怜闺里月》，这是一出揭露军阀混战的戏。大意是四川军阀混战中，一个团长被打死了，他的老婆在贵州，就叫“可怜闺里月”。我演一个男孩子，名叫国雄，是团长的孩子。演《可怜闺里月》这个戏，给我思想上的启发就是反对军阀混战。

那时学校里有很多的派，除共产党外，还有国家主义派，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对学生都有影响。廖竹君当时并不是简单地叫你参加什么派，她组织恳亲会，教我们演进

步戏。通过这些活动，教育我们青年不要读死书，要关心国家大事，特别要注意农村来的青年的教育工作。《可怜闺里月》这出戏当时在宣传反对军阀混战这方面影响很大，可惜现在记不清作者是谁。那时北洋军阀就在四川，四川的房子都有两个门，一个是前门，一个是后门，北洋军阀兵经常来搜找“花猫儿”（女孩子），我们很害怕，一听到北洋军阀兵叫门，我们就赶紧从后面跑掉。他们有时还在街上随便把女学生拉去，横行霸道，无恶不作，所以我们都懂得军阀不是好东西，有了他们，社会很不安定，这些，也加深了我们对军阀反动本质的认识。

一九二五年春夏之际，我由廖苏华介绍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当时参加这个组织的人很少，现在北京还有一个，叫卢云峰。我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后开过一次会，大概到五、六月间，社会主义青年团改名为共产主义青年团，我转为共产主义青年团员。这时期，我的思想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共产主义理想这个种子在我身上开始萌发。我不是一开始就知道共产党、共产主义，而是慢慢地经过教育才知道的。那时学校最大的政治派别是国家主义派。国家主义派的先生叫孟才承（是否有错还可以考查一下），肖楚女先生是反对国家主义派的。当时他一边教书，一边创办《新蜀报》，担任《新蜀报》主编。《新蜀报》就是反对国家主义派的，我和很多同学主要是受肖楚女先生的教育和影响，所以在学校就参加办校工读书团等活动。当时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是相当活跃的，办有各种各样的诗社，特别是共产党办的“平民学社”。这个组织在学生中除宣传新社会

观和共产主义ABC等一般马列主义基础知识外，还介绍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些情况，这对一个中学生来说，是大开了眼界，脑袋里也就逐渐有为校工服务的思想。这也说明青年人初期思想启蒙总是有社会原因的，是跟着那个时代的潮流走的。我就是在这种潮流中慢慢地孕育了共产主义理想的萌芽。

当时，国家主义派也很厉害。国家主义派势力比较大的地方一个是南京，一个就是四川。拿我们学校来说，我们的中文、英文教员，教的是社会主义。但教数理的教员几乎都是南京中央大学毕业的，是国家主义派。他们和孟才承等打成一伙，在学校进行活动。我们是站在反对国家主义派一边，说老实话，那时我思想并不是很成熟，但是我相信肖楚女先生，我那时已经是团员，也经常给他汇报情况，我们有时晚上到他家里去听他讲工人怎么受压迫，资本家怎么剥削工人。我们的这些社会主义思想，都是肖楚女先生教给的，是从受教育中得来的，所以学校教师的教育很重要，对学生的政治生活很有影响。我们反对国家主义派的反动教育家，那时只知道国家主义派很坏，有几个坏头头让家里有钱的女学生回家坐轿子。我们那能坐得起。还有，他们还反对剪头发，反对不缠脚等。可以说，当时的封建思想主要是来自国家主义派。所以当时学校最根本的对立，就是进步的思想和国家主义派思想的斗争。我们给他们取名叫“饭桶教育家”。

这些“饭桶教育家”在满清时期都是有功名的，在学校里势力很大，谁要是把他们惹恼了，他们就把谁开除。“五

卅”运动爆发后，我们参加了学生运动，学校便把我们开除了。于是我们团结了好多学校的学生，打着旗子，借“五卅”运动，介绍社会主义。那时的学生都有些觉悟，跟着出去讲演，宣传爱国。“五卅”运动以后，大多数学生开始感到共产主义并不坏，是好事情，相信“平民学社”不是坏组织。起初，学生中很多人不理我，后来慢慢合到一起了。“五卅”运动对学生的思想影响很大。当时，“五卅”运动的宣传好热闹。我们拿着旗子走上街头，说现在要亡国了，大家赶快行动起来。这次思潮是共产党领导的，具体地说，在我们那里是肖楚女先生，还有别的一些先生，因为没有直接接触，所以记不住了。

## 二、在上海的斗争岁月

学校把我们开除了，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张昔畴决定让我们去上海。去上海路费不够，组织上也没有钱，我们就找有钱的同学资助。当时去上海的人不多，有廖苏华、卢云峰，还有王云飞（王云非）等。到了上海，我是共青团员，当然要找共青团的负责人。那时共青团的区委书记是贺昌，工作人员有孟冰，还有关向应、赵世炎等。他们给我们讲课。他们听说我们是闹学潮出来的，年纪轻，不叫我和卢云峰去上海大学。工人区正需要办平民夜校，我们被派到浦东平民夜校去任教。

浦东的团地委书记是李强（他的真名叫曾培洪），我是团地委宣传委员兼平民夜校教员。那时教什么呀，没有课



本，要自己编课本，好在我们在师范学校学习过，还能编一些东西。光教识字不行，要进行政治思想教育，那时上海的反动派已经知道共产党在工人区域活动，我们不能公开讲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只能讲工人的生活。讲工人的生活要到工厂去讲，当时没有女学生进工厂，我们就穿短衣服、长裤子，化装成工人家属。他们不知道我是共产党、共青团的工作人员，上完夜班，她们就来学唱歌、跳舞、演戏。曹家渡、浦东、杨树浦等地，我们都去过。开始没有识字课本，只是唱歌、跳舞、演戏，唱她们受压迫的歌。记得当时有一首歌，歌词是：“小小无锡景呀，唱罢（给）诸公听，工人的苦处，说也说不尽呀！”工人能唱这种歌，那是很好的事，我们高兴极了，很快也把这首歌学会了，还和她们同唱，引起了她们很大兴趣。我们的材料就从那里弄来，把它改造一下，唱得更好一些，再教给她们唱。她们以后下了夜班，就到夜校来，我们教她们。但光教“小小无锡景”不行，后来又教《少年先锋队歌》、《国际歌》。《少年先锋队歌》好唱，就是起来吧，斗争吧，改善生活等内容。《国际歌》就难了，“英特耐雄纳尔”这怎么教呀，教这个歌我们可花了一番心血，要考虑什么时候教。我们总是选了警察不来巡逻的时候教。工人记不住词就写到手背上，背熟了就赶快擦掉，不能让工头看见，他们看见了就要追查。当时曹家渡、浦东、杨树浦等处的工人运动，就是我们这几个学生组织起来的。

在浦东，组织上对我们非常关心。我们穿什么衣服，穿什么鞋子等，组织上都教给我们。我们刚从四川学校出

来，浦东工厂里有流氓，所以赵世炎、关向应、孟冰等很多人对我们都很关心。关向应是东北人，孟冰是江西人，贺昌是山西人，罗亦农是党的区委书记，是湖南人。那时夜校办得很活跃，又唱歌，又跳舞，姑娘们都会。她们一天劳动十几个小时，上完夜班，又上学校。孟冰、赵世炎等都来看过，说夜校办得好。顾顺章是做工会工作的，当过码头工会主席，他也来，这个人后来叛变了，是叛徒。不久，我们的夜校被警察发现了，组织上帮助我们换一个地方，调到曹家渡。曹家渡没有地委组织，有一个党员，叫刘柏青。我们同住在一个理发店楼上。我住前楼，他住后楼。有一次，组织上通知我到法租界开会，我去了，不料上海警察局已知道我们开会，抓住我，问我在这干什么，我说我是为考学校的事来找我哥哥的。警察局的车子硬把我押走了，押到淞沪警察厅。他们开始问我叫什么名字，从哪里来的。三天后又正式审讯，他们说，你哥哥跑了，我说不知道，他们就打我的手板，打得好痛，我强力忍着。审完后就把我关在监狱里。监狱和外边不通消息，我正发愁怎么办，有一天，忽然通知我说有个“表兄”来看我，我知道我在上海没有表兄，叫我见就见一见吧。我见了，不认识这人，后来知道是组织上派来的人。他说我的口供很好。就这样，我当时觉得有救了。上海大学的学生，也关在此地。那时北伐开始，他们是由学联发动在街上散传单时被捕的，他们有学联保，出去了。我知道“表兄”也一定会想办法救我出狱的。两个多月后的一天，监狱通知我说，你找你的哥哥去吧，把我放出来了。那天，没有人来接我，

我到哪里去呢？当时我到哪里都会给人家惹麻烦，也不能在上海街上流浪，一个女孩子，那么年轻，在外边会受人欺侮的。这怎么办呢？后来还是回到了上海大学廖竹君住处，大概已是晚上十二点钟了。

### 三、出狱后赴莫斯科

到了廖竹君那里，她开始有点惊讶，于是详细询问了我出狱当天的情况，并向区委作了汇报。很快她就带我到贺昌那里去。贺昌很高兴，说：好，你出来了，你知不知道我们是花了很多钱，活动了警察厅，才把你救出来的。我说不管怎么样，出来了就可以工作了。他说你还不错，没被警察吓倒。区委考虑，你在浦东做共青团的工作已不合适了，现在上海情况比较紧张，组织上决定派你到莫斯科去学习。我一听，很高兴，忙问：我怎么去呀？是我一个人走吗？他说，这你就不要管了。接着问我：你家庭有没有什么顾虑？我说没有，我是最小的女儿，家里又不靠我。第三天，家里给我寄来了一百元钱，我就和廖竹君商量，一块上街买些衣服，作出国准备。

怎么走，跟谁走，当时全没有告诉我。一天晚上，有个车子来了，叫我赶快上车。汽车开到黄浦江边，一条舢板把我们带到了吴淞口，在那里，我们上了一条苏联船。我们住的是比较好的船舱，但我是头一次出国，有些害怕，他们说到海参崴有人接我。船颠簸得很厉害，我吐得一塌糊涂。有个男同志一路上都照顾我，我不好问他姓什么，

是干什么的，我要吐他拿来东西帮我接着。在船上天天吐，有时一、两天不能吃一点东西，后来不怎么吐了，可以吃点东西，但还是不能起来，只能躺着。到了海参崴，他们说“已经到了”，我以为到了莫斯科，原来是到了海参崴。到船舱外边呼吸新鲜空气，感到特别舒服。下船后来一家旅馆，那旅馆很好，帮助找大夫来给我看病。我在旅馆里看到很多同志，有男同志，也有女同志，这些人在船上我都没有见过。后来我们相互认识了，现在记得的大概有这么几个人：张仲实，上海大学的学生俞季女、胡建三，上海大学附中的樊警吾、陈西媛。还有一些已经记不清了。他们有的是上海大学的，有几个是上海大学附中的。在海参崴旅馆休息了一天，规定不准出去，不准和外人接近，上厕所也要告诉翻译。

从海参崴到莫斯科是坐火车。苏联内战以后，相当困难，火车没有煤炭，烧大块的木柴。我们都下去帮助把木柴搬上火车。苏联国内战争结束后，是比较荒凉的，可以说是百废待兴。我们在车上没有吃的东西，要到站以后才有卖的，但也只有玉米，连面包都没有。火车的速度很慢，走了好几天才见到一个站。到了站就赶快下去买东西，赶早才能买到面包。钱是组织上给的，每天给一些。当时最困难的是茶水。干面包很硬，要用开水泡，没有开水干吃很困难。茶水到预定的站才有，每人只能装一壶两壶，有一定的限制。在火车上，我们看见窗外正在行军的苏联红军没有靴子，用碎皮缠在脚上当鞋。这是内战的痕迹。尽管当时苏联这么困难，但我们学生还是很开心，到社会主

义祖国去，人人都很兴奋，一路上唱歌，互相介绍，互相认识，互相关心。最困难的是张仲实，他眼睛高度近视，上下火车都要人扶。就这样大概坐了一个月的火车才到达了莫斯科。

我们来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生会派人带着苹果、面包来迎接我们这些新同学。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生都要编号，我是394号。学校里有饭吃了，伙食也挺好，同学们很热情。可是语言不通，不懂话。所以首先要学会说俄语的编号，因为你吃饭、洗澡等一切，都要先报你是多少号。学校专门有人来教我们。房子住得也好，还发了大衣、外衣、毛衣、皮靴。那就是大学生的待遇了。因为看不懂俄文，生活中有困难，学校就先教我们生活语言。学生分一班、二班、三班。邓小平在一班，上海大学教经济学的沈志远的妹妹沈联春在二班，我在三班。学校没有考查文化程度、工作经历。先教讲话，补习俄文课。教员很严格，教过的课程都得记会，一天教很多生字。我们白天不敢出去，别的班里的同学也不认识。女同志就三个：一个是樊警吾，上海大学附中的；还有一个叫刘月华。那时我年轻记忆力好，学习比较顺利，教员也很会教，有图有字，象教小学生那样一天十个生字、二十个生字、三十个生字，不断增加。不久，一般生活用语都会了。我们班有的同学英语比较好，有的在上海学过俄语，经过一段学习可以看一点报纸。我们第三班很快就可以直接听讲。开始讲社会发展史，就是猴子怎么变人呀，什么叫原始社会呀，什么叫封建社会呀，什么叫资本主义社会呀，等等。还有

俄文，每天很多生字，整天练习。这些都是必修课。政治经济学、东方革命史、西方革命史、社会形势发展史，这些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课。没有这个学习，就无法开课。然后就教《资本论》上的章节，比较难学。东方史、西方史学完了，就讲列宁主义。当时学习最需要的是马列主义知识。教学方法也很好，不是一开始就教阶级斗争，而是讲社会是怎么来的，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按社会发展史来教育学生。这样讲是很必要的，有好处。学到二年级下学期，学生就要分别学习专业了，如愿意学习政治经济学的，可以学《资本论》，使学生从初期的社会发展史和马列主义基础理论的学习，转入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的学习。那时学得比较扎实，帮助我树立了革命人生观，懂得了为共产主义奋斗不是抽象的，而是要从事具体的革命工作。

我们在莫斯科时开始只有三个班，后来又去了大批人，有七、八个班了。我们学到二年级，就分研究组了，如列宁主义研究组、政治经济学研究组、十月革命研究组。每个研究组都有专人带，和以前上大课大不相同。教员要教题，你要做题，不认得的字有人教，你慢慢做题。这就是从根本上来教学生。基础课学完了，然后就同中国革命联系。斯大林来校讲过三次课，他是讲中国革命，我们都听过斯大林讲课。

在二年级时，学生中发生过一次争论。这是怎么引起的呢？当时调了一个姓王的中国人去管经济和行政，这人不正派，办事不公道。当时学生花钱都有规定，如每月

发多少，什么时候发，除了买牙膏牙刷生活日用品，其他钱都买书。可是这个人对学生不公平合理，引起学生闹起来了，闹些无原则的事情。以后来的学生，他们在中国做过一段工作，有参加过海陆丰等革命活动的。他们有的是广州来的，有的是上海来的，还有的是湖南来的。有一个老头班，徐老（徐特立）、董老（董必武）就是在这个班。他们是有经验的，不象我们这些学生。那时还有中国学生加入苏联党、团组织，就是转入联共党、联共团。当时东方大学有印尼、印度等国家的学生。我们学校是孙逸仙劳动大学和东方大学合并后改为中山大学的。当时就有少数人提“二十八个半”。现在怎么看？苏联错用了中国行政人员？行政上的事情都是发钱、买东西，这不牵涉到政治。当时的学生都是很老的党员，有的还是胡子大把的人了。这个情况的出现，是在一个叫达拉索夫卡的地方，开了十天大会，揭发学校的缺点和一些事，有人就在会上提出了所谓“二十八个半”的事，但谁也没有承认，也说不出是哪些人。

王明当时是中国党代表团的翻译，后来有什么联系，我们也不知道。这件事要仔细研究，当时联共党是怎么领导中国学生，中国学生加入联共党，联共党怎么研究讨论中国问题，中国人不知道，还是他们作主。还有中国代表，象瞿秋白，他们与联共党是什么关系，对学校问题插手不插手，我们当学生的都不了解。至于六次党代会怎么开，那更不能随便加以评论。当时这些事，我们只是听到，不大清楚。这问题在党内存在很久了，我只把当时的情况作

个介绍。当时是联共党支部，也是编在联共党内，别尔曼是苏联代表，至于王明怎么活动，不清楚。我只是学习，一心一意学习好，回国后好为党工作，那时我是一个团员，弄不清楚这样的问题，我加入了联共青年团，是总支宣传委员，以后毕业了，当了翻译。如果拿我现在的观点来看，那时学校内的斗争，情况很复杂，说有“二十八个半”，是不妥当的。这是几十年的事，半个世纪还要多，也应在思想上整理一下。我说的话都是对党说的，是负责的。我对这段历史的回忆和认识，虽然不是很准确，但也是经过多年的实践和考虑，不是乱说，是向党委说心里话。

#### 四、在闽西革命根据地

一九三〇年冬天，我从莫斯科回到祖国。记得到上海那天正是一九三一年的元旦。当时尚昆和张闻天也回来了，都是走北面交通线回来的。我到上海后是做工会工作，跟刘瑞荣在一起，在法兰区香烟厂从事工人运动，大概有二、三个月时间。那时上海情况很紧张，我们又在苏联学习过，容易引起敌人的注意，后来中央决定让我们到苏区去，苏区红军队伍也很需要干部。

我到苏区去由一位年轻的交通员带路，这位同志叫什么名字忘了，走的是香港这条路，经过大埔、青溪，那里有个交通站。邓小平等同志都是经过这个交通站去苏区的。那时大概正是二次围剿，路子断了，国民党又占领了汀州，不能去中央苏区，我就在闽西苏区留下了。闽西苏区的省



委书记是邓发，苏维埃政府主席是张鼎丞，肖劲光是闽西军区参谋长。我被分配到闽西军区政治部宣传科当科长兼彭（湃）、杨（殷）学校的政治教员。不久，福建的军阀头子张贞进攻闽西苏区。那天，敌人打到虎岗，我们还在屋子里，此时赶快往外跑，不一会儿大家都躲到田里去了。当时闽西苏区自己没有经费，要中央接济。所谓“经费”，就是金银首饰，许多是金子，需要时每人背它一包，四四方方一包，可真沉呀。行军时肩膀都背烂了。每人还要背一支步枪。当时只有三个女同志：我、危拱之、唐义贞。同女同志在一起的有一个叫方维夏的，他是湖南的老党员，也是老头班的学生，在彭、杨军事学校担任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我作为军区政治部宣传部宣传科长兼彭、杨学校的教员，教什么呢？教社会发展史。当时的连排干部，有一个人我还记得，姓董，后来在周恩来同志身边工作，当参谋。

张贞进攻虎岗，我们毫无准备。闽西苏区邓发刚刚走，派卢德光来当闽粤赣省委书记，卢德光是工人，他刚来，张贞就进攻虎岗。我们撤退到汀州，一路上非常苦，是方维夏带着我们三个女同志。方维夏身上背的重，走不动，要我们保护他。我们三个女同志在苏联都学过军事，保护他老人家还可以。一到汀州，碰到傅连璋，他是汀州福音医院院长，是很有名的医生。南昌起义后，他积极为起义部队服务，他的医院把我们的伤病员全包下来了，我们到这里没有问题。后来，周恩来也是从这条路退下来的。傅连璋是革命战争的有功之臣。我们在汀州住了不久，由于汀州翻过山去就

是瑞金，因此中央就通知我们，让我们到中央苏区去。

## 五、苏区的文化宣传工作

到中央苏区的时间是一九三一年的秋天。当时是王稼祥在那里负责分配我们的工作。王稼祥是莫斯科留学生，是中央局的。他分配我们到红军大学教书。红军大学是周以栗和叶剑英负责，又名瑞金红军学校。

这年秋天，召开了中华苏维埃工农兵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一苏”），选举了毛泽东为主席，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由于要出刊物、报纸，我被调到《红色中华》当编辑兼校对。报纸是新办的，毛主席亲自过问，他每天都到编辑部来看消息，校对工作要求很严格。我每天要校对四版《红色中华》，差不多有一万二千字，还要编辑苏区的消息。点的是桐油灯，灯光很暗。这是我工作中最艰苦的一段了。那时苏区工作都是很艰苦的。

不久，孙连仲二十六路军在宁都暴动，一万七千多人投入红军。他们是北方人，吃不惯江西的红米饭，吃了就拉稀，人熬得很苦，仗也不能打。毛主席要我们组织演剧队、宣传队，去做他们的思想工作。那时有几个什么人呢？一个钱壮飞、一个胡底。这两人原来都是做敌军工作的，钱壮飞曾当过陈果夫的机要科长，胡底是编辑。钱壮飞长得很象蒋介石，他当机要科长时出入南京政府，卫兵向他敬礼，以为他就是蒋介石呢。我们三个是骨干，还有军队的一些宣传队，共有十七人。暴动军队驻扎在瑞金任田区。

我们离开《红色中华》后，就到那里去了。当时十五军政委是左权同志。二十六路军改编为红军五军团，五军团是董振堂当副总指挥，刘伯坚当军团政治部主任。刘伯坚是一个很老的同志，在莫斯科学军事的，在西北军工作很久。

在进驻五军团以前，我们三个骨干曾去请示毛主席怎么做工作。那天，我们去得很早，毛主席还在写东西，他见我们来了，把笔放下，指着长板凳，让我们三人坐下。毛主席说，第一要稳定他们的政治情绪，他们过去是为军阀打仗，现在是要为苏维埃而奋斗。过去当白军，现在是当红军。要想尽各种办法去向他们宣传过去是为谁牺牲，为谁送命。按照毛主席的意见，我们编了一个戏，叫做《为谁牺牲》，主演是我。钱壮飞演蒋介石，胡底演当兵的。这个戏是反映当白军的受苦。那次演出有个很奇怪的现象：平时演戏，一拉开幕，就有人鼓掌，喊口号。这次演出过程中没有一点声响。当时我们想，是不是这个戏没演好？不料，过了五分钟，突然鼓掌响了，戏台下还有人哭，有人喊口号：“打倒蒋介石”、“要当红军”……。这是最成功的一个戏。后来我们还到左权的十五军，还到十四、十三军演这个戏，差不多演了一个月。北方人到南方吃大米不习惯，拉肚子，想家，由白军当红军，不是人人都有思想准备。二十六路军全部改编为红军五军团，所以要做好政治工作。剧团同志替他们补衣服，关心他们的伤员，使他们很受感动。尽管这样，他们拉肚子还是不敢吃药，苏区的药本来就很少，他们把药拿去悄悄地扔掉，生怕是害他们的毒药。那时工作很艰巨，毛主席写信给我们，让我们

在那里多呆一些时候，给他们演戏，多做教育工作。

对他们的军官怎么办？师长、团长都是受过军训的人，中央政府后来把这部分人调到瑞金叶坪，给他们演高水平的戏。我们演出了根据苏联话剧《黑人吁天录》改编的《黑奴恨》，这个戏演出的效果也很好，很多军官都感动得流泪。这个戏写的是奴隶主怎么压迫黑奴的事，表面上不关中国的事，不关蒋介石的事，也不关五军团的事，演这个戏，也是胡底、钱壮飞和我，还有何叔衡演农奴主。我们把他们都集中到一起，专门给他们演，他们很受感动。过去，他们受的是反动教育，而我们是要把他们当成干部培养，给他们讲红军有什么规矩等等。对干部和战士分别做工作，给干部演一种戏，给战士演一种戏，这样做很成功。

我们在这里工作几个月后，又回到原单位。胡底和钱壮飞都是在白区做保卫工作的。后来顾顺章叛变，要抓周恩来等同志。那时他是个小流氓，后来当了大流氓，投靠蒋介石，叛变了革命。他的叛变，把整个白区党的工作都牵动了。周恩来、聂荣臻等都到苏区来了。

## 六、高尔基戏剧学校的回顾

中央宣传部和中央政府为了搞好宣传工作，决定办一个戏剧学校。这样，就把我们从《红色中华》调出来，筹建戏剧学校。开始没有想到要搞高等学校，所以取名叫“蓝衫团”。后来中央苏区教育部长瞿秋白从上海到苏区，他不同意，他说要办高尔基戏剧学校，是一件大事。大家也觉

得，十月革命后成立的群众组织，特别是工人自己的组织，还是叫高尔基戏剧学校好。这样“蓝衫团”就改名为高尔基戏剧学校了。“蓝衫团”的时间很短，只有几个月，也未挂牌子。高尔基戏剧学校开始是由上海去的倪志侠负责，他在上海是搞舞台美术的，后来犯了错误，就让我去。秋白同志对创办高尔基戏剧学校起了很大作用，把钱壮飞、胡底等调来学校工作，我们还把俘虏来的国民党军官中会画、会写、会拉提琴的人也都凑起来当专业教员。在高尔基戏剧学校主要是教政治课，教中国革命史，讲苏维埃运动和反帝大同盟统一战线组织等。石联星就是通过反帝大同盟进入苏区的，她是反帝大同盟的会员。还有一部分人来自台湾，他们在那里呆不下去了，比如施月侠、施月仙、施英三姊妹。她们是跟着白区共产党员蔡乾来的，蔡乾也是台湾人。还有音乐家崔音波，我也写过回忆他的文章。那时高尔基戏剧学校的成立是不简单的，它集合了各路人才。有白区的文化人，有莫斯科回来的人，也有从白军中投诚过来的美术工作者、军官，还有白区送来的一些群众。

学校上的专业课有音乐、舞蹈、形体训练，多少讲点艺术理论。瞿秋白还亲自来讲过课，影响很大。高尔基戏剧学校办的时间并不长，大约有两年左右。学校里有地方班。当时地方成立了工农剧社，是群众团体，地方班是培养学员的。张欣是工农剧社的社长，沙可夫和我等都是社员。高尔基戏剧学校是中宣部办的，是党办的，是教育部办的。

高尔基戏剧学校主要是瞿秋白领导，在他之前是潘汉

年领导。文化大革命时说潘汉年是奸细，瞿秋白是叛徒，于是有关苏区文化方面的事都找我询问。其实，真正领导苏区文艺工作的是潘汉年和瞿秋白。现在，他们的问题都澄清了。他们是好人，不是坏人。这事很早就想写文章说明，应当给潘汉年、瞿秋白平反，他们是好同志。实际上是这样的嘛，是他们二位在领导嘛。一直到我们长征出发时，他们二位还留在那里。瞿秋白是在苏区被抓的。以前凡是对瞿秋白的纪念，都来找我写文章，我不好说，实事求是嘛。现在中央都讲了，我当然可以宣传他们了。实际上苏区文化工作应该归功于潘汉年、瞿秋白，我不过是他们下面的一个干部，当然也是一个负责人，是中央政府教育部艺术局的负责人，是高尔基戏剧学校负责人。这个苦头吃得多了，一直到最近几年才弄清楚，因为他们的问題不弄明白，我也不能随便说。特别是作为党内的一件事情，我现在同文化部党史征集领导小组的同志讲是应该的。这事沉闷多少年了，老是背在身上，我觉得非常不安。

高尔基戏剧学校除了地方班外，还有红军班。地方班是为工农剧社培养干部的，为江西、福建以及整个苏区培养了大批干部。那时苏区的文艺干部都是高尔基戏剧学校派去的。哪里发展红军，哪里需要宣传干部就往哪里派人，起了很大作用。红军班是为火线剧社、红军剧社培养干部的。他们学的课程基本一样，不同的是军队班有京剧。当然不是现在的京剧，如彭德怀的三军团，记得有两个剧，其中一个叫《东洋照像》。这个戏很风趣，把中国人抓来照像，看谁象共产党，就把谁抓走。他们叫火线剧社，不仅

是在操场上演，还在火线上演。怎么在火线上演呢？那时有碉堡，敌人在碉堡上可以看到我们这边演戏，我们就埋伏上军队，可以喊话：“你过来当红军呀！”，等等。这是我们工作的好机会。

总之，高尔基戏剧学校，一个红军班，一个地方班，都发挥了作用。这次有机会把这个问题讲清楚了。有的同志问我，当时艺术委员会是否发挥了作用？我说，没有这个组织，这要纠正。工农剧社是红军学校成立的业余群众组织，艺术工作的真正领导是党，是潘汉年和瞿秋白。瞿秋白当时是中央苏维埃教育部部长，毛泽东是主席，真正领导是中央教育部，下设艺术局。在我以前是沙可夫任局长，后他因病调走，就由我负责，我任职的时间比他要长。

再说说钱壮飞、胡底两人。他俩是应该宣传的。钱壮飞还创作过不少作品，如《最后的晚餐》，是他根据法国的一张名画编写的。这张名画产生前，画家要找模特儿，找一个最美的人和一个最丑的人，这幅画才能完成。可是画家就是找不到这个最美的和最丑的人。后来，他到农村去，听见山上有个樵夫在唱山歌。他就跟着歌声走去，一看是个樵夫，长得漂亮，身体非常结实，脸色红润，眼睛大大的，画家很满意地说，请你当模特儿吧，要钱给钱，要吃饭请吃饭。最后他画了那人，大家看了说选得不错。最美的人画完了，还要选一个最丑恶的人。这个画家又到处寻找最丑的人，怎么也找不到。有一天，他跟人家去参观监狱，看见一个强盗，唉呀，丑恶极了！不堪入目吧。他说：好极了，就画他吧。他把这个犯人找来，不用换衣服照他

画了。这张画就完成了。一些画家认为《最后的晚餐》里有美、有丑，能不能找到原因呢？怎么美的，怎么丑的？问当模特儿的强盗，他说，我就是你从前也画过的山上砍柴的樵夫，可是那个年代兵荒马乱，后来又当强盗又抢人，就变成丑恶的人，所以把我关在监狱里。这个戏演出后，五军团的军官看了很受感动，这么好的一个人，被旧制度摧残、迫害，变成了一个最丑恶的人。这个戏教育意义很大。

钱壮飞写了《最后的晚餐》，又演了这个戏。胡底、钱壮飞和我还写了《为谁牺牲》，是反映一个白军士兵怎么受害，后来终于投奔红军。还有两个俘虏军官在高尔基戏剧学校也是有功之人。一个叫郑泰周，是个画家，是从广东俘虏来的军官，过去学过美术。另一个叫王新，是国民党杂牌队伍的。这两人在高尔基戏剧学校当教员的时间最长。还有崔音波，也是教员。彭舜华是管财务的，这个人也是反帝大同盟送来的。学的课程有社会科学，还有音乐课，舞蹈课，戏剧课，排练课。另外还有艺术体操，实际上就是戏剧的基础动作，手怎么动，脚怎么动，腰怎么动等。他们同原单位保持联系，学完还回原单位去。这是头一班。第二班开始分红军班和地方班，一直办到我们离开苏区开始长征。我走时，把高尔基戏剧学校的工作交给了瞿秋白。当时还埋藏了一些剧本，后来去找过，但没有找到。这是非常遗憾的事。

（本文原载《新文化史料》一九八五年第一期）



## 李昌同志关于“中华民族 解放先锋队”问题给中央党史 资料征集委员会的一封信

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中共党史资料》一九八二年第一辑刊登的高文华同志《一九三五年前后北方局的情况》一文，其中有关“一二·九”运动一段，部分内容与当时的事实有出入，主要是以下几方面：

一、关于“一二·九”、“一二·一六”抗日游行和民先队的成立的时间问题。高文华同志文中说：“一九三五年底、一九三六年初，冀东二十二个县伪化，形势十分紧张。北平、天津的学生纷纷起来反对，还组织了‘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学生运动一直发展到后来的‘一二·九’运动。”事实是：一九三五年底北平学生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举行了“一二·九”和“一二·一六”两次抗日游行。接着在一九三六年一月初，北平学生组成南下宣传团（共分三个团），分头深入华北农村，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斗争。宣传团中途被国民党军警包围，强迫返回北平。为了继续发动群众进行抗日斗争，二月一日，一、二、三

团在北师大召开团员代表大会，决定成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因此，民先队的成立，是在“一二·九”、“一二·一六”和南下宣传团被迫回平之后。至于“一二·九”运动，有两个含义：一是指一九三五年北平学生“一二·九”、“一二·一六”游行及南下宣传和当时全国学生的响应活动，一是指从“一二·九”游行到“七七”抗战爆发期间的青年学生的救亡活动；甚至抗战初期平津失守后大批学生转入敌后武装斗争和散布到全国推动各地的救亡运动（似可以南京和临汾失守时为止），都可以说是“一二·九”运动的延续。所以，从前一个含义说，民先队是“一二·九”运动后诞生的，从后一个含义上说，民先队是在“一二·九”运动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高文华同志称：“学生运动一直发展到后来的‘一二·九’运动”是不确切的。

二、关于我任民先队队长问题。高文华同志文中说：平津学生“组织了‘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队长是李昌”。这与事实也有出入。民先队刚成立时，总队长是师范大学学生敖白枫同志。我当时是清华大学民先队的队员，在一九三六年三月我被选为清华大学民先队大队长。同年八月敖白枫同志调动了工作，我才被选为民先队总队长。

三、关于党对“一二·九”运动的领导问题。高文华同志文中说：“北方局支持并领导了这一爱国运动，在党内是赵升阳等同志，还有柯庆施、陈伯达领导的，而直接出面领导运动的是李昌、蒋南翔（清华大学支部书记）、林枫、姚依林、徐冰、许德珩等同志。”这里说的爱国运动（“一二·

九”运动)是指“一二·九”、“一二·一六”游行示威和南下宣传团等抗日活动。我应说明,当时我仅是一个积极分子,党员也不是,在南下宣传团也仅是第三团的先遣大队长。一九三三年我在上海同济大学高中部参加过共青团,一九三四年初团支部被破坏,支书被捕,我和饶斌等同志分散转移,从此我失去团的关系。所以,我并没有参与“直接出面领导运动”。

为了如实说明我所知道的“一二·九”运动的一些情况,提供青年同志、党务工作部门和党史研究同志作参考,我曾于一九六一年写了《回忆民先队》一文(后收入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出版的《一二·九回忆录》一书中),文化大革命以来,不断有同志找我,要求介绍我所知道的“一二·九”运动的情况。我觉得这篇回忆录,现在也还可供参考,特建议《中共党史资料》予以刊载。是否可行,请酌定。

李 昌

一九八五年三月三十日

---

**编者注:** 由于篇幅的关系,李昌同志《回忆民先队》一文这里不转载了。需要了解这方面材料的同志,请查阅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一二·九回忆录》。

## 彭涛同志谈“一二·九”运动<sup>\*</sup>

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一九三四年时北平我地下党的组织已几乎全遭受破坏。当时北平尚有几个党员，但是没有党的组织。一九三五年初，党组织才开始恢复起来。这时和河北省委取得了联系。当时发展党的组织非常慎重。党员全市共有十来个，连共青团员不过二十个左右。党的外围组织，有“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这是以马相伯、宋庆龄的名义发起的，也是秘密组织，但分布比较普遍，在北平有七、八十多个会员。其他进步组织很多，如读书会、学生自治会等。历史上不大被注意的学校，进步组织就比较多。过去比较进步的学校，这时被控制得很紧。

当时党的组织不大，但与群众有联系，与“左”倾错误时期不同。一九三一年和一九三二年时，北平党的组织相当大，但是没有合法的群众组织作外围，党员经常到街上游行、演说，一行动就暴露。北平地下党与河北省委联系上后，北平就成立临时市委，成员有王学明（曾任过财政部副部长）、我、冷楚（曾任过中央政法干校副校长）等，还有谷景生（曾在中央军委工作过），他是共青团的负责

---

<sup>\*</sup> 这是彭涛同志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的谈话。

人，市委书记是王学明。在“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北平分会活动的是周小舟。他和姚依林、郭明秋、董毓华、邵清华、孙敬文、刘杰等都是当时很活跃的同志。党的活动是单线进行的，我们和上面也没有多大联系。党的工作当时主要抓组织学生，先是搞“黄河水灾赈济会”，利用合法斗争，进行募捐救灾，把水灾赈济和国民党的制度联系起来。这个活动很成功，大部分学校都建立了赈济组织，出面的是原来不大露头的学校，如女附中、汇文中学等。邓力群就是汇文中学的。当时如果不用这种组织形式，而用“左”的面目出现，群众就更不好组织。国民党不让爱国，抗日有罪，因之，采取这种组织形式是正确的。接着又发起搞平津十校宣言，用学生名义发表。对这个宣言，在学生中有两种看法，有的认为强调联合抗日过右，但我们认为这个宣言写得很好，是正确的。以后华北形势变化很大，日本人在冀东搞防共自治政府，又在北平搞“冀察政务委员会”。接着很多学校提出南迁，各方面矛盾突出，学生中思想斗争剧烈。我们感到革命时机已经成熟，可以搞运动了。但当时对同学们觉悟估计不足，认为发动不会这样快，因为学运在这之前受到破坏，学生一度沉闷，表面上看起来都是读死书，其实他们心里对局势都很愤慨，由于各种组织教育工作，加上形势一紧张，一号召大家就起来了。

“一二·九”前两天，河北省委派人（按：李常青）来北平，同意在北平搞运动，并指示要抓紧时机，发动学生，把学生团结起来。“一二·九”运动用合法斗争，开始有些

人不同意，当时意见不一致。我们还是决定开始用请愿的形式，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一二·九”前夕在燕大开会，这一天到会人数很多，学联主席是郭明秋。各校代表有的同意抗日的口号，不同意停止内战的口号。我们的主张是搞统一战线，把各种力量组织起来，不管那个力量，是不是国民党的，只要反对日本、反对华北自治，都可以参加。会上还布置了游行口号、策略、路线，并提出六条纲领（内容是全面动员、一致抗日、全面武装、没收官僚财产等，其他记不清了）。当时在燕大开会公开的，同学们都知道。这时参加领导学运的经常是黄敬、我、姚依林、郭明秋等几个人。“一二·九”前几天，我们四个人是在辟才胡同我的家里开的会，决定发起请愿斗争，城里由东北大学带头，城外由清华带头。那时常在这儿开会，经常开到天亮，成天都研究运动，“一二·九”的一切行动部署都是从这里发出的。当时北平地下党力量虽不大，但起了很大的作用。“一二·九”中还有教授方面的力量，他们分散在各校，也起了很大作用（如在东大、中大）。决定“一二·九”在新华门请愿，没有成功就改示威。队伍每到一处总有人参加，路线是护国寺、沙滩（这时北大才参加，因为北大复杂，发动较难），队伍到王府井被冲散，这是城内情况。城外的没能进城。

运动中，党的其他领导干部都没有公开出面，公开出面的只有董毓华。

从“一二·九”运动看到我们对学生估计不足，原估计可能有一千多人跟我们走，但事实是很多中间学生也参加

进来了，甚至落后的也参加。“一二·九”后，很多学生都自动集会，要求更大规模的第二次行动。“一二·一六”便是“一二·九”的继续，是群众的要求。“一二·一六”比“一二·九”组织得更好。党研究了运动的具体计划，发动群众的方法是“冲校”，即用先进的学校带动落后的学校，制定了完整的口号，还划分地区，确定那一校为中心，把队伍分成几路，这样可分散敌人的兵力。同时确定了第一集合点和第二集合点，这样可以保持打不散。运动中还利用教授和外国记者的汽车来隔住警察。在“一二·九”后的一周间，党主要抓了大示威的准备。那时工作效率很高，文字的东西也不少，姚依林还写了对外国的宣言，证明了越有运动党越能发展，群众越发动，党也就掩护得更好，后来党一直没有遭到大的破坏。

“一二·一六”参加的人很广泛，各学校差不多都参加了，没有参加的是被警察包围没有冲出来的学校。落后的辅仁和志成中学也都发动起来。燕京、清华从西便门进的城。手挽着手前进就是这时发明的，统一战线是这次的最大特点。

这天游行，我没有去参加。规定很严，党的领导干部不能参加公开活动。开会地点选择在天桥，这是劳动人民聚会的地方。队伍后来被阻于宣武门外，陆瑾等是钻进城门的，城门开后军警大肆镇压，受伤者很多。

“一二·一六”后，运动怎样发展呢？示威已经是学运中最高形式，再提高就要搞武装暴动，但这是不行的，于是便提出到工农群众中去和工农结合。所以要这样做是

为扩大运动影响，向全国发展，把运动中的骨干力量保存、巩固下来，进一步提高他们的觉悟和发展党的组织。接着就是南下宣传。南下，除上述的目的外，还想扩大影响和冀南的高蠡爆动结合（后没有联系上，这个意见也没有向同学公开）搞游击队。南下共有五百人左右，都是好样的，分成三个团。天津的没有联系上。后来成立了“民先队”，决定所有宣传团成员都是队员。

在南下的路上，一路发展党的组织，发展很快，经过“一二·九”和“一二·一六”，积极分子殊多，一说就成，党的队伍壮大很快。后来党员发展到几百人。

长期罢课是不对的，反动派正想分散力量，这就上了他们的当。学生不上课，国民党又搞提前放假，天又冷，一些学生就卷起行李回家了。

可能“三·三一”前后少奇同志来到天津，“三·三一”后作了很多重要指示，主要是《肃清立三路线残余——关门主义冒险主义》等几篇文章，反对“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文件发表在四、五月的刊物上。很多老同志这时接上关系。彭真就是这时从狱中出来的，林枫同志也在北平。

北平党组织虽小，但是在中央指示下工作的。当然具体工作的指示是没有的。当时处于秘密状态，不好联系。但那时我们也从实际斗争中体会到一九三五年以前拒绝合法斗争，党员不深入群众是不对的，虽然还不知道以前的做法就叫“左”倾盲动主义，但要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却已有了。现在看，从“一二·九”到“一二·一六”到南下，精神是正确的。“七七”事变时，党有统一指示，学生



到乡村中去参加游击队，到冀中、晋察冀的是多数，到太行山的不多，流亡学生大多到延安。当时有组织的撤退，公开用“民先”的名义大批地走，有一部分分配在北平附近的根据地，少数人留在城市工作。这时的中心任务是建立根据地，进行抗日战争。

刚去，学生主要是爱国主义思想，谈民主自由，唱歌演戏，学生作风很浓，不太联系群众，但是一般表现都很好，受到八路军和工农大众影响后，能吃苦、有热情。一九三七年主要是组织群众，把群众中的先进分子组织起来，工作还是很深入的。以后从革命斗争中得到更深刻的锻炼。当时农村没有党的基础，党员学生一到农村就当负责干部，搞发动农民和建党工作。

对“一二·九”运动，估价不能太高，和“五四”运动到底不同。“五四”是历史的转折点，“一二·九”是起了配合红军的作用。

(本文由清华大学校史组供稿)

# 回忆东北解放战争期间 东北局驻北朝鲜办事处\*

东北解放战争时期，东北局派驻北朝鲜办事处，在朱理治领导下，根据东北局的指示曾经执行过一项特殊的使命——争取以北朝鲜为我们隐蔽的后方，支援南满作战。这一任务在东北局的领导和办事处全体同志的努力下，尤其是在金日成同志和朝鲜劳动党的有力支持和紧密合作下，胜利地完成了，为东北解放战争的胜利发挥了应起的作用。

## 一、办事处的任务和组建情况

一九四五年底，国民党军队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从海陆空三路向我东北解放区大举进犯，很快占领了山海关到锦州一线，并继续集结部队，沿中长铁路发动更大规模的进攻，切断了我沟通南北的铁路干线，又先后占领了沈阳至长春的大城市和交通干线的附近地区。东北的战斗

---

\* 此文是根据部分档案资料撰写，又邀集当时在我驻朝办事处工作过的丁雪松、李思敬、周力、宫和轩、倪振、齐光、金斗荣同志回忆，补充写成。

非常艰苦、激烈，我们的处境十分困难。

东北东邻朝鲜。从丹东到图们，对岸是朝鲜的新义州到南阳，一水相隔，两国边界长达八百公里，水路交通紧密相连。在东北交通要道被阻隔的情势下，北朝鲜便是沟通南满与北满、关内与关外的主要走廊。利用友好邻邦这个地理条件，对于取得东北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无疑是非常必要的。北朝鲜是从日本军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下刚刚获得解放的新兴国家，处于开创时期。朝鲜又被分割成南北两半部。我东北解放战争取得胜利，将使北朝鲜摆脱西部边境的威胁，取得一个和平安定的边界，对于朝鲜恢复后发展经济，建设新的国家和实现祖国统一都是有利的，这也是朝鲜党和人民的真诚愿望。

根据这些主客观条件和形势发展的需要，一九四六年六月，东北局正确地确定了争取以北朝鲜作为支援南满作战的后方的方针，并指派朱理治和肖劲光于当年七月赶赴朝鲜，在朝鲜平壤组建东北局驻朝鲜办事处。后来肖劲光于当年九月回国，朱理治留平壤，担任东北局派驻朝鲜的全权代表。

办事处的主要任务是：第一、做好伤病员的撤退、安置和战略物资的转移工作；第二、借道朝鲜作走廊沟通南北满，以及大连和其它根据地的物资交流，输送人员过境；第三，向朝鲜求援和采购作战物资；第四，发展中朝两党两国人民的友好合作关系，促进经济贸易往来；第五，协同朝鲜做华侨工作。

当时考虑到有苏美共同委员会的存在，并有雅尔塔协

定的约束，办事处活动须采取隐蔽与公开相结合的形式，决定对内称为“东北局驻朝鲜办事处”，对外公开称“平壤利民公司”。地址在平壤大同江西岸钗贯里一〇四番地。办事处下设秘书、商务、运输、会计和总务等职能机构，负责办理日常工作，并设有电台，保持与国内经常联系。从一九四六年七月办事处正式建立到一九四九年二月结束，先后在办事处担任过主要领导工作的有：文士楨、李思敬、周力、李泮明、李景天、倪蔚庭等。齐光、倪振、黄友年、杨振荣、李文和、黄林、白玉洪等分管秘书、商务、运输、机要、会计和总务工作。当时担任朝文和俄文翻译的有姜龙球、徐在铉、丁盛烈和刘毓泉等。为适应当时工作发展的需要，我们在朝鲜境内的主要交通要道和重要港口城镇南浦、新义州、满浦和罗津设置了四个分办事处，对外称“平壤利民公司××分公司”。分办事处的负责人是：南浦办事处周力、宫和轩，新义州办事处李长庚、王先成，满浦办事处王作藩，罗津办事处朱鸿升、吕亮屏。各办事处的负责人和工作人员，都是从国内各根据地抽调的。平壤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不到一百人，分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根据工作量的大小配备，其中罗津办事处有干部百余人，装卸工人五百多，是分办事处中人员最多的一个。平壤办事处及其分支机构的任务和职能基本相同，但由于分办事处所处地理位置不同，工作又各有侧重。例如，关内（包括大连转运的）的过境人员和物资，主要集中在南浦；伤病员及战略物资的转移以及沟通南北满的运输任务，主要集中在新义州和满浦；粮食、食盐、布匹和煤炭的运输

任务，以及部分过境人员主要集中在罗津。主要的涉外事务和商务谈判，基本上都集中在平壤办事处。

办事处的建立，是东北解放战争中的一个重大战略决策。它对于我坚持南满对敌斗争，坚决有效地粉碎国民党对我东北解放区的进攻，从而取得解放全东北的伟大胜利，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对华东、华北的解放战争，乃至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东北局驻朝鲜办事处，从一九四六年七月正式建立到一九四九年二月结束，历时共两年七个月。一九四八年十月，朱理治奉命带领办事处部分同志回国。回国后，由于东北解放战争的发展，在哈尔滨组建东北野战军后勤部，由李富春兼任后勤部长，朱理治任副部长，负责主持日常工作。

东北局驻朝鲜办事处撤销后，留驻朝鲜的同志，又奉命于一九四九年三月在原办事处的基础上，组建了东北行政委员会驻朝鲜商业代表团。代表团由文士桢、倪蔚庭、丁雪松、齐光四同志组成，后期宫和轩也参与了商业代表团的领导工作。代表团的主要任务是负责经济贸易谈判、签署和执行经济贸易协定，以及办理其它外交事务。商业代表团的工作一直坚持到一九五〇年八月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使馆成立，历时一年零五个月。商业代表团撤销后，大多数同志调回国内，少数同志（包括翻译）留在大使馆工作。

## 二、办事处的主要活动

办事处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对外活动频繁，归纳起来，主要有五个方面的工作：

### （一）完成了伤病员的安置和战略物资的转移工作。

一九四六年六月，东北局根据当时形势的发展，预计到安东、通化难于保持，提出了依靠北朝鲜作隐蔽后方支援南满作战的方针。总的来说，东北局的这一战略意图是实现了。在国民党军队进攻南满，我安东、通化撤退时，先后曾有一万八千余伤病员、家属和后勤人员撤到了朝鲜境内；有百分之八十五的战略物资转移到了鸭绿江以东。这些伤病员和后勤人员撤到朝鲜后，中间虽经多次精简，直到安东、通化收复前仍有五千多人，到一九四七年六月还有二千多人留在朝鲜境内。按北朝鲜当时的条件和处境，这么多的伤病员长期分住在老百姓家里，是很不容易的。朝鲜领导人和政府为我们做了大量工作，克服了种种困难。当时北朝鲜在政治上有国际舆论的压力，在经济上吃的，穿的，用的，都很匮乏。中间虽曾一度提出要我方将轻伤病员送回国内，重伤病员留住朝鲜医院，但当了解到我方确有实际困难时，便勉为其难毅然决定将伤病员全部安置在朝鲜。安东、通化撤退后，我方转移到朝鲜境内的战略物资多达二万余吨。为避免暴露目标，朝方政府动员了沿江的大批劳动党员出来肩挑人扛，从江边转移到隐蔽地点存放。安东、通化收复后，这些物资又几乎完整无缺的运

回了南满。

## （二）完成了物资转运和过境人员的输送任务。

一九四六年，在国民党占领了中长铁路沈阳至长春的大城市和主要交通干线以后，东北局鉴于东北的粮食和煤炭，大连的食盐、布匹和其他工业品，包括医药、医疗器械和工业原材料等，如果不能打开通路，互相交流，东北解放区的整个经济将陷入困境，对战争中的后勤补给也将带来严重困难。故及时提出了借道北朝鲜，开辟水陆运输通道，解决物资转运和物资交流的设想。东北局这个设想也基本上实现了。通过北朝鲜输送过境的物资，现在找不到全面的统计数字，但有据可查的，一九四七年的头七个月就转运了二十一万吨，一九四八年全年转运物资达三十万零九百吨。过境人员，据不完全统计，仅一九四六年下半年就有十八批计三千人，国民党军一八四师海城起义后的官兵，也是路过朝鲜去北满整编的；一九四七年春由安东去辑安二千人，由大连去临江三千人，由大连去北满干部二千余人，到一九四七年六月，总计经朝鲜过境者不少于一万人，辽东地区随来随往尚不计在内。一九四八年通过图们——南阳口岸过境人员达八千六百八十五人，加上其它口岸也不下万人。当时有不少民主党派、无党派和海外华侨的代表人物，为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都是取道香港经朝鲜转哈尔滨的。其中知名人士有：李济深、沈钧儒、张澜、马叙伦、蔡廷锴、谭平山、郭沫若等几十人。至于因事途经朝鲜的我党领导干部，如陈云、李富春、朱瑞、刘亚楼、肖华、张爱萍、韩先楚、周保中、李延禄、冯仲

云、于若木、蔡畅、李立三、伍修权、滕代远、韩光、欧阳钦、何长工、杜平、李一氓、吕东等同志，那就更多了。

为了顺利完成物资转运和接送人员过境任务，我们在朝鲜开辟的水陆交通线路主要有四条：一条是从安东经新义州、南阳到图们的陆上交通线，一条是从通化经辑安、满浦到图们的陆上交通线。这两条陆上交通线，是贯穿朝鲜北半部沟通南满与北满的重要走廊。在当时东北被战争分割的情况下，对于转运战略物资和输送过境人员，坚持南满作战，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另外二条分别为大连到南浦、大连到罗津的海上运输线。北朝鲜的南浦和罗津都是不冻港，港口码头与铁路相连，装卸转运十分方便。从大连装船抵南浦或罗津港，再连结陆上运输，可直达北满，是沟通关内与关外、大连与北满的主要通道。从东北南运粮食和煤炭，从大连北运食盐、布匹和其他工业品，以及国内外的过境人员，大多数都是经南浦或罗津转运北满的。一九四七年陈家康去布拉格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也是由大连经南浦到哈尔滨取道莫斯科前往布拉格的。这说明，这条走廊也是我国与国际联系的一条重要通道。

为充分利用上述水陆交通运输条件，更好地完成物资转运任务，一九四六年九月我们与北朝鲜临时人民委员会签订了物资联运协定。在物资联运协定签字后，几年来绝大部分物资运输都是依照协定条款交了运费和税金的。也有一部分物资，因情况紧急未按协定条款运输，其中有的是用人民委员会的名义要的车皮，未付运费；有的付了运



费未交税金。特别应当指出的是，有时情况紧急，朝鲜政府不惜停止自己的客运，为我们紧急装运。在此期间，为了帮助我们完成上述任务，平安北道劳动党副委员长几乎占用了他的全部工作时间，朝鲜人民委员会内务相占用了他相当多的工作时间，这种国际主义的革命友谊是我们永远难忘的。

### **（三）向朝方求援和采购作战物资。**

过去朝鲜是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的跳板，也是日本侵略军的军火库。两年多来，朝鲜方面支援了我们两千多车皮日本侵略军留下的作战物资，有的是无代价支援我们的，有的是通过物资交换取得的。在请求朝鲜政府支援的作战物资中，第一批是朱理治向金日成同志要的十二个车皮物资，第二批是刘亚楼要的二十四车皮物资，第三批是朱瑞要的一百一十个车皮物资，第四批要多达六百到八百车皮物资。这些物资都是金日成同志和朝鲜劳动党中央的几位领导同志答应无偿赠与和无代价帮助我们装运的。在采购和交换的物资中，一九四六年山东指派倪振通过办事处买到三百吨炸药、三百万只雷管、一百二十万米导火线。一九四七年春，山东又指派黄友年等通过办事处买到一百二十吨炸药、二百吨硝酸、一百吨丙酮、十五万双胶鞋。这些物资在战争中都是非常宝贵的，从南浦装船经大连转运山东，对支援山东以至华东解放战争发挥了很大作用。

### **（四）建立和发展中朝两党两国人民的友好合作关系。**

两年以来双方本着友好合作、平等互利的原则，经过

充分协商，对于鸭绿江共同航行，中国使用水丰电厂电力，以及两国通邮通电等合作互助关系，都获得了圆满解决，先后签订了二十几个协定。协定的执行情况基本上也是良好的。双方在物资上互通有无和互相支援，主要体现在一年一度的贸易协定上。朝鲜供应我方的物资，除无烟煤、水产品 and 民用产品外，主要是与军用有关的硫酸、硝酸、甘油炸药和苦味炸药等，东北供应朝鲜的物资主要是粮食、烟煤和民用产品。对待一年一度的商务谈判，双方都很认真，有时李富春还亲自去平壤领导谈判，拍板定案。

#### **（五）协同朝鲜劳动党做华侨工作。**

做华侨工作，是朝鲜劳动党中央正式向我们提出来的，对此东北局很重视，于一九四六年下半年和一九四七年上半年，先后派遣了几批干部去朝鲜专做华侨工作。为了加强领导，经朝方与朱理治商量，决定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和道党委设立侨务委员会，由劳动党的有关负责同志担任侨委会主任，中国同志任秘书长，负责领导华侨工作；并决定在平壤成立华侨联合总会，在华侨比较多的道和郡成立华侨联合会分会，以取代国民党的旧中华商会。总会和道委员会的主要领导干部都是中国同志。例如，丁雪松一九四六年冬任朝鲜劳动党中央侨务委员会秘书长，一九四八年上半年任华侨联合总会委员长。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华侨联合总会成立时，王静野任总会委员长，王斐任秘书长兼组织部长，彭光涵任宣传部长，宫和轩兼任镇南浦分会委员长，夏秀峰任黄海道分会委员长，还有王守正、李从朴、蔡去非等，都是国内派去从事华侨工作的骨干。

当时北朝鲜有华侨两万多人，以种菜和开饭馆为业。由于长期受日本军国主义统治和旧中国的影响，华侨，特别是少数上层人物的思想情况很复杂，一方面对朝鲜人民有较深的民族成见和隔阂；另一方面对中国共产党有戒心，对共产党能否战胜国民党有怀疑，“正统”观念很深。把这些华侨群众争取过来，无论对朝鲜的社会主义建设，还是对支援我国解放战争，都是很重要的。

我们的工作，主要是采取多种形式对广大华侨进行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思想教育。宣传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主张和国内解放战争的大好形势；宣传朝鲜政府的政策法规和中朝人民的传统友谊。启发广大华侨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觉悟，支援东北解放战争，遵守朝鲜政府政策法规，积极参加北朝鲜社会主义建设。

华侨联合会成立后做了大量工作：举办华侨报纸和华语广播，创办华侨中学和恢复发展华侨小学，举办华侨积极分子训练班和教师训练班，搞土地改革，组织华侨慰问参观团到东北解放区进行慰问和参观学习，组织华侨宣传队演唱革命歌曲和新型话剧，从国内运粮食救济华侨等等。通过以上各种工作，广大华侨的政治态度发生了根本变化，使国民党在华侨中占绝对优势的态势，转变为我们占绝对优势。华侨和朝鲜人民的关系有所改善，大多数华侨能遵纪守法。他们拥护中国共产党，积极支援祖国的解放战争。例如，一九四七年朝鲜支援山东的几百吨炸药运抵南浦港后，就是从华侨中挑选可靠的青年负责警卫和装卸，不仅

装卸及时，而且保障了安全。后来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有不少华侨给中国人民志愿军当向导和翻译，有的还参加了志愿军；有不少华侨积极分子回国，有的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有的当上了国家机关干部，其中还有担任我驻外国大使的。

以上五个方面的情况，可以说明，在我东北解放战争的艰苦年代，以金日成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和朝鲜人民给了我们多么可贵的支援，以及多方面富有成效的合作。虽然那时根据平等互惠的原则，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我们对朝方也有一些帮助，例如，一九四七年和一九四八年，我方赠与和通过物资交换供应北朝鲜的粮食将近五万吨。当时北朝鲜粮食奇缺，我们的援助起了雪中送炭的作用。但比较起来朝鲜对我们的帮助要大得多。而且朝方给予我们的一些无代价的支援，不是金钱和物资所能换得来的。东北三年解放战争期间，北朝鲜的确是起了可靠后方的作用。

### 三、巩固和发展中朝两党两国 人民的伟大友谊

东北局驻朝鲜办事处，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为了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而派驻国外的临时代表机构。办事处在执行任务期间，北朝鲜成立了临时政府，一九四八年成立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那时候新中国还没有诞生，中朝双方还不可能建立国与国之间的正式外交关系。但是，

办事处执行的任务实际上又涉及广泛的属于国家之间的外交事务。这样的机构和使命，在我党的历史上既没有先例，也没有经验，而国内当时忙于打仗，也不可能制订一套系统的外交政策和原则。所以，办事处的活动是边工作，边总结经验，是在摸索中前进的。

办事处执行任务，办理交涉，需要与朝鲜政府有关部门及地方广泛接触。我方因战争需要有求于朝鲜，只要是力所能及的，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和曲折，在金日成同志和朝鲜劳动党其他领导同志的关怀和支持下，一般地最终都得到了圆满的解决。正如金日成同志一九四七年上半年给东北局主要领导人的一封信中曾经说过的，双方的关系是亲密无间的，对于我们的事情他总是尽力帮助的。金日成同志另一次在接见我方求援的同志时也曾指出：“中国的事情就是我们的事情”。事实也确是如此，以金日成为首的朝鲜劳动党的国际主义原则立场与兄弟般的友好合作精神是始终如一的。这是办事处能够履行其使命的最基本条件。当时，苏联驻军和在朝鲜政府工作的苏联顾问也给了我们多方面的国际主义支援，帮助我们解决了不少紧急而又困难的问题。所有这些都应当载入史册，永志不忘！

根据东北局指示的方针，办事处在朱理治领导下，处理中朝两党、两国关系所奉行的一个基本指导思想，就是本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同朝鲜劳动党和朝鲜人民亲密团结、合作互助，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根据这个总的指导思想，我方人员与朝鲜同志合作共事，办交涉，在实践中逐渐形成的行动准则，可

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尊重朝鲜的独立和主权，防止大国沙文主义，**这是我方处理与朝鲜关系的第一位的原则问题。朝鲜人民在帝国主义长期统治下获得解放，在苏军驻守和国际条约约束下，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处境又比较复杂和困难。我们是大党大国，又是处于战争环境，在初期，进入北朝鲜的我方人员来自四面八方，又没有建立起统一的组织与领导，思想情况比较复杂，认识很不一致。为了处理好同朝鲜同志的关系，朱理治一开始就着重抓了思想教育，及时发现和及时纠正出现的问题。这是办事处能够比较顺利地完成任务，建立和发展中朝双方友好合作关系的一条重要经验。

**（二）遇事耐心协商，多做工作。**朝鲜从日本几十年的殖民统治下刚刚获得解放，是一个新兴国家。除了国际条约的约束，物质条件也十分困难。在办理交涉中，难免发生一些意见分歧和争议，正确的态度只能是耐心协商，多做工作，促进彼此的了解，寻求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方案。不体谅朝方的困难，轻率急躁只能把事情搞坏。

**（三）团结互助，平等互利。**国际主义的革命援助与经济往来平等互利的原则是并行不悖的。兄弟国家之间的经济往来，必须遵循平等互利的原则，我们争取朝鲜的帮助，也要尽可能照顾对方的利益。只有照顾到对方的利益，才能比较顺利地取得对方的帮助。在某些特殊场合，涉及全局的紧急任务，在局部利益上则更不必多所计较，以免贻误大局。

为了保证经济往来的正常进行，以利信守，我们把这些活动以协定形式确定下来。两年多期间，我方与北朝鲜政府共签定各种协议或合同二十余项，执行情况一般都比较较好，很少发生争议。

**（四）统一组织与领导，克服分散现象。**健全组织领导，是实现外交使命的重要组织保证。初期，东北和关内解放区的许多地方和单位的人员大量拥进北朝鲜，部门林立，各搞一套，都派人找金日成同志或朝鲜其他领导同志，给朝鲜同志增添了许多麻烦。一位朝鲜领导同志接见我方人员时说，我不管你是南满的还是北满的，山东的还是吉林的，我只知道你们是中国共产党的。东北局很快纠正了这种分散现象，决定对北朝鲜的一切外交事务，由平壤办事处负责。对各个解放区派驻朝鲜的代表和机构，进行整顿，由平壤办事处统一领导。并委派朱理治为东北局驻朝鲜的全权代表，统一负责领导对北朝鲜的外事工作。从此以后，对朝外事工作的统一领导，统一政策和统一行动，也成为办事处工作的一项共同守则了。

遵循以上这些原则，办事处胜利地完成了在特殊的形势下她的特殊的历史使命。当时我们在办事处一起工作至今还活着的几位同志，当回忆这段往事的时候，都为一生中能有这一段经历而感到自豪。

我们写这篇回忆文章，同时也藉以表达对已故朱理治同志的崇敬和怀念之情。

# 三五九旅南下支队 南征北返和中原突围记略

黄 铭

一九四四年，有一支五千人马队伍从延安出发，经汾阳、洛阳、南阳、岳阳、衡阳，直抵南雄。日本投降后，奉命北返。第二年又参加了中原突围。这就是闻名于世的三五九旅南下支队。

四十一年前，我国的抗日战争，进入第七个年头。当时国内外的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欧洲战场，苏联红军发动全面大反攻，美英军队开辟了第二战场，德国法西斯面临最后崩溃。在太平洋战场，美英军队也由防御转入进攻。日寇企图以中国大陆作为垂死挣扎的基地，先后发动“河南战役”和“湖南战役”，豫、鄂、湘、粤、黔、桂等省千里之地和一百多座城市相继陷落，六千万同胞沦于日寇铁蹄之下。

当时，我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对日寇发动了局部反攻，歼灭大量敌人，收复大片国土，已经成为抗日救国的决定因素。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基于对战争形势的分析和中国革命斗争实际需要，制定了——



## 一个重大的战略部署

这就是：在巩固和发展华北、华中等抗日根据地的同时，抽调部分主力向华南发展。

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部署，华北、华中的五支主力部队，齐向华南作战略跃进。其中命令担负延安卫戍任务、屯垦南泥湾的三五九旅抽调主力三千八百人，中央组织部选调一批工作干部，加上被护送的九百余名南方干部，组成约五千人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独立第一游击支队”（简称“南下支队”）。王震任司令员，王首道任政治委员，王恩茂任副政治委员。王震等率部南征，计划前去会合东江纵队，开辟湘赣粤桂边的五岭抗日根据地，建立并加强我党在南方的一翼，以阻止国民党的反革命逆流，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

具体步骤是：三五九旅分成两个梯队，第一梯队先行，待与东江纵队会师后，第二梯队继续南下。

出发前，毛泽东着重分析了南征前途的两种可能，并一再嘱咐王震同志做好充分的精神准备。

第一种可能，就是整个国际的反法西斯战争，包括中国的抗日战争还要持续二、三年。这样，你们就可以在华南利用日伪和蒋顽之间的矛盾，放手发动群众，壮大革命武装力量，巩固和发展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

第二种可能，就是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迅速胜利，日本很快投降，整个局面就会发生重大变化。蒋介石决不允许

你们这把刀子插在他的咽喉，他会首先集中力量吃掉你们。这样，你们孤军深入，没有根据地，斗争将十分残酷，你们的处境将极其困难，甚至可能全军覆没，包括你本人在内。你们要准备迎接这场严重斗争，发扬不怕牺牲英勇奋斗的精神，力争光明的前途。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你们还能回到鄂豫边李先念同志那里，那也是一个很大的胜利。

就这样，当年在浏阳河畔秋收起义上井冈山，创建湘赣根据地；再经二万五千里长征，北上抗日；又以击毙日寇长岗旅团长和南泥湾大生产而闻名于世的三五九旅，肩负着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交付的重任，投入这场严重的斗争之中，开始了——

## 第二次长征

这次长征，分为三个阶段。

（一）南征湘粤——南下支队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九日从延安出发，行程四千华里，于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七日到达鄂豫边的大悟山根据地，与李先念领导的新四军第五师胜利会师。短暂休整后，同五师张体学部队一起，二月二十三日最后一批强渡了长江。三天之后，取得痛歼日寇的大阪大捷，威震江南。南下支队改换番号，更名为“国民革命军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三月一日，部队向湘赣边进军，初步开辟了以鄂南为中心的湘鄂赣游击根据地，把江北和江南联接起来。七月，部队继续南下，于八月底进抵广东南雄县境。当进入五岭山区，与前来接应的东江

纵队仅距百里之遥的时候，时局发生了突然变化，出现了南征前途的“第二种可能”，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胜利结束。抗战胜利后，我们过去可以利用的日伪和蒋顽之间的矛盾，已不复存在。党中央续派南下的第二梯队，也由于形势变化，进到河南就奉命改道向东北去了。这时，蒋介石纠集了七个军，二十一个师，十五万兵力，在从鄂南到粤北长达两千余里的战线上，不论白天黑夜，风雨阴晴，对我军进行了大规模的围追堵截，战斗越加频繁残酷。我军为避其锋，于八月十七日转入高山丛林的八面山中，不料再陷重围，全军处于危亡和饥饿之中。十九日突出重围，绝路逢生。二十五日移兵江西大庾，计划杀开一条血路，强越九岭南下。但敌人兵力数十倍于我，切断了我军继续南下的所有路径。按原定计划会合曾生领导的东江纵队，在国民党反动势力占绝对优势的湘粤赣边的五岭山区建立根据地已不可能。我军面对几路敌人的重兵围困，背后又有九个师的追兵。八月二十九日，奉中央电令，为避免内战，南下支队回师北返。从延安出发至此，我军历时近三百天，行程已过一万里。

（二）北返鄂豫边——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我所有南下部队，在江西上犹县黄沙坑地区会合，同道北返。国民党反动派设重兵，沿途层层围追堵截，均被我军冲破击退。由于不停地连续战斗和行军，在湘南、赣西、粤北地区及井冈山周围，部队减员甚大，许多同志壮烈牺牲。伤病员忍痛跟随部队徒步行军，战士们历尽了人世间难以忍受的艰难困苦，于九月十五日回到湘北，强渡浏阳河，进

入鄂南根据地，与坚守长江南岸的接应掩护部队会合，月底从鄂城渡过长江。十月三日，在湖北黄安县庙基湾与中原军区及新四军第五师胜利会师。自广东南雄北返鄂豫边，历时三十四天。从延安出发至此，南下支队历时三百二十九天，走过七省七十八个县，行程一万五千八百四十里。南征北返就此结束。

（三）中原突围——一九四五年十月十日，部队北渡长江后，还名三五九旅，编入我中原军区第二纵队序列，王震调任中原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郭鹏任旅长，王恩茂任政委。转战在鄂北、豫南，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进攻。一九四六年六月，蒋介石公然撕毁停战协定，调集十个整编师及十几个保安团，共三十六万兵力，沿鄂豫边界以宣化店为中心的南北狭长不及百里的地带摆开，企图将我中原军区一举围而歼之。我军早有戒备，遂于六月二十七日夜，主力向东西两个方向突围而出。三五九旅作为右路军，由王震、王恩茂率领向西突围。胡宗南调集大军封锁秦岭，我军入商洛山区，正值酷暑，青黄不接，无日不战，伤亡、散失、掉队、病员增加，部队再次大量减员。为打乱敌人围歼部署，由中央直接指挥，先解放镇安县城以调动敌人，挥兵西南奔宁陕，下洋县，抵汉水北岸，成渡江入川之势；再折向西北，过华阳，越太白，绕宝鸡，奔袭胡田车站，强渡渭河及宝〈鸡〉天〈水〉铁路。在长武、灵台之间，冲破敌人设在西（安）兰（州）公路上的最后一道封锁线，连夜北渡泾水，八月二十九日，与接应部队会师。中原突围历时六十三天，浴血奋战九十余次，日夜

兼程五千余里。九月二日进入陕甘宁边区南线要塞驿马关。十五日，在四十里外军民郊迎的热烈气氛中，胜利重返革命圣地延安。

三五九旅南征北返和中原突围，作为一个统一的战略行动，自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九日从延安出发，至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九日胜利回到陕甘宁边区，历时六百五十九天。此次孤军深入，驰骋中原，强渡了江、河（两渡黄河、两渡长江）、淮、汉及汾河、洛水、伊河、浍水、湘江、赣水、白河、渭水等名川巨流；越过了吕梁、中条、王屋、伏牛、大别、九宫、幕府、罗霄及五岭、九岭、秦岭山脉；跨过了同蒲、陇海、平汉、粤汉、宝天铁路；转战于秦、晋、豫、鄂、湘、赣、粤、陇八省，共经过一百多个县，即：

陕西（二十一）：延安、延川、清涧、绥德、米脂、山阳、丹凤、兰田、商县、雒南、镇安、柞水、宁陕、洋县、太白、凤县、宝鸡、陇县、长武、富县、甘泉；

山西（十）：临县、离石、汾阳、介休、平遥、沁县、沁沅、安泽、沁水、垣曲；

河南（三十）：济沅、澠池、新安、宜阳、洛宁、伊川、登封、嵩县、汝阳、临汝、鲁山、叶县、舞阳、西平、遂平、确山、正阳、息县、罗山、信阳、光山、潢川、唐河、邓县、南阳、桐柏、新野、内乡、淅川、庐氏；

湖北（二十二）：礼山、黄安、黄陂、黄冈、浠水、蕲春、黄梅、广济、阳新、大冶、鄂城、咸宁、通山、通城、蒲圻、嘉鱼、崇阳、隋县、枣阳、安陆、应城、均县；

湖南（十九）：平江、临湘、岳阳、湘阴、浏阳、长

沙、宁乡、湘潭、湘乡、攸县、安仁、耒阳、永兴、酃县、桂东、汝城、宜章、衡山、茶陵；

江西（十一）：吉安、崇义、上犹、遂川、宁冈、永新、莲花、萍乡、铜鼓、修水、武宁；

广东（四）：南雄、始兴、乐昌、仁化；

甘肃（五）：灵台、泾川、镇原、庆阳、合水。

南下支队胜利返回延安后，毛泽东高兴地说：你们不怕困难，不怕牺牲，勇敢顽强，深入敌人心脏，敢于和敌人作斗争，打破了国民党反动派数十万大军的围剿，胜利返回延安，这是我党历史上的第二次长征。朱德总司令在举杯祝酒时说：这次南征、北返和中原突围，共走了两万七千里路，同志们辛苦了。王震当即站起谦虚地回答说：“仅仅是两万二千里！”（意思是不能超过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的数字）这次长征，创造了——

### 中国军事史上的一个奇迹

这次长征，我们面对的敌人是当代最疯狂、最残忍的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还有汪伪军队和美帝国主义武装起来的国民党的军队，加上它的地方武装，总共数百万之众。他们有着所谓能征惯战的统帅、将领，掌握着现代化武器，拥有飞机、坦克和大炮，占驻着有利地形和军事据点，还有现代化的运输工具和通讯设备。而我们五千人马，只有一腔热血、两条腿，携带步枪、刺刀、手榴弹及少数轻重机枪这样的轻型武器。在南下、北返、中原突围的六百五

十九天中，这支部队冲过敌人的一百多条封锁线，大小战斗三百余次，平均两天打一次仗，其中较大的战斗就有七十四次。他们经受了极其严峻的考验，在我党我军的作战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一九四五年二月二十六日，我军与日寇在湖北阳新县三溪口以西大畈一战，全歼来敌，敌遗尸四百余具，我缴获炮七门，轻重机枪二十五挺，步枪三百余支。我伤亡连以下干部战士七十二人。这是我军渡江之后，在江南大地上痛歼日寇的第一仗，使日寇遭到了沉重打击。此役旗开得胜，威名大震，敌人闻风丧胆，位于湘北军事重镇的平江县城及附近十几个据点的敌人慌乱撤退或逃窜。我军一鼓作气，解放了平江附近十几个县，建立起民主政权。从延安出发的半年间，共打了大小一百三十多次仗，杀伤、俘虏敌、伪、顽三千余名，收复大小城镇二百七十八座。特别是争取了盘踞在湘北重镇湘阴县城的伪军左钦义部三千余官兵的起义，这是我党统一战线政策的一个重大胜利。

北返之役，我军采取声东击西，左右迂回的战术，不断改变路线，以强行军速度，日夜兼程，风雨无阻，夺路而行。中原突围后，在秦岭山中更是争分夺秒，斩关夺隘。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全体指战员勇猛拚杀，并得到群众热情支援，使胡宗南徒有三十万大军，无可奈何地“放虎归山”，眼巴巴地看着我军以豪迈的步伐，胜利返回陕甘宁边区。

南下支队五千人马，孤军深入敌后，跃进万里之外，本为兵家所忌。但他们面对几百万强大的敌人，枪林弹雨，万马丛中，却能锐不可挡，进得去，出得来，打不垮，拖

不烂。虽然几遭全军覆没的危险，终能化险为夷，立于不败之地。在我国的军事史上，确是创造了一个奇迹。这个奇迹恰恰证实了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一个既会打仗，又会生产的军队是不可战胜的。”

要奋斗，就会有牺牲。南下支队的五千人马，回到延安的只有一千四百一十四人。从南泥湾出发的三五九旅三千八百人，经过南征北返和中原突围，伤亡很大，生还者仅八百三十三人。经过这样一场异常紧张残酷的斗争，所有生还者体力消耗太大。在突围的六十三天中，因未得熟食，普遍出现浮肿、头发脱落（回到陕甘宁边区南线的重镇庆阳城时正值中秋佳节，因暴食而胀死三十四名，占生还者总数的百分之四）。部队确实需要一定时间的休整才能恢复战斗能力。但时值国共双方两种命运决战的关键时刻，战事急迫，王震、王恩茂鼓舞大家“珍惜斗争的光荣，勿负党和人民的期望”，提出“重整旗鼓，再上前线”的号召。于是，将士们抖擞精神，请缨杀敌，遂即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的战斗序列，投入了大西北的解放战争，直至进军新疆。

（本文原载《新疆党史资料通讯》总第十七期，  
这次发表个别地方作了删改）



# 黄麻起义

红安县革命史编写办公室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三日我党领导的黄麻起义，是继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之后，在长江以北地区首次发生的农民武装起义。党在领导这次起义中建立了政权和军队。这次起义的胜利，为后来创建鄂豫皖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起了先导作用。

## (一)

鄂东的黄安（今红安）、麻城，位于鄂豫交界的大别山南麓。大革命前，广大农民群众深受封建地主和军阀官僚的剥削和压迫，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曾多次自发地起来进行反抗和斗争。

一九二〇年三月，黄安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董必武，在“五四”运动的影响和推动下，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并在武昌创办了私立武汉中学，以此为基地宣传十月革命，传播马列主义。其时，黄安、麻城等县到武汉中学和其他学校读书的学生很多，他们中的一些人也开始受到马列主义的熏陶。当年秋，董必武、陈潭秋等成立了武汉共产主义小组。一九二一年七月，董必武、陈潭秋出席了中国共产

党在上海举行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他们回到武汉仍以学校为基地，积极发展党、团组织。黄、麻两县青年学生中的一些进步分子便陆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

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四年间，黄安党的工作组在武汉中学成立，成员有董觉生（董必武弟）、王鉴、雷绍全等。一九二四年，麻城在武汉读书的蔡济璜、王幼安、刘文蔚等也在武汉成立了党的工作组，利用假期回家的机会，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团结进步青年，发展党的组织。

一九二五年春，黄安党的工作组在武汉发动旅省青年学生成立了“黄安青年协进会”，将进步青年团结在党的周围，通过《黄安青年》刊物，转载革命消息，抨击反动政治，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提倡新文化运动。“五卅惨案”发生后，党组织又利用暑假回乡学生，下乡宣传讲演，办“农民夜校”，成立“五卅惨案后援委员会”，发动学生和市民罢课罢市，游行示威，掀起了反帝反封建军阀的高潮。麻城党的工作组也在城镇和乡村中宣传党的主张，发动农民起来革命。是年秋，黄安的党团员发展三十余人，在县城成立了中共黄安党团特别支部。董觉生任书记。冬季，中共麻城党团特别支部成立，书记王幼安。

一九二五年秋，黄安党团特别支部派党团员到桃花、城区、高桥等区农村去秘密建立农民协会。翌年四月，在汪家河、张家田、郭受九、栗林咀、曹门、喻家湾等村成立了农民协会，会员共有一千五百余人。麻城党团特支的党团员，在乘马、顺河、城区等地的石槽冲、王家楼、盛

家凹、林店、大河铺、甘露庵、海潮庵、丁家寨、三里桥、东岳庙、丁家园、相公庙等村也秘密成立了农民协会。不久，两县党组织决定从清算教育经费入手，夺取两县教育局的领导权。黄安用检定教师的办法，淘汰塾师，将革命青年派往乡村。他们一面教书，一面用办农民夜校的方法，发动农民、手工工人、妇女等起来革命。一九二六年十月，北伐军攻克武昌后，第一次国共合作在黄、麻两县进一步发展，两县的农民运动由秘密转为公开。月底，黄安县农民协会在县城正式成立，选举徐希烈、王鉴、邓用中、王执富、吴慎斋、田开寿、夏国仪（女）、王文焕等为执行委员，徐希烈任委员长。在北伐胜利的影响下，黄、麻两县的农民运动迅速发展起来。一九二七年春，黄安有十个区，二百一十个乡建立了农民协会，会员达五万六千余人。麻城有十三个区，三百四十个乡建立了农民协会，会员达十二万四千余人，刘象明任县农协委员长。

一九二七年二月，中共黄安县委成立；三月，中共麻城县委成立。黄安县委由余文治、徐希烈、戴季伦、郑位三等组成，余文治任书记。同时成立了共青团黄安县委，刘建安任书记。麻城县委由蔡济璜、刘文蔚、刘象明、王幼安、邓天文、王树声等组成，蔡济璜任书记。至五月，两县的党员也有很大的发展，黄安有党员六十七人，麻城有党员二十五人。

农民运动兴起后，纷纷惩办土豪劣绅。一九二七年三月，黄安县紫云、七里区的农民，在省农民运动特派员王鉴等人的领导下，首先起来打死县北大土豪吴荟存，揭开了

惩办土豪劣绅的序幕。四月，黄安县审判土豪劣绅委员会成立，对全县民愤极大的土豪劣绅一一进行审讯。五月，审判委员会在县城召开公判大会，镇压了大土豪劣绅、反动会首李介仁、李仕显、张英延、阮纯青和土匪头子石黑子五人。从此全县掀起了“打倒土豪劣绅，一切权力归农会”的高潮。此间，麻城的农民运动也如火如荼。二月，麻城县委组织乘马岗等区两三千农民扛着刀矛涌进县城，逮捕了大劣绅李舜卿等人，在群众的强烈要求下，将李舜卿、丁枕鱼、王子厉等枪决。

正当农民革命运动高涨之际，黄、麻两县外逃河南光山的土豪劣绅勾结那里的反动武装红枪会，聚众数千人于四月向黄安之七里、紫云，麻城之黄土、乘马、顺河等地进犯。红枪会所到之处，捣毁党部、农协机关，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掠夺财产。土劣、红枪会在麻城反动县长傅家樗的支持和当地驻军的纵容下又制造了“麻城惨案”。对此，中共黄、麻两县委领导广大农民进行了坚决的回击。麻城县委派王树声去武汉找到中共湖北区委委员、湖北省政府负责人兼农工厅长董必武，汇报了麻城情况。请求派兵增援。董必武立即采取措施，由省政府、国民党省党部、省农协，会同国民党中央农民部、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和麻城农民代表，联合组成查办“麻城惨案”委员会。四月二十四日，麻城反动派又在县城制造惨案，将赶赴麻城的惨案委员会负责人郭树勋打伤。土劣头子丁岳平、王仲槐、王九聋子的反动气焰很嚣张，纠集二千余红枪会众加紧围攻县城。惨案委员会同麻城的共产党组织、农协等团

体，一面调集农协会员在县城固守，一面派代表到武汉请求加派兵力镇压反动派。省政府遂派出省警备二团一营，并由董必武出面请毛泽东主办的武昌农讲所派二百名学生军驰援，同时令黄安警备队和警备自卫军配合“会剿”，将围攻麻城的红枪会全部击溃。五月，黄安北乡三千余农民武装，在木城寨抗击反动红枪会的进攻达七天七夜，后来，党组织动员了六万余群众，配合农民自卫军大举反攻，终将红枪会打垮。黄、麻两县农民反击红枪会的武装斗争，持续了半年之久，战线达百里之长，双方参战人数达十万之多，尽管使用的多属原始武器，然斗争十分激烈。这场战斗，教育和锻炼了广大农民，使他们认识到了武装起来的重要性；党在领导这场战斗中也初步学到了一些经验，这就为后来的黄麻起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 (二)

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五日，汪精卫集团继蒋介石集团之后叛变革命，下令“清党”，取缔工会、农会等革命群众组织，大骂黄安是“赤色县”，并发出通缉令，通缉以董必武为首的共产党员九十二人。两县的土豪劣绅遂疯狂反扑过来，不少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但是黄、麻两县的共产党员如黄安的郑位三、曹学楷、戴季英、戴克敏、吴焕先、陈定侯、汪奠川、高建斗、王秀松、程昭续、徐朋人、戴季伦、郑友梅、吴先筹、江竹青等和麻城的蔡济璜、刘象明、刘文蔚、王幼安、徐子清、王树声、徐其虚、桂步蟾、

王宏学等继续坚持斗争。此时，郑位三代理黄安县委书记，麻城县委书记仍由蔡济璜担任。一九二七年三月黄、麻两县成立的农民自卫军，经过动荡和分化之后，都牢牢地掌握在党的手中，特别是麻城农民自卫军，在黄安农民自卫军的配合下，粉碎了军事教官熊振翼的叛变阴谋，使队伍更加纯洁和坚强，并进行了整编，由黄安农民自卫军大队长潘忠汝代理麻城农民自卫军大队长。不久，省委派吴光浩任麻城农民自卫军大队长。

为反击黄、麻两县土豪劣绅再次勾结光山红枪会和土匪向革命力量进攻。黄、麻两县委决定重新武装农民，成立了各级防务委员会和义勇队，七月下旬，麻城县防务委员会在邱家畈成立，负责人有王树声、徐子清。接着，乘马、顺河两区也成立了区防务会。接着，黄安县防务委员会在七里坪成立，戴克敏、陈定侯为负责人。

自“七一五”后，黄、麻地区的形势愈来愈严重，国民党反动派千方百计要扑灭这里的革命火焰。黄、麻两县党的组织则高举斗争的旗帜，紧紧依靠农民群众，牢牢掌握革命武装，不断发展革命力量，让革命火焰继续燃烧起来。

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党中央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会议决定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当前党的最主要的任务。湖北省委根据党中央“八七”会议精神，结合本省实际情况，制订了秋收暴动计划。省委将全省划分为七个工作区，黄安、麻城等县属鄂东区。各区组织党的特别委员会，由省委指定从事党、农运和军事工作等同志组成，主持该区工作。

由于白色恐怖严重，当时黄、麻县委与湖北省委一度失去联系，“八七”会议精神和省委的秋收暴动计划未能即时传达贯彻到黄、麻地区。

八月底，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电告黄安派八、九人去武汉参加改组。黄安县委获悉后开会讨论，决定趁此机会派郑位三、陈定侯、程翰香等九人去武汉，以少数人去应付改组，其余的人去寻找上级党的组织，终于与湖北省委书记罗亦农取得了联系。罗亦农询问了黄安的情况后，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详细分析了国内的局势，指出：现在资产阶级彻底叛变了，小资产阶级动摇不定，为了继续革命，党决定发动两湖秋收暴动，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罗亦农还拿出两份党中央通告，让他们看了鄂南秋收暴动计划，并要他们立刻返回黄安，参照鄂南的计划，组织暴动。九月中旬，郑位三、陈定侯等主要干部返回黄安，立即在七里坪文昌宫开会讨论党的指示，参加会议的有：郑位三、曹学楷、戴克敏、吴焕先、戴季英、陈定侯、吴先筹、高建斗等。会议拟定了两个文件：一是传达省委关于组织武装暴动的指示；一是具体的暴动计划。会后，大家分散到各区，利用“防务会”，以祠堂、庙宇为集结点，打刀造枪，掀起了捕杀土豪劣绅的斗争。从九月二十六日起，黄安紫云、七里等区的农民在党的领导下，纷纷起来暴动，农民们说：“还是不打不能安身”，“不打平不能安身”。熊家咀附近的农民三百余人，在共产党员程昭续的带领下，处决了程卜畷的大土豪程瑞林。长冲附近的农民五百余人在戴季英等人的率领下，捉拿了檀树全乡的

土豪劣绅，然后根据罪恶大小，分别予以处决或罚款。所得款项用来制造刀枪。七里坪工会负责人秦绍勤、郑行瑞率领工人纠察队暴动，镇压了七里坪的土豪兼商会会长李业阶。仅在一个星期里，七紫两区农民暴动已达二十余处。

九月下旬，省委派人先后两次在麻城县北之邱家畈和林家山传达贯彻“八七”会议精神，参加会议的主要有蔡济璜、刘文蔚、王树声、廖荣坤等二十多人，会议决定与黄安共同行动。从九月二十六日起，县委负责人蔡济璜、刘文蔚等在乘马、顺河等地相继召开了几千人的群众大会，号召实行土地革命，没收土豪劣绅大中地主的财产。会后，各地群众掀起了暴动高潮，邱家畈农民逮捕了大土豪张继全，并没收其财产；乘马岗一带数千农民纷纷集会，举行暴动；西张店两千多农民在邓天文等带领下暴动起来，活捉了大土豪王润先，并没收其全部财产；林家山一千多农民在蔡济璜、王树声、刘文蔚等领导下，捕捉了邱麻子等土豪，并没收其财产。在此期间，乘马、顺河两区先后共有十多处农民暴动。

“九月暴动”，沉重地打击了土豪劣绅的反动气焰，揭开了黄麻暴动的序幕。但是，由于两县委缺乏领导起义的经验，没有及时在农民协会的基础上建立起革命政权，没有及时在农民自卫军的基础上建立起革命军队，因而未能把这时的农民运动推到武装夺取政权的新阶段。不久，国民党三十军魏益三部窜犯黄安、麻城，致使“九月暴动”暂时停顿下来。但是，“九月暴动”的意义很大，它向两县农民揭起了党的土地革命的旗帜，进一步发动了群众，武装



了群众，严厉打击了土豪劣绅的复辟活动，基本上肃清了黄、麻北乡七里、紫云、乘马、顺河等地区的反动势力，为更大规模的武装暴动作好了准备。

九月，鉴于鄂南暴动即将开始，鄂东区工作渐趋重要，省委将鄂东分为大阳、黄蕲、黄麻三区，各区分别建立党的特别委员会。黄安、麻城同黄冈、罗田划为黄麻区。

十月中旬，黄安县委再派郑位三、戴季英去武汉向省委汇报了黄安“九月暴动”的情况（注：郑位三到武汉身染重病，回县即离职治病，故未参加起义）。与此同时，省委接到了麻城方面的报告，得悉两县尚有相当数量的武装力量和很好的群众基础，并已开始暴动，遂派符向一巡视黄麻区。十月二十一日，省委又获悉黄、麻两县逃武汉土豪劣绅请兵前往镇压农民暴动，省政府已决定派兵，并撤黄安县长李墨林职，调贺守忠任县长。据此，省委决定立刻派刘镇一、黄赤光二人前往指挥（注：黄赤光未到）。并决定黄麻区特委由黄麻两县书记及刘镇一、黄赤光，再加二、三个真正的农民领袖组成。同时，省委给黄麻区党组织一封指示信，再次强调实行土地革命的意义和黄麻两县的工作方针。指出：“中国革命已进到土地革命的阶段，本党的任务就在把这个土地革命的责任担负起来。我们主要的斗争方法为游击战争，即组织许多农民游击队，在四乡普遍的杀戮土豪劣绅、政府官吏、大中地主，抗租、抗税、抗粮、抗捐，发展土地革命宣传与鼓动，并即时没收地主一切财产，并用很简单的方法，将土豪劣绅、大中地主的土地及一切公地分配给贫苦农民，实行耕者有其田。这个分

配土地的工作非常重要，应看作比杀土劣更有意义。因为土地革命的对象为土豪劣绅、大中地主，而杀土劣地主的目的是，即在农民取得土地，若不分配，则杀土劣成为没有意义了。但这是初步的分配，并不是科学的分配，手续愈简愈好。分配了土地，农民就会为保有其所得的土地而自动地起来斗争的，至于政治宣传口号是：暴动杀尽土豪劣绅，暴动没收一切田产，暴动抗租、抗税、抗粮、抗捐，暴动实行一切乡村政权归农民协会，暴动推翻武汉政府，暴动拥护叶挺、贺龙独立，农民革命万岁等，……在这个斗争中，应极力发展我们党的组织，把忠实勇敢的真正农民，加入我们的党，以党来做群众的核心，务做到这一个暴动是群众的暴动，同时在这个斗争中来训练同志，锻炼成铁一般的党员。”接着，省委于十月二十七日正式决定派符向一前往黄安任中共黄麻区特委（旋称黄安特委）书记。月底，刘镇一到达七里坪。此后，省委又加派吴光浩、王志仁到黄麻区领导暴动。

十一月三日，省委派来的代表在七里坪文昌宫第二高等小学召开了黄麻两县党团活动分子会议。会议决定：“巩固工农运动，发展组织，改造黄、麻党团，把握自卫军（人枪共百余），并加紧训练。以黄安之潘家河、阮家店、箭厂河、程卜畈等地义勇队和麻城之乘马岗、顺河集的农民为主要依靠，加强反豪绅地主，没收财产，加紧义勇队办事处的工作。动员第二高小的学生到农村去发动群众，党团机关设七里坪，省代表留七里坪。麻城工作归黄安领导，计划打成一片，暴动日期再定。”会议根据省委指令和秋收

暴动计划中之规定，成立了中共黄麻区特委和鄂东革命委员会，符向一任特委书记，刘镇一为革命委员会负责人；同时改组了黄安县委，由王志仁、戴克敏、戴季伦、曹学楷、汪奠川、潘忠汝、吴光浩、戴季英、詹道尊、田开寿（工人）、程昭续（农民）等组成，党团合组一个县委，王志仁任书记。

会后，两县县委负责人和一批坚定勇敢的党团员分别下到各区，组织发动群众，准备武装暴动。黄安的曹学楷、戴克敏、戴季英、吴焕先、陈定侯、郑友梅、王秀松等分别到七里、紫云、城区、桃花、高桥等区，麻城的蔡济璜、刘文蔚、徐其虚、王树声等到乘马、顺河区发动群众。

十一月十日，敌三十军魏益三部一个营由黄安城进犯七里坪。黄麻两县县委决定，由麻城调一部分快枪，帮助黄安农民自卫军去缴七里坪三十军一个营的枪。当天晚上，自卫军出发到观音阁（离七里坪十里），因马伕走漏消息，三十军早有准备，一面派人赴县城求援，一面开南门逃走。十一日，农民自卫军进驻七里坪，杀豪绅地主，肃清反动派。农民群众第一次进攻敌军，看出了敌人软弱，认识了自己的力量，革命勇气倍增，坚定了胜利的决心。当即在七里坪召开了两万多人的庆祝大会，会后举行了游行示威。接着黄麻特委在文昌宫召开了第二次会议。会议认为武装暴动已准备就绪，决定夺取黄安县城。成立黄麻暴动行动指挥部，由潘忠汝、吴光浩、戴季英、曹学楷、戴克敏、吴焕先、刘文蔚等组成，潘忠汝为总指挥，吴光浩为副总指挥。

十一月十三日，声势浩大的黄麻暴动开始了。黄麻特委调集黄安农民自卫军全部，麻城农民自卫军两个排，及七里、紫云等区千余精锐义勇队，组成攻城部队，于当天夜十时，浩浩荡荡向黄安县城进发。黄安七里、紫云、城区、桃花、高桥、二程等区成千上万的群众积极响应，配合作战。麻城农民自卫军另一个排留在黄（安）、光（山）、麻（城）交界之北界河负责警戒，以防河南红枪会进犯。李先念、詹才芳、王树声、陈再道亦分别率领群众武装参加了暴动。十四日晨四时，攻城部队在城内群众配合下，自卫军在前打先锋，义勇队继其后，由城西北角攀梯而上，一举攻入城内，全歼县警备队，缴枪三十余支，活捉县长贺守忠、司法委员王治平、改组委员三人和土劣十五名，并没收县署、改组委员会等一切脏物，计子弹九十箱，被子百余条，军钞数百元。起义军仅在攻城时牺牲一人。占领县城后，张贴了鄂东革命委员会布告，宣布此次暴动的意义，要商家照常贸易。下午四时，得侦探报告，三十军一个团已进到离城二十里的地方。起义军决定将缴获物资运往后方七里坪，处决了贺守忠、王治平等人。晚六时，起义军由北门撤出城。敌由西门进来，敌进县城后，恐惶万分，一夜不敢入睡，于十五日晚逃走。

起义军返回七里坪后，十五日即着手成立黄安农民政府筹备处，并作好进城的准备。十六日，起义军很有秩序地向黄安城开进。还组织了宣传队，张贴布告和标语，宣传夺取政权，成立农民政府，打倒土豪劣绅，打倒武汉政府，实行土地革命的意义。沿途群众和城市商民，纷纷鸣

炮欢迎，高呼“拥护农民革命军”！“拥护鄂东革命委员会”！“拥护中国共产党”！等口号。革命气氛异常热烈。

十八日，在黄安城南门外校场岗召开万人大会，宣布成立黄安县农民政府，由曹学楷、程昭续等九位委员组成，曹学楷为主席。会上，曹学楷发表了演说，他说：“我们种田佬，每年除了完粮饷送钱把大老爷，或者是被土劣贪官抓着打屁股、关牢和砍脑壳以外，再不敢进大老爷的衙门。但是，今日我们种田佬，担粪的，公然自己组织政府，自己做起委员来了。这点证明我们革命的力量，证明现在是劳农世界，无产阶级的世界了。”讲演时，全场热烈鼓掌，杂以“呵火”之声。接着是鄂东革命委员会代表刘镇一演说，报告全国各地暴动情形。继有黄麻特委代表符向一演说，说明此次暴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并报告党的暴动政策，工农只有中国共产党能为他们谋解放，只有中国共产党是工农救苦救难的菩萨，欢迎劳动农友加入共产党。当时在会场报名入党的有数十人。至此，会场热烈至极，群众高呼“农民政府万岁”！“拥护中国共产党”！“杀尽土劣贪官”！“实行土地革命”！等口号。大会行将结束时，又枪决了土劣数人，群众痛快异常。当日，农民政府发出通电、告民众书；黄安县委亦发出告黄安农民书，共约数万份。十九、二十日，黄安各区纷纷开庆贺大会，到会群众共达七万多人。麻城同志听说黄安农民政府成立，派出二十一名代表前来祝贺，并表示：“你们已经抓到了权柄，故有今日这样的好处。我们回去也一定照你们这样去抓到权柄！”就在联欢大会上，二十一个代表中未入党的十五人当即报名加入党的

组织。黄陂、黄冈、罗田及河南的光山、商城等县也纷纷派代表前来祝贺，准备回去暴动。

继农民政府成立之后，黄麻特委又将参加暴动的黄、麻两县农民自卫军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鄂东军，黄安自卫军为第一路，麻城自卫军为第二路。奉黄陂县委指示，由徐海东率领的一支有七条步枪的黄陂农民自卫军，在配合黄麻暴动以后，也编为工农革命军。全军共三百余人。潘忠汝为鄂东军总指挥兼第一路司令，吴光浩为副总指挥兼第二路司令，戴克敏为鄂东军党代表兼第一路党代表，刘文蔚为第二路党代表，汪奠川为参谋长。鄂东军总指挥部设在县城孔庙内。黄、麻两县的义勇队共有四万人，遂以区成立指挥部，戴季英、吴焕先、郑友梅分别为黄安七里、紫云、城区的指挥；徐其虚、王树声、桂步蟾为麻城乘马、顺河等区的指挥。地方工作以“武装群众”为中心，并对光山反动红枪会发起进攻，以防鄂、豫两省反动派联合夹攻新生的政权。十一月二十日，光山红枪会派三十多名代表来黄安求和。特委派代表以农会名义与之谈判，并动员他们回去搞暴动。

黄安农民政府和鄂东军成立后，符向一去麻城等地巡视，黄安工作由刘镇一负责。黄安城内迅速建立了革命秩序，商店照常营业，学校继续上课，县工会的工人纠察队也恢复了活动。但黄安南乡的反动势力仍很猖獗，他们利用红枪会、白枪会、大刀会等反动武装，组织所谓“保产党”，同农民政府对抗。黄麻特委决定打击这些反动势力，扩大起义的胜利成果。十一月二十六日，特委命令鄂东军

第一路司令潘忠汝率全路快枪七十多支并驳壳队，携带农民政府的宣传品，并组织宣传大队，到县南开辟工作。他们经桃花区到达八里区，县南农民见工农革命军南下打土劣，非常高兴，各持手棍、矛子、扁担同革命军一起打土劣，并与八里湾土劣的红枪会百余人作战，当场打死一半，缴枪五十余支。接着，八里湾附近三四千农民集会举行暴动，四处捕杀土豪劣绅，没收其财产，掀起了县南农民革命的高潮。

当鄂东军主力南下以后，反动派纠集黄安县西部河口一带四百余土匪，企图乘虚袭取县城。留守县城的少数起义武装同全城工农群众紧密配合，农民政府同县农协、总工会协调一致，在刘镇一的率领、指挥下，终于打退了土匪的围攻。各地农民群众万余人闻讯星夜赶至县城增援，南下军队也挥戈北伐，胜利保卫了黄麻起义的革命旗帜。

与此同时，麻城县委在西张店等地举行集会，庆祝黄麻暴动胜利，并在西张店王家祠堂召开了五百余人的农民大会。会后，捕捉了当地大土豪陈霞庭，没收了他的全部财产，在麻城掀起了土地革命的热潮。

上述情形表明，黄麻起义是在“八七”会议精神和湖北省委秋收暴动计划指引下发动的，在黄麻特委领导下进行的。参加起义的武装力量，主要是黄、麻两县的农民自卫军和农民义勇队。这次起义的主要领导人有：潘忠汝、吴光浩、符向一、刘镇一、曹学楷、戴克敏、王志仁、汪奠川、戴季英、吴焕先、王秀松、蔡济璜、刘文蔚等。起义胜利后，立即建立了革命政权和工农革命军，把黄、麻地

区的革命斗争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 (三)

黄麻起义的胜利，鼓舞了人民，震慑了敌人。国民党中央社十一月二十九日发自汉口的电讯中称：“鄂东黄安被农军盘踞，且其势更比前蔓延。该县城自上月被攻陷，县长贺守忠及司法委员、清党委员、各局所委员等十六人均被杀。此后旬日，农民踪迹已遍全县。……组织农工政府，大倡土地革命，贫苦农工附从者已达万人”。此时，桂系军阀打败了汪精卫、唐生智集团，进占了武汉，当即电请驻河南潢川之国民党十二军任应岐部向黄、麻两县“进剿”。在强大的敌人面前，刚刚诞生的工农革命军鄂东军，为了保卫革命政权，与敌人展开了英勇顽强的斗争。这一斗争虽然受挫，起义军退出了县城，但保存了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以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继续高举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旗帜，走上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正确道路。

十二月初，国民党十二军教导师闻清霖部，自豫南进攻麻城西张店，图犯黄安城，当即遭到乘马、顺河等地农民武装的抗击。敌乃改变进攻计划，取道宋埠、尹家河，于十二月五日奔袭黄安城。城内守军，开始视为土匪来犯，据城固守，与敌展开英勇的抗击，县城附近的农民武装亦纷纷驰援。战斗自晚十二时到翌日四时，虽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但终因敌众我寡，城门被敌攻破，工农革命军和农民义勇队同敌反复拚杀才突出敌人的包围，解放二十一



天的黄安城又陷敌手。这次战斗，我军伤亡很大，县委书记王志仁在南门牺牲，鄂东军总指挥兼一路司令潘忠汝在东门身负重伤牺牲。

敌人占领黄安县城后，八日又进占麻城。随后侵入七里坪、檀树岗、乘马岗、顺河集等地。土豪劣绅和反动分子趁势还乡，勾结国民党军进行报复。各个村庄被烧掠一空，大批革命干部和群众惨遭杀害。黄安七里区防务会的宣传股长张南一、七里坪工会负责人秦绍勤、麻城县委书记蔡济璜、鄂东军第二路党代表刘文蔚、麻城农会委员长刘象明等先后遇难。黄安县中部和北部的贫苦农民被杀者数以千计。麻城一次被屠杀的革命群众达四百余人。反动派妄图以残酷手段将黄、麻地区的革命镇压下去。但是，已经燃起的革命烈火是扑灭不了的。

十二月中、下旬，从黄安城突围出来的工农革命军和义勇队，又陆续回到紫云区，原想在黄麻北部进行游击，但不能立足。吴光浩、戴克敏、曹学楷、戴季英、汪奠川、吴焕先等在木城寨举行会议，决定暂避敌锋芒，将突围出来的同志，除留吴焕先、吴先筹、甘济时、程昭续等少数人在当地坚持斗争外，大部分人转移到黄陂木兰山。会后，在箭厂河附近之闵家祠堂集合了七十二人，有四十二支长枪、十一支短枪，经七里坪北折向南进，二十九日到达木兰山。一九二八年一月一日，工农革命军鄂东军改编为第七军，吴光浩任军长，戴克敏任党代表，汪奠川任参谋长。这时，由于符向一（后自首叛变）、刘镇一（后牺牲）先后离开黄麻地区，就以吴光浩、戴克敏、曹学楷、戴季英、

汪奠川五人组成了新的黄麻特委。部队当即以木兰山为中心开展活动，到处张贴布告，宣传黄安农民政府公布的政治纲领，号召群众起来推翻国民党和土豪劣绅的统治。一九二八年一月十七日，第七军袭击长岭岗敌据点，破坏敌人电线数里；二十三日拂晓，又乘旧历新年敌疏于戒备之际，打下了木兰山东南之罗家岗，缴枪十余支，并打开土豪的当铺、粮仓让群众取当、分粮。一连三日，前来领取粮食、衣物的群众成千上万。

在此期间，湖北省委指示第七军注意保存力量，如有可能，即返回黄麻坚持斗争。第七军根据省委指示进行了讨论，认为当前革命虽处低潮，但群众愈受压迫愈要革命。只要多想办法，斗争坚持下去，总有一天会取得胜利。这时，已知党在黄冈县发动了暴动并建立了武装，遂决定若木兰山的情况紧张时就到黄冈进行游击。

一月底，国民党十二军一个团向木兰山地区进攻。为了避开优势敌人，决定由吴光浩率领部队向黄冈转移，他们分成若干小组，乘夜冲出包围。曹学楷、徐朋人等在当地坚持斗争，他们又组织了第八军，由徐朋人负责指挥。第七军在黄麻特委的领导下，二月三日游击到黄冈大崎山金鸡坳与黄罗蕲特委、黄冈县委和工农革命军第六军（共四十余人）胜利会合。当即遭到夏斗寅部的进攻，第七军转战于黄冈、罗田边界一带，因无群众基础，难以坚持，三月初复又返回木兰山，与曹学楷、徐朋人领导的第八军会合。第八军番号即撤销。

第七军返回木兰山后，即遭到敌人的不断进攻，部队

集中活动甚为困难。于是第七军的领导人在洪界山召开会议，决定将部队编为四个短枪队，分散游击，隐蔽活动，准备在适当时机打回黄、麻。当即由戴克敏、徐其虚率一个队北出黄安，王树声、廖荣坤率一个队东进麻城，吴光浩率一个队到河口以北，汪奠川率一个队留在黄陂活动。曹学楷、徐朋人仍留在当地坚持斗争。第七军改变了斗争策略，采取“昼伏夜出，远袭近止，绕南进北，声东击西”的游击战术，打击国民党军和土劣反动武装。第七军活动达陂、孝、冈、罗、黄、麻等六县，影响极大。黄、麻地区的革命人民受到了鼓舞。他们纷纷递喜讯，说：“共产党又发了！”“不久就会打回来！”

四月初，敌十二军与桂系十八军发生冲突。十二军撤回河南。四月七日，戴克敏等乘敌撤退之机，一举消灭了上戴家民团，缴枪二十余支。檀树岗民团闻风逃窜。紫云区的革命局面复又打开，派程启光去木兰山，通知汪奠川、曹学楷、徐朋人等返回紫云。

五月间，第七军领导人吴光浩、戴克敏、曹学楷、戴季英等在黄安檀树岗西北二里许清水塘召开会议，决定在黄（安）光（山）边界上的柴山保，实行边界割据。七月，又召开了尹家咀会议。工农革命军第七军奉命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三十一师，吴光浩任军长兼师长，戴克敏任党代表，曹学楷任参谋长，陈定侯为政治部主任。全师约一百二十人，编为四个大队（对外称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团），第一大队长为晏仲平，党代表为王树声；第二大队长为廖荣坤，党代表为江竹青；第三大队长为

徐其虚，党代表为吴先筹；第四大队长为程昭续，党代表为江子英。接着，又先后成立了两个特务队，负责侦探敌情，筹粮筹款。根据会议决定，同时加强了地方工作，恢复了黄麻两县党的组织，七月重建麻城县委，次年初改组黄安县委，并建立和发展了各级党团组织，加强了支部工作；积极组织县、区赤卫队和群众武装，发展游击战争；在边缘和敌占区，普遍开展抗捐、抗税、抗租、抗粮、抗债等“五抗”运动，进一步发动了群众。

随着红军和地方工作的发展，迫切需要加强党的领导机构。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以后，根据湖北省委的决定，由红军和地方党的主要负责人组成中共鄂东特委，管辖黄安、麻城、光山等县。王秀松任书记，吴光浩、戴克敏、曹学楷、徐朋人、戴季伦、戴季英、程昭续等为委员。同时成立少共鄂东特委，先后由戴季英、张心灼任书记。不久，特委决定以红三十一师一、二两个大队南下黄、麻老区，配合群众斗争。一、二大队南下后，先后击溃和消灭了乘马岗、顺河集地区的四个反动民团，击退了麻城驻敌一个营的进攻。到年底，七里、紫云、乘马、顺河等区的大部分地区，重为革命势力所控制。柴山保西边之观音保等地，也由于红军经常活动，工作逐步开展，成为割据区域。罗山南部的宣化店和孝感北部的汪洋店一带的革命斗争也迅速发展。鄂豫边界工农武装割据取得越来越大的胜利。到一九二九年四月，根据湖北省委决定，黄麻（即鄂东）、京汉两区举行各县联席会议，正式合并为鄂东北区，选举产生了鄂东北特委，徐朋人任书记。这时，鄂东北、豫东南

两地区党的关系更为密切。五月，红三十一师发展到近四百人，并成立了第五大队。边界割据地区已从北面的柴山保向南扩展到黄安的八里、桃花和麻城近郊，向东扩展到麻城的黄土岗附近，向西扩展到孝感的汪洋店附近，南北长八十余里，东西宽一百三十余里。在割据地区内，普遍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成立了区、乡、村苏维埃政府，建立了农民武装赤卫队，并开始分配土地。至此，鄂豫边革命根据地初步形成。

(郭家齐执笔)

#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福建党的组织机构、领导人员 变动情况及其主要活动

一九二五年一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会上通过的《组织问题决议案》中指出：“在尚未有我们组织的其他工业区及大都市，如东三省、河南、重庆、九江、芜湖、福州等均应努力开始党的组织。”根据这一决议，福建各地在党中央和广东区委的领导下，先后建立了党的组织。从此福建人民的革命斗争，在福建党组织的领导下，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 一、福建党组织的建立及其发展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福建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分为两个组织系统，以厦门为中心的闽南、闽西的党组织，属广东区委领导；以福州为中心的闽北、闽中的党组织，属党中央直接领导。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开始在福建传播，《新青年》、《晨报副刊》、《湘江评论》、《响导》等，

陆续传入福建各地，福建进步知识分子吸收了新的思想，探索中国革命的真理，逐渐和工农群众接触，并初步开展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这就为福建党团组织的建立作了准备。一九二五年在党中央和广东区委的领导下，先后在福州、厦门、莆田等地建立了团组织，并得到迅速的发展。

中共福建地方党组织是在共青团组织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

一九二五年九月十二日，团中央特派员方尔灏从福州写信给团中央，建议在福建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这一建议得到中央的重视。一九二六年一月，方尔灏到上海向团中央汇报工作，并要求中央对福州工作给予及时指导。经中央安排，方尔灏和因遭敌缉捕于二月初赴沪的福州团地委领导人林铮、陈聚奎、严明杰等人先后从上海回到福州。四月初，团福州地委进行了整顿和改组。在此期间，方尔灏、林铮、陈聚奎、施松龄、吴徽谦、郑蓉裳（女）、林鉴（女）、严明杰、陈长庚、郑步云、金毓芬、林世良、傅克壁、陈与潮、傅炳恭、赵凯等人由团转党，成为中共党员，并成立了中共福州地委（陈应中同志认为当时实际是特委），书记方尔灏，直属中央领导。一九二六年六月，党中央为了调解福州地委内部的纠纷，加强地委的领导力量，派蔡珊到福州，改组了福州地委，书记蔡珊，宣传部长方尔灏，组织部长陈应中（陈兴钟）。

一九二六年春，莆田建立了党团混合支部。十二月，正式建立了中共莆田特别支部，直属党中央领导，书记陈国柱（廖华）、组织陈天章、宣传林嵩龄。在此前后莆田城

郊、广业、涵江、黄石、笏石、江口等地建立了党的组织。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北伐军攻占福州后，党中央为了加强福州革命斗争的领导，先后派遣中央候补委员王荷波（王灼华）为中央特派员和在上海入党的陈昭礼、陈碧笙同志回福州。王荷波到福州后，于一九二七年三月召集福州地委和闽南特委负责人讨论研究成立中共福建省委的问题。经过认真分析研究，认为成立省委条件还不成熟。不久，福州地委又进行了一次改组，书记徐琛，副书记蔡珊，宣传部长方尔灏，组织部长陈应中。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福州党组织发展很快，所属有职工小学支部、平民小学支部、义务小学支部、女子师范支部、省立二中支部、师范支部、党政训练所支部、店员支部、鼓山区支部、柴井支部、人力车支部、码头支部、涤社支部等十六个党支部，党员一百六十八名。

一九二七年一月，福州地委还通过国民党省党部筹备处先后派遣共产党员陈国柱、林清汉等赴莆田、建瓯、宁德、仙游、南平、福安开展农民运动，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

广东区党委十分重视厦门党的建设。一九二五年十一月，罗扬才代表厦门学联会，到广州出席学联会议，会议期间，由杨善集（团广东区委书记）、罗明介绍，被会议临时党支部吸收为党员。一九二六年一月，李觉民到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时，也加入了共产党。罗扬才、李觉民入党后，广东区党委指示他们返回厦门，加强团组织建设，建立党的组织。一九二六年二月，广东区党



委派共产党员罗秋天来厦门加强团支部的领导。随之成立了党团合一的厦门特别支部（据罗明回忆先由罗秋天、罗扬才、李觉民成立党支部）。

一九二六年三月，中共广东区委派罗明到厦门招收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整顿、发展党团组织，成立了党团厦门干事会。四月，党团组织正式分开。把厦门大学、集美小学、禾山和大中街四个团支部转为党支部，共有党员十八人，成立了中共厦门总干事会，书记阮山，宣传、组织刘大业，罗扬才负责学生运动，严子辉负责农民运动，柯子鸿负责工人运动，厦门的党组织受广东区党委领导。

厦门地区建党后，派阮山到闽西活动。一九二六年夏，林心尧、赖玉珊、赖秋实、熊一鸥等建立了闽西第一个党支部永定支部。一九二六年十月，第六届广州农讲所福建籍毕业生郭滴人、朱积垒、陈庆隆（陈子彬）、李联星、王奎福、胡永东、黄诏明、朱文昭等九人由中共广东汕头地委派遣，随北伐军回闽开展农民运动和建党工作。一九二六年冬，朱积垒在平和建立党支部；一九二六年十二月，温家福、兰维仁在上杭城关建立党支部；一九二九年一月，陈庆隆、郭滴人、朱文昭在龙岩建立党支部。

一九二六年七、八月间，党中央派翁振华（翁泽生）、谢志坚到漳州开展建党活动。厦门党组织派罗扬才到漳州与翁振华联系。一九二六年冬发展进步青年王占春、王德（曾宗乾）、陈进德、邱启明、黄炳光、林义民、郑静安、季竹安等九人为团员，成立团支部，书记季竹安，不久转

为中共党员，中共漳州支部正式成立，由翁振华任书记，主要成员有邱泮林，许土淼等。

北伐军入闽后，广东区党委为加强党对福建革命运动的领导，派原汕头地委书记罗明到厦门、漳州筹建特委组织，统一管辖厦门、漳州、泉州和闽西各县党的工作。一九二七年一月，罗明到厦门首先成立厦门市委，由罗秋天任书记，罗扬才任组织部长，吴世华任宣传部长。随后，在漳州成立了中共闽南特委，书记罗明、组织委员刘端生、宣传委员翁振华、秘书长邱泮林、工运委员许土淼，农运委员李联星，妇女委员谢志坚，担任委员的还有农工、季竹安（季永绥）、朱积垒、罗秋天、陈庆隆等人。闽南特委归广东区委领导，下辖漳州、厦门、平和、龙岩、永定、上杭、同安、泉州等地的党组织。

## 二、福建党组织成立后的主要活动

（一）配合北伐军进军福建，建立革命统一战线。

一九二六年七月，国民革命军大举北伐，十月，东路军从广东出发进入福建。在党的领导和工农群众的大力支援和配合下，北伐军击败了北洋军阀孙传芳驻福建的主力部队，迅速进占了漳州、泉州、福州等重要城市。慑于北伐军的声威，厦门海军警备司令林国赓宣布归属北伐军。

一九二六年秋，党中央派遣中央候补委员王荷波为特派员到福州活动，准备策应北伐军的行动。王荷波到福州以后，召开了党团员大会，在会上作了形势和任务的报告，

要求全体党团员在地委的领导下，在北伐军进入福建时，要做好统战工作，要广泛宣传发动群众，积极支持北伐战争。为了配合北伐军进军福建，广东区委派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的福建学员郭滴人、朱积垒、陈庆隆等，参加北伐军东路军总指挥部政治部的工作，与东路军中的共产党员徐琛（党务科长）、陈明（组织科长）、陈祖康（宣传科长）等一道，积极从事政治宣传和发动群众的工作。

在上海党中央和广东区委的指导下，福建党组织积极发动工农群众，宣传党的国共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主张，号召工农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参加国民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派遣党团员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组织各行业的工会组织，发动工人进行罢工斗争，提出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等要求。组织各地农民成立农民协会，举行示威游行，开展反封建、打土豪劣绅、减租减息斗争。组织群众为北伐军带路、送信、抬担架、运输等后勤工作。还组织各种类型的大会，欢迎慰问北伐军。

福建党组织十分重视对闽军、驻闽海军的策反工作。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底，福州地区共产党、国民党和海军的代表在马尾召开了“马江会议”。福州地委派吴徽谦、叶大猷、金毓芬、王劲民、郑贻晋等陪同王荷波前往参加。在我党的努力下，达成了协议：集中火力拦击企图强渡乌龙江、占据福州负隅顽抗的军阀张毅部队。福州地委还派共产党员陈烈等人，利用他们同老同盟会员施秉政及其他国民党左翼的人事关系，争取了省防司令部参谋长马益源和

其他几个旅、团长，并鼓励他们一起对省防司令李生春陈说利害，说服他放弃抵抗，归顺北伐军。方尔灏等十二名党员，还组织群众到省防司令部示威，迫使省防司令李生春与马尾系海军在福州联合宣布服从国民政府的领导，海军当局也根据“马江会议”的协议，派海军陆战队在李生春部队的配合下，歼灭了北洋军阀张毅部已渡江的二千余人，为北伐军进入福州扫清了道路。

北伐军进占福建后，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四日，国民党中央电令取消原设在厦门的省党部临时执行委员会，派丁超五为筹备主任，马式材（共产党员）、李培桐（左派）等为筹备员，筹备国民党福建省党部。十二月二十二日，正式成立了国民党福建省党部筹备处。随后又改组了国民党福州市党部筹备处。在中央特派员王荷波的领导下，我党积极开展组建国民党党部的工作，派出马式材、江削伍、董涵球、朱铭庄、林梧凤、郑尚衡等同志参加党部的工作，担任重要的职务，并派党员到全省各地，建立国民党左派组织。由于我党的努力，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力量在国民党党部中占有绝对的优势。省党部筹备处主任，各委员会主任，及市党部筹备处的各部主任，各分区部筹备委员，大多由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担任，取得了统一战线的领导权，为进一步开展革命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 （二）推动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

福建的工人运动是“五四”运动以后，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全国各地工人运动的影响和推动下，逐渐开展起来的。福建党团组织建立以后，

工人运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全国掀起了规模盛大的反帝运动。当时福建团组织刚刚建立，福州、厦门团组织立即响应党的号召，发动各界群众声援上海工人的斗争。在团福州支部的领导下，福建学生联合会召集福州各界代表举行集会，决定成立“上海惨案福建各界后援会”。团支部还派翁良毓等人分头到人力车工人、码头装卸工人、海员、建筑工人、理发工人、印刷工人、角梳工人、屠宰工人中进行宣传，号召工人团结起来，同帝国主义作斗争。在团支部的宣传鼓励下，全市三万多群众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抗议英、日帝国主义的罪行。团支部还派人到马江一带组织工人拒绝为日、英轮起货，并带领工人将几只日船凿沉。厦门为声援上海、广州工人的斗争，成立了“厦门各界外交后援会”，并组织在英、日洋行、船行、寓宅工作的华人、海员、职工一律罢工，给帝国主义者以沉重的打击。泉州、漳州及各县工人群众也都纷纷投入声援上海工人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工人运动在福建全省蓬勃兴起。

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后，中华全国总工会发表宣言，号召全国工人阶级“站在一切民众之前，引导一切民众援助国民革命军”。福建工人阶级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响应全总的号召，开展各种形式的斗争，工人运动进入一个新的高潮。福州地委派江削伍、叶大猷、江木煊等组织了邮政工会，整顿了人力车夫工会；派方尔灏、陈碧笙等将理发、码头、人力车夫工会联合起来，成立了福州店员总工会。

工会组织迅速发展，下属工会已有数十个，会员达一万余人。在党的领导下，各工会普遍开展了增加工资、提高待遇、改善劳动条件的经济斗争，大多数都取得了胜利。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四日，在中共厦门市委领导下，成立了厦门总工会筹备处，二百多名代表参加了成立大会，会上通过了总工会筹备处章程，推举三十几位同志为筹备委员，共产党员罗扬才任委员长，杨世宁任副委员长，吴世华、黄埔树等共产党员也参与领导工作，所辖基层工会有海员工会等二十三个，工友一万多人。到四月初，基层工会增加到三十多个，会员二万多人。在泉州，党派李松林、辜仲钊等领导工人运动，组织汽车工人工会筹备会，成立码头总工会。接着，在竹器、理发、建筑、电厂、砖瓦窑、咸鲜水产等行业成立工会。在漳州，成立了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办事处，组织了教员、印务、汽车、运输、人力车、丝纱、洋鞋、理发、码头、店员等三十二个工会。这些工人组织，成为当时福建革命的重要力量。

### （三）积极开展农民运动。

福建党团组织十分重视开展农民运动。一九二五年六月，郑章荣等人组建了福州七里农民团支部，着手开展农民运动。同年十二月，在团福州地委领导下，在尤模成立了农民协会，并设立农民俱乐部，出版《农民之友》刊物。一九二六年初，莆田党组织建立后，秘密组织了农民协会。一九二六年四月，严子辉受厦门党组织委派，到厦门禾山一带开展农民运动，很快建立了农民团支部。

一九二六年十月北伐军进入福建，福建的农民运动也

随之高涨。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郭滴人、朱积垒、陈庆隆、李联星、温家福、王奎福、胡永东、黄诏明、朱文昭等九人，以国民党农民部特派员身份随北伐军到福建。他们分别到平和、龙岩、永定、上杭等地，与正在各地开展革命斗争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一道，利用北伐的好形势，广泛深入开展工作，在广大农民中揭露帝国主义、军阀、土豪劣绅勾结在一起压迫剥削农民的罪行，号召开展二五减租，打倒军阀、土豪劣绅，同时以农会形式把农民组织起来。郭滴人、陈庆隆先后在龙岩的考塘村、湖洋乡建立了农民协会，温家福在上杭成立了县农会筹备会，胡永东、王奎福、阮山、林心尧、卢肇西等在永定成立了县农民协会。朱积垒先后在平和的上坪村、九峰建立了农民协会。漳州、海澄、漳浦等县在李联星、黄诏明等领导下，也广泛组织了农民协会。福州地委充分利用国共合作的有利时机，派遣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省党部筹备处农民运动委员会的工作，共产党员陈国柱、林挺雄、林梧凤、朱铭庄、董涵球、葛越溪、杨峻德、潘作民等，先后被派到福州、莆田、仙游、南平、闽侯、建瓯等地开展农民运动，筹备农民协会。

为了适应农民运动迅猛发展的需要。福建党组织在各地举办各种类型的养成所、讲习所，培养农民干部，向农村输送了大批农民运动骨干。一九二七年三月，共产党员阮山、林心尧等在上杭举办了汀属八县社会运动人员养成所。来自长汀、上杭、武平、永定、连城、宁化、清流、归化八县的一百六十四名学员参加学习，学习革命理论和

开展农民运动的工作方法，并接受军事训练。同时，陈庆隆、张旭高等人也在龙岩举办了岩平宁宣传人员养成所。闽南特委罗明、翁振华、李联星、谢志坚等在漳州丹霞书院设立了工农运动讲习所，培养来自漳属各县的工农干部。这些学员结业后，回到农村开展工作，对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党的领导下，农民的反封建、反军阀的斗争在各地迅猛发展。平和农民在朱积垒的领导下，与县府派来的捐棍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废除了苛捐杂税，实行了二五减租。在漳属的漳州、海澄、漳浦等县，李联星、黄诏明等利用在国民党漳浦县党部工作的有利条件，广泛地组织农民协会。他们联合国民党左派，督促政府处决了劣绅黄宝忠和华安县原县长傅枢。在共产党员李联星、周惠波的领导下漳州、石码、海澄一带农民掀起了声势浩大的与罪大恶极地主蓝汝汉的斗争。泉属各县一些农村还建立了农民武装，惠安曾组织了一支三百多人的农军，同安也建立了一支三百人的农民自卫军。闽北、闽东、莆田等地的农民也纷纷组织起来，开展各种方式的斗争。

在福建各地农民运动蓬勃发展的大好形势下，经过我党的努力，一九二七年二月，在福州召开了福建省第一次农民协会代表大会。福州、连江、闽侯等地的农会代表参加了会议。大会总结了全省农民运动的经验。成立了福建农民协会，制定了福建农民协会章程。紧接着福建农民协会于一九二七年三月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修订通过了《福建省农民协会章程》。此后，福建的农民运动更加深入



地向前发展。根据武汉国民政府农民部一九二七年六月的调查，福建全省有一百四十七个乡建立了农会，会员达二万八千四百多人。

#### （四）组织人民开展反帝爱国斗争。

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失败后，腐败无能的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开放“五口”通商。福州、厦门被订为通商口岸后，资本主义列强相继侵入福建，对福建进行残暴的经济掠夺和文化侵略，实行殖民统治。福建党组织成立以后，始终站在反帝斗争的前列，领导和组织具有反帝光荣传统的福建人民，掀起了一个又一个声势浩大的反帝浪潮。

为了抵制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一九二五年五月，福建学生联合会成立了收回教育权运动委员会，开展反对奴化教育的斗争。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共产党员罗扬才、杨世宁等在厦门成立了反基督教大同盟，以《江声报》、《厦声报》、《民国日报》、《民钟报》等为阵地，与厦门基督教青年会机关报《道南报》作斗争，并组织工人、学生举行示威游行。一九二七年二月，福州地委直接领导的进步团体福建涤社，出版了《青春之路》第三期——《收回教育权专号》，并发表了《收回教育权运动宣言》。不久，福州各界又成立了“收回教育权筹备委员会”。三月二十四日，在党的领导下，一千多名教会学校的学生以及各界群众在仓前山麦园顶召开了反对文化侵略收回教育权的群众大会，并举行了游行示威，向福建政务委员会请愿，要求把教会学校收归国有，彻底收回教育权。四月一日，在福州地委的组织下，

由福建青年社、福建滌社、协和大学学生会，文山女中学生会以及党政训练所学生等团体筹备，在福建省党部筹备处召开了有一千多学生和群众参加的群众集会，正式成立“福州反文化侵略收回教育权运动大同盟”。教会学校的广大师生也纷纷起来斗争。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圣诞节”前夕，共产党员罗扬才根据群众提供的线索，带领工人纠察队进行侦查，在深田内山下掘出被天主教“仁慈堂”残害的十三具婴儿尸体，立即将现场拍照登报，揭露帝国主义者披着宗教外衣举办“慈善”事业的真面目，反对帝国主义以传教为幌子进行文化侵略，上千名工人和学生走上街头，举行抗议活动，并把被欺骗到育婴堂的儿童送还给他们的亲生父母。一九二七年一月十四日，国民党福建省党部筹备处妇女运动委员会和福州学生会也在福州破获天主教“仁慈堂”虐杀婴孩事件。从而爆发了更大规模的反帝斗争。“仁慈堂事件”爆发后，由共产党员马式材任主任的省党部筹备处宣传委员会，发表了《福州仁慈堂惨杀案宣言》，揭露帝国主义分子以“仁慈”、“博爱”为幌子，惨杀中国儿童的罪行，号召广大群众团结起来，打倒吃人的教会及其所设立的机关，收回外人居留地，并且要求惩办残杀婴孩的神甫、牧师。福州广大人民群众的连日斗争，给帝国主义分子以极大的打击。

（福州、厦门、漳州市委党史办等提供材料，福建省委

党史资料征编委征集处 连尹、钟健英执笔综合）

[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

书名 = 中共党史资料 第十七辑

作者 =

页数 = 2 5 3

S S号 = 0

出版日期 =

封面  
书名  
版权  
目录  
正文